

之前，你肯定被不少本励志书带到沟里去过；
现在，你需要爬上来，还需要爬上去。请看这本书！

先有大格局 后有大事业

张鹏◎著

人为什么穷？
没有金钱，
用什么来替代？

1%的富人
影响社会和谐？
当个坏人更占便宜吗？

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
人“吃”人，
能让社会进步？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有大格局，后有大事业/张鹏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1

(大格局书系)

ISBN 978-7-214-08825-3

I.①先...Ⅱ.①张...Ⅲ.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Ⅳ.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8111号

书名 先有大格局，后有大事业

著者 张鹏

责任编辑 戴宁宁

执行策划 汪毓楠

特约编辑 张松敏

文字校对 郭慧红

装帧设计 孙倩

插图 刘珂言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42千字

版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825-3

定价 29.8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 [序 人生就是一个椭圆](#)
- [导读 当我们仰望星空](#)
- [上帝偏好椭圆](#)
- [都是“格局”惹的祸](#)
- [一小步=一大步](#)
- [权势尊位功名利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
- [痛并快乐着，并非不可解释](#)
- [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
- [人性之争的终结](#)
- [香香的，臭臭的](#)
- [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
- [没有金钱，用什么来替代？](#)
- [着眼未来的孩子，多一块棉花糖](#)
- [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
- [道德的理由：直觉？功利？](#)
- [盖世武功，从三只小麻雀练起](#)
- [美德与格局](#)
- [“上”清“下”浊](#)
- [绿皱豌豆，黑天鹅](#)
- [高官与高道德](#)
- [当个坏人更占便宜吗？](#)
- [人为什么穷？](#)
- [上帝掷骰子](#)
- [爱情、苹果和万有引力](#)
- [马斯洛的伟大和遗憾](#)
- [人“吃”人的社会](#)
- [假如道德滑坡，谁应该先变得善良？](#)
- [左脑和右脑，缺个心眼儿的机器](#)
- [多一个维度看世界是什么样子](#)
- [困境？困境？困境？](#)

- [“我”是全世界的中心](#)
- [世界不只你一人](#)
- [小心！珠穆朗玛峰再高一倍就会倒掉！](#)
- [多元化，意味着分崩离析吗？](#)
- [应该说闲言碎语吗？](#)
- [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有辙吗？](#)
- [博士后和月嫂的较量](#)
- [死亡体验课程](#)
- [人死之后，还有灵魂吗？](#)
- [为富不仁？](#)
- [公平是不是乌托邦？](#)
- [鸟儿的飞行，雪崩式的效应](#)
- [后记 大格局，大结局](#)

序 人生就是一个椭圆

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椭圆，人在乡村，学生笨，老师也笨，图画课上，老师教我们画圆，都是正圆。但我们跟阿Q同学一样，根本就画不圆，但又不敢像阿Q那样骂娘，只好次次都怀着遗憾下课。上了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数学课上，我得知了这个世界其实只有椭圆。所谓的正圆，只是椭圆的一种极致，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我们不管是用仪器还是用手，能画出来的都是椭圆，即使歪歪扭扭，也不过是曲度不同罢了。反过来，无论用再精密的仪器，也画不出理论意义上的正圆。

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上帝偏爱椭圆。所以，星球的轨迹是椭圆的，每个星球，也是椭圆的，乃至人生，也是椭圆。人生不止有一个圆心，而至少是两个，一个精神，一个物质。不错，其实好些看上去很物质的人，比如动辄在微博上秀自己的爱马仕包包、玛莎拉蒂豪车的人，到底是为了物质满足，还是企图获得某种精神上的优越感，真就很难说。项羽同学说，富贵不还乡，如衣绣夜行。换言之，换上一身华美的绣衣，一定要大白天在众人面前走走，否则等于没有。客观地说，穿绣衣和不绣的衣服，其实，对于蔽体而言，都是一样的，但人们要穿得漂亮，穿得华贵，一身名牌，大名牌，无非是为了人前显摆。这个显摆，其实就不是物质的，而是一种精神需求。这也是为什么，无论人们怎么拍砖，怎样吐口水，微博上出来显摆的人，却层出不穷。当然，这样的精神追求，本质上过于单一了，就那么点跟人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很容易被人追上，不就一个包包嘛，穷人，实在不行，卖了肾，也可以得到。

所以，椭圆的人生，要想过得好，格局要大。什么叫格局？作者给了我们一个很学究气的中英文双语的定义。其实，所谓格局，粗一点地说，就是眼界，就是气度，就是容人之量，容物之量。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有那么大的肚子，所以人家能当宰相。但练出或者吃出宰相的肚子，需要功夫。人人格局都大，则是帕累托改进，双赢或者多赢。诚然，就像作者说的那样，社会是个纺锤体，不是个规整的球。人总是有格局大格局小的，即使道理都明白，人的性格也决定

了某些人肚量死活都大不了。每个人生都是椭圆的话，每个椭圆都不一样，每个阿Q，画自己的圆，都是不同的，虽然，都多少带着点遗憾。

还好，作者告诉我们，人都是有趋光性的。好多好多的孩子，都不敢在黑暗中待着。人性可能是千奇百怪的，小孩子打碎大人心爱的瓷瓶，就是为了让大人注意他。有人刺杀总统，仅仅是为了讨自己喜欢的女明星的一顾。真是，漂亮的女明星们，如果多回眸几回，多笑几回，能减少多少罪恶呀。对于某些卑微的男孩子来说，漂亮女孩子的笑，就是世界上的光，天上的太阳。

我跟作者素不相识，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会讲故事，不，会把人生的哲理，或者说常识，被偏见遮蔽的常识用最通俗、最可亲的语言讲出来的人。看她的文字，蓦然之间，感觉自己进了幼儿园，在听一个可爱而且漂亮的阿姨讲故事，娓娓道来。现在我们的成人世界，好些简单的常识，都被遮蔽了，听听这样的故事，大有好处。

作者命我作序，做出来的，似乎不像是序，权作读后感吧。

张鸣

2012年8月11日，于京北清林苑

导读 当我们仰望星空

最近几年，我常常被问到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的书是写给谁看的？”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既了然于心，又无从回答。

哲学，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本不存在特定的人群。

人活在世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困惑，于是哲学的价值就产生了。

通常情况下，哲学是高深的、晦涩的、出世的。但我希望自己的思考能“接地气”。所以，这里面有关于如何挣钱、建立人脉、职场晋升、谈情说爱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毕竟，仰望星空的前提必须是脚踏实地。

这几年市面上的畅销书，但凡以励志为诉求的，大多像在做传销式的摇旗呐喊。但我希望用来励志的不仅仅是通过口号，而需要用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理性文字。所以，在涉及到“我们应该怎样做”时，常常试着去追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呢？”无论给出的答案是否被认可，理性追问总是必要的，因为倘若励志能增添理性，效果无疑会更好、也更持久。

关于佛法的书也常常被需要，那是一种通过“做减法”来寻找内心平静的修行之道。坦率地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心悦诚服地接纳它，世界也就清净了。可如果做不到，倒不妨通过“做加法”的方式来“做减法”，也就是在积极应对挑战、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寻求更高层级上的平衡。所以，这是一本以“入世”来“出世”的书。那些尝试看过佛法的书籍但难以身体力行的读者，不妨试着读读本书吧。虽然它走的是另一条看似截然不同的路径，但在结果上与佛法所倡导的正道、善良、智慧、温暖、平和是一致的。

第二个问题是：“你究竟是学什么专业的？”

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播音学士，新闻学纪录片研究硕士，电影学博士。

但如果不了解我的专业背景，仅从文字来看，猜什么的都有：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生物学？统

计学？复杂性与系统科学？

坦率地说，那些确实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对世界充满孩童般的好奇心罢了。不过，您可以放心，书中涉及到的那些专业知识并不业余。当然，它们一点也不难，没有理工科基础也完全能读懂。

把这本小书搞成了大杂烩，是因为当今世界已被专业分工搞得越来越支离破碎了，尤其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这两大门类之间壁垒森严、格格不入，它们迫切地需要整合。这件事迟早应有人做，而且最好由无知者无畏的人来做，尽管刚开始时必定做得十分笨拙。

因此，这本小书无从归类，只能姑且也称之为哲学。

第三个问题是：“哲学常常属于老年人……”言下之意，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女生有资格去探讨哲学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反倒更有信心。因为我是电影学博士。电影是艺术，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与哲学有相通之处。

全世界有那么一批聪明的、睿智的、深沉的、才华横溢的电影创作者们，通过丰富、细腻、生动的方式阐述着对人生的另类思考，它们涉及迥然不同的国家、文化、种族、价值观，涉及各种复杂情感的激烈碰撞，既包括大概率事件，又包括很多小概率事件，这是一笔多么丰厚的文化宝藏！

我在攻读博士期间的电影学研究，就是试图对大量电影样本进行归纳总结，此间竟无心插柳般地获得了某种哲学观感。这种观感似乎既能解释大概率事件，又能解释小概率事件；似乎既属于社会科学，又与自然科学不谋而合。这种观感，从严格意义上说已不属于任何一个人，而属于无数个大脑的集体智慧结晶。

因此，每当被质疑是否有资格谈论哲学时，我只能回应说：人类早已站在了比以往更高的文明阶梯之上。

人类的文明阶梯，或许也暗合了巴别塔的故事：人类联手建造通天之塔，只可惜在人类早期未能如愿。可是，当人类历史又走过几千年，当人类文明已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是否会因为某种禁忌而裹足不前？

时光已指向2012，在高科技环绕下面对纷繁世界的人们反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惑了。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似乎总在向着某种终极宿命前行。所以，如果心存困惑，何不仰望星空？头上的星空，总呈现出一派和谐井然的秩序，澄明而清澈。在那里，潜藏着我们想要寻找的一切答案！

上帝偏好椭圆

椭圆是天上所有行星的轨道。那么人的轨道呢？

幼儿园放学的时候，老师要等所有孩子都被家长接走之后才能下班，可总有些家长由于各种原因会迟到。

于是，有研究人员在幼儿园推出了一项实验性的新规定：如果家长迟到，就要付出一定金额的经济补偿。

那么请问，在推出这项新规定之后，迟到的家长是多了还是少了呢？

每当我在课堂上问这个问题时，都会有一部分人回答“多了”，另一部分人回答“少了”——实验结果是什么呢？迟到的家长实际上是多了！

为什么呢？

家长们可能会想：反正我付钱了，老师多等一会也没什么——细想之下，这符合人之常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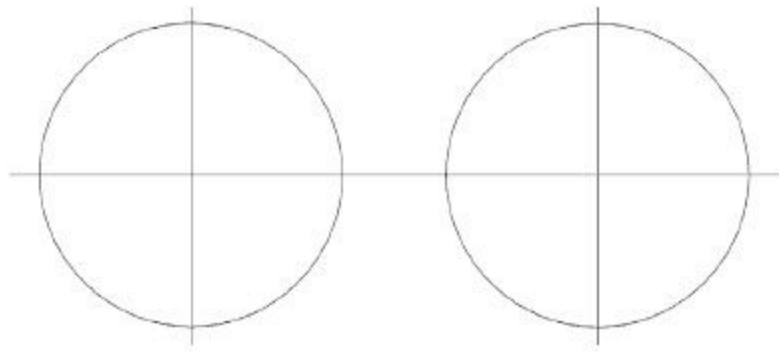
为什么会有人认为“少了”呢？按照经济学的传统观点，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经济利益驱动的，因此他们误认为家长为避免经济损失就会尽量不迟到。

不过，经济利益并不是人类行为动机的全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是这样想的，可急功近利的社会现实又让人产生疑惑，我们该怎么办呢？

答案或许来自不可轻易泄露的“天机”。

天机

请您判断一下，下边左右两张图是一样的吗？



没看出来？不必太在意，更不必怀疑自己的智商——因为当年哥白尼也没看出来。

1543年，当哥白尼发表日心说的时候，他采用的是“正圆形”轨道——也就是左图的那个圈圈。

大家知道，哥白尼的“日心说”比托勒密的“地心说”要更加接近真理——只可惜，哥白尼的理论预测数据与实际观测数据之间总是有一些对不上。

后来，一个年轻人开普勒对天文数据进行了仔细的核对。由于数据统统对不上，他只好想象自己登上火星，设法从火星上建构地球的运动轨迹。这项工作耗费了900页的计算，依然无法解决主要问题。他也试过从太阳来想象火星的运动情形。终于，计算有了结果：“我得到答案了，”开普勒在写给天文学家法布里休斯的信中说，“……行星的轨道是个完美的椭圆。”——右图就是椭圆（按照地球公转轨道绘制）。

左右两个圈圈看上如此相像（就算您拿尺子也量不出区别），但它们肯定是不同的，里面存在着误差。正视这种哪怕看似微小的误差，是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

开普勒提出椭圆轨道，是在哥白尼确立日心说之后60多年——正如前面那两个圈圈所显示的，误差实在太小了，以至于很难发现。常言道，“天机不可泄露”，在渺小的人类面前，“天机”是不会轻易揭开其神秘面纱的。

好在，人类有着顽强求真的科学精神，一点一点地逐渐认识到了宇宙的奥秘——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如此，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如此！

我个人认为，马克思相当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哥白尼。

在哥白尼之前，托勒密的“地心说”以地球为中心，需要建立77个圆周才能解释天体的运行，体系非常复杂。而哥白尼则指出各大行星都是围绕“太阳”这个共同的中心旋转，由此竟然使复杂的圆周的总数从77个减少到31个，问题由此被大大简单化、清晰化了。

人类的行为似乎是杂乱无章的，每个人的利益诉求、人生目标、生活态度都各不相同，社会看似纷繁复杂、毫无规律性可言，而马克思通过《资本论》的阐述，把人的行为统统集中到一个共同的中心上，也就是围绕“经济利益”团团转，于是问题得到了简化。

只可惜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圆形轨道还存在一些误差，而人的行为“一切以经济利益驱动”或许也有一点点误差（因为它无法解释诸如幼儿园实验那样的结果），除非我们能够用一种更加“求真”的心态来追问人类社会真正的运行规则！

这算不算某种“天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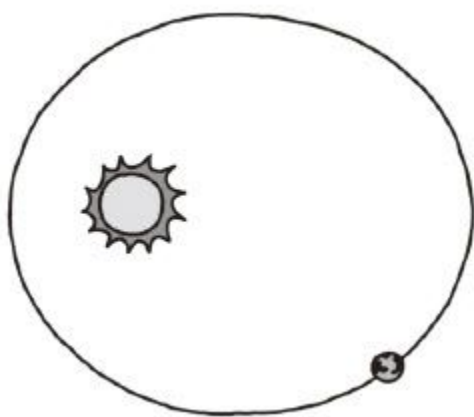
椭圆在人间

在现实世界中，很多人为了挣钱，一头扎进了钱眼儿里，或者都挤到同一个地方去抢蛋糕，其实未必是最明智的选择，至少这并非唯一的挣钱途径。

这其中的智慧，仍然来自神奇的椭圆。

我们仍然以上述的椭圆轨道为例子。如果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椭圆轨道，就会发现一系列惊人的巧合——套用一句俗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首先，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那么，太阳处于什么位置呢？它并不是在“正中心”，而是在椭圆中的一个“焦点”（ F_1 ）上，见下图（在这里，我们把椭圆画得“扁”一点，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一些。事实上，椭圆的偏心率不尽相同，偏心率越大就显得越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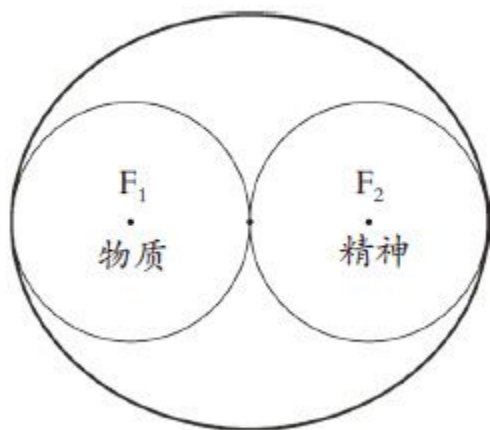


这有什么启发呢？

在这个椭圆中，一个焦点是看得见的（太阳），另一个焦点是看不见的（无物质实体）。但从数学意义上说，两个焦点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对称”的。

这是不是很像我们经常说的“物质”和“精神”呢？“物质”是看得见的，“精神”则是看不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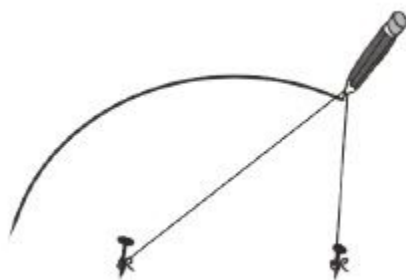
世界就是这么“巧合”，尽管真的很难解释，但这在天文学领域就是事实。我们把这两个焦点分别用“物质”和“精神”来表示，形成下图。



其次，椭圆意味着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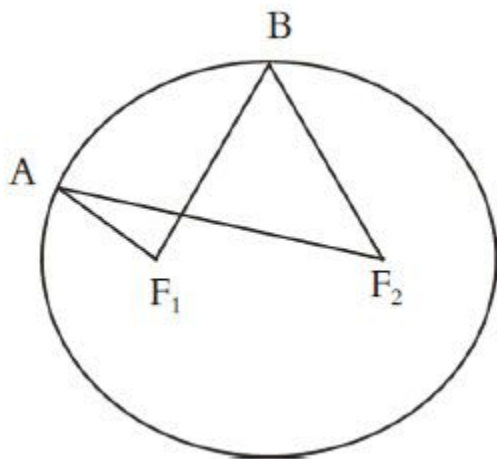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用手绘制一个椭圆，方法是这样的：在两个焦点（ F_1 和 F_2 ）的位置上各自钉上一根钉子，在两根钉子之间系上一根绳子（绳子长度大于两根钉子间的距离）。然后，用一支笔，把绳子绷紧，在

钉子的同一侧画出一道弧线；再把绳子甩到另一侧，同样画出一道弧线，两边的弧线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椭圆。如下图。



这说明了什么呢？

因为绳子长度是固定的，所以椭圆轨道上任意一点离两个焦点的“距离之和”始终相等（等于绳子的长度）。用数学语言来表述，也就成了椭圆的“定义”：椭圆轨道上的任意一个点，到两个焦点的距离之和相等，即 $AF_1 + AF_2 = BF_1 + BF_2$ ，如下图所示。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一个人离“物质”近了，离“精神”就远了。如上图中的A点，离 F_1 近，就必然离 F_2 远；反过来，一个人离“精神”近了，离“物质”就远了。这多像人类的生活呀！

人，无非是围绕着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而团团转（就像椭圆轨道一样）；而且，人的行为离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距离是“此消彼长”的，太

注重物质了，精神或许就欠缺一些；反过来，离精神近了，往往会以失去物质为代价。自然界的现象和人的行为如此相似，这是巧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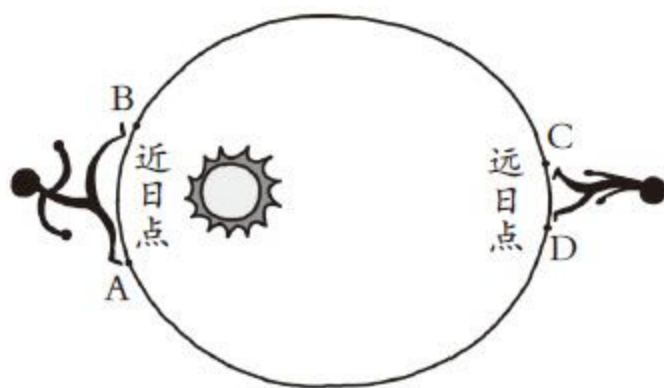
接下来介绍的“地球椭圆轨道”的其他一些特性同样是与人们的生活状态形成了一些有趣的巧合。

在地球运转的椭圆轨道中，既然太阳在一个焦点上，那么，对于地球来说，就会有离得近，有时候离得远，这分别被称为“近日点”和“远日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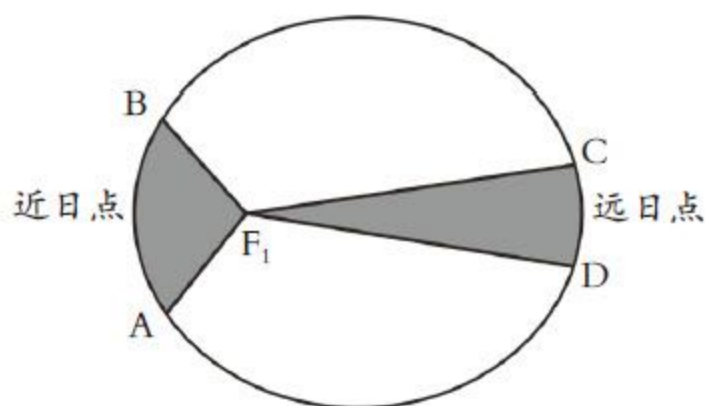
非常奇妙的是，地球公转运行的速度并不是匀速——宇宙规律的复杂性常常超过我们的想象。

在“近日点”附近，地球运行得快一些，仿佛在“跑步前进”一样，跑得很快，就好像现在的人们为了追求“物质”，开足马力，干劲十足！而在“远日点”附近，地球运行得慢一些，仿佛在“散步”一样，走得很慢，就好像现在很多人谈到“精神追求”时，似乎它是可有可无的，因而缺乏足够的动力，懒洋洋，慢吞吞。

这是不是很像人们的生活状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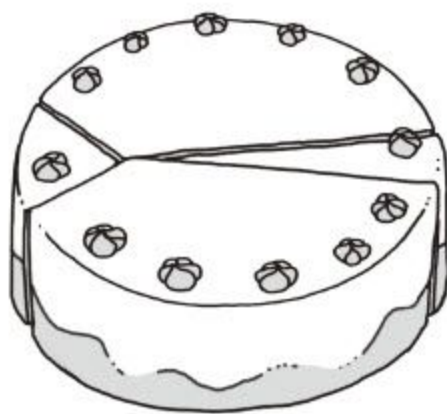


正因为速度有快有慢，所以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比如同样是一个月，地球在近日点附近走过的距离AB大于在远日点附近走过的距离CD。但有一个值是相同的——面积。如下图所示。



这两个阴影部分，对应的是“在同样长的时间内”（比如一个月）地球走过的轨迹（AB或CD）和太阳（ F_1 ）共同形成的扇形——两个扇形面积是相等的（这在天文学领域是一个常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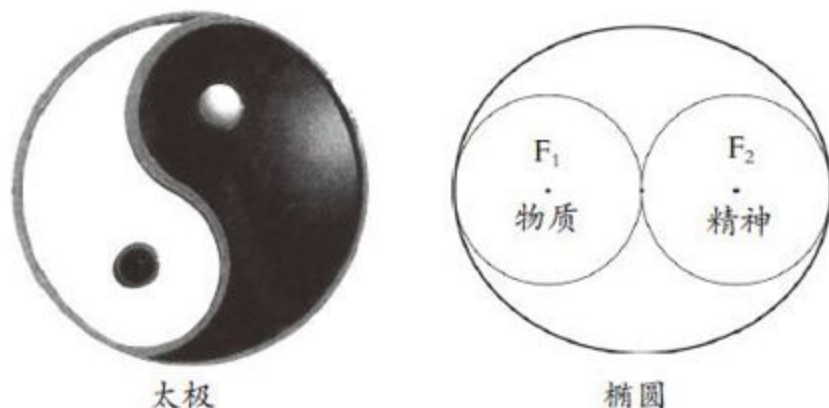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把这个“扇形面积的大小”视为一个人在围绕物质或精神团团转时所获收益的大小——就好像分切一整块蛋糕一样——那么它意味着：尽管在追求精神的时候，人似乎走得慢吞吞，但总体的“收益”却是一样的！



这在现实中很容易找到印证。比如，我们都知道应该让孩子读书、考大学，这就是通过精神方面的投资来获得经济回报——精神方面的投资是长线投资，它是无形的，但是事半功倍，总体上的收益一点也不小，甚至能带来“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椭圆轨道，灵魂落在了后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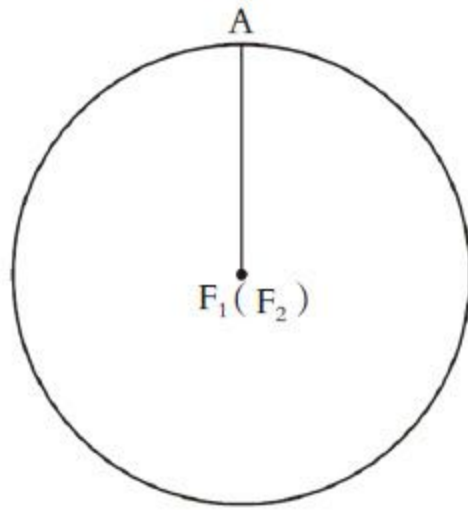
中国人讲究“太极”，其实“四两拨千斤”恰恰是太极的基本理念之一。如果我们把太极图和椭圆图相互参照，不难发现它们在理念上惊人地相似。



不管怎么说，“椭圆/太极”，似乎代表着一种更高的智慧和更普遍的法则。为何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认为“正圆”才是一种“最完美的形式”呢？如果用椭圆的定义来解释，“正圆”其实只不过是椭圆的一种特殊形式罢了——两个焦点相互重合。在这种情况下，正圆轨道上的任意一点，离两个焦点之间的距离之和始终相等，等于两倍半径。

所以，正圆也属于椭圆（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形式罢了），而椭圆法则则是更普遍的法则。

也或许，人们眼中完美的正圆寓意着身心完美融合。可是，现实生活哪能如此简单？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为稻粱谋，因此经常感觉在精神的追求上力不从心、甚至不得不时而背离了精神。想要做到两个焦点完全重合绝非易事。



更多的人，隐约感觉到目前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又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这种感觉非常好，至少说明那个精神的焦点是隐约存在的，只是周围的人对它视而不见罢了。

当然，还有一些人，一直在顽强地追求着精神品格，却时时遭到这个时代某些物质主义者的耻笑——其实，您大可不必怀疑自己出了问题，而是这个时代的物质虽然丰富了，精神却有待进一步成长和完善。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一则寓言：一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

都是“格局”惹的祸

人存在局限性，是因为格局太小。那么，格局指的是什么？

一天深夜，我和几个朋友去看电影，《黑衣人3》用3D方式让我们重拾了十多年前美好的电影记忆。这是一部科幻电影，其中高科技的部分当然与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有关，只不过今天看它似乎比十年前更真切了。除了奇形怪状的外星人之外，那些先进的科技仿佛已触手可及。

剧中，特工K去路边买了一个炸肉饼，于是作为拍档的特工J善意地提醒他：“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吃路边摊！我真怀疑他们用的是地沟油、瘦肉精！”这样的翻译字幕让全场笑喷。

对中国人来说，这笑声是一种何等无奈的时代共振。

近几年发生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地触动了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

2岁的小悦悦被车撞倒之后孤单而无助地躺在路面上，肇事司机逃逸，18个路人从旁边经过却视若无睹；陌生的老人摔倒了，很少有人再敢去搀扶；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毒胶囊……中国社会怎么了？

都是“格局”惹的祸。

图解“格局”

什么是“格局”？

在一部电影中，原始部落的长辈对即将成为部落领袖的年轻人说：“一个好人，会围起保护圈，照顾里面的人，包括他的女人和小孩；有的人，围起更大的圈子，照顾他的兄弟姐妹；但是有些人，有更大的使命感，他们必须在身边画个大圈圈，把很多很多人的利益都放在里面。”这，或许就是“格局”最核心的意义吧。

如果要给“格局”下一个定义，不妨用一句很通俗的话来描述，就是“个人所关注的利益圈大小”。



这张“格局”图是不是很简单？

简单的背后，大有深意。正如佛家所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想要真正看懂、看清格局，需要先对“格局”这两个字做一番剖析推敲。

“格局”文字考

我们能列举出一大堆与“格局”有关的词或短语，比如“局限性”“人格”“品格”“格物致知”等。

我们经常讲“局限性”，其中带有“局”字，我认为它就是“格局”的“局”——由于“格局”不够大，所以有“局限性”。

我们也经常说某些人具有“人格魅力”，其中的“格”也可能和“格局”有关——因为这些人的“格局”很大，所以具有“人格魅力”。

我们还经常说人应该追求某种“精神品格”，其中的“格”，也和“格局”有关——“精神品格”越高的，“格局”相对越大；反过来也一样，“格局”越大的，“精神品格”往往就越高。

比如“格物致知”，如果我们把它解释为“运用格局方法来看待事物时，就能获得某种认知”，或许也未尝不可吧？

乍一听，这是个很奇怪的解释，因为《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将“格”解释为“推究”，“致”则表示“获得”，所以“格物致知”意谓“推究事物，方能获得事物的知识”。

与“格局”二字有关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格调”“格格不入”“性格”……它们所包含的“格”，如果理解为“格局”，也都是解释得通的——我个人认为，这不能算是望文生义——因为就诠释学的理论来

讲，古人在造字、组词的时候，并不完全是随机的、毫无理由的，也许古人对于人生的领悟更直接、更敏感，所以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些重要信息，把它们潜藏在文字之中，只等后人去细细品味。

可惜，如果想在英文中寻找类似的对应关系，却并不像中文那般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英文词可以用来表示本书所说的“格局”。究其原因，和格局最本质的意义（“个人所关注的利益圈大小”）被忽略有关。

如果翻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会发现里面曾使用过这个义项。只不过在现代词典中已经没有了。

正因为如此，格局在英文中现有翻译有“pattern”“setup”“situation”“structure”，但是似乎哪一个也不能很好地表示“个人所关注的利益圈大小”这层意思。

或许，这种语词上的缺失，恰恰反过来说明人们对“格局”中“个人所关注的利益圈大小”这层意思的忽视。而这种忽视，恰恰是造成当今社会诸多不和谐问题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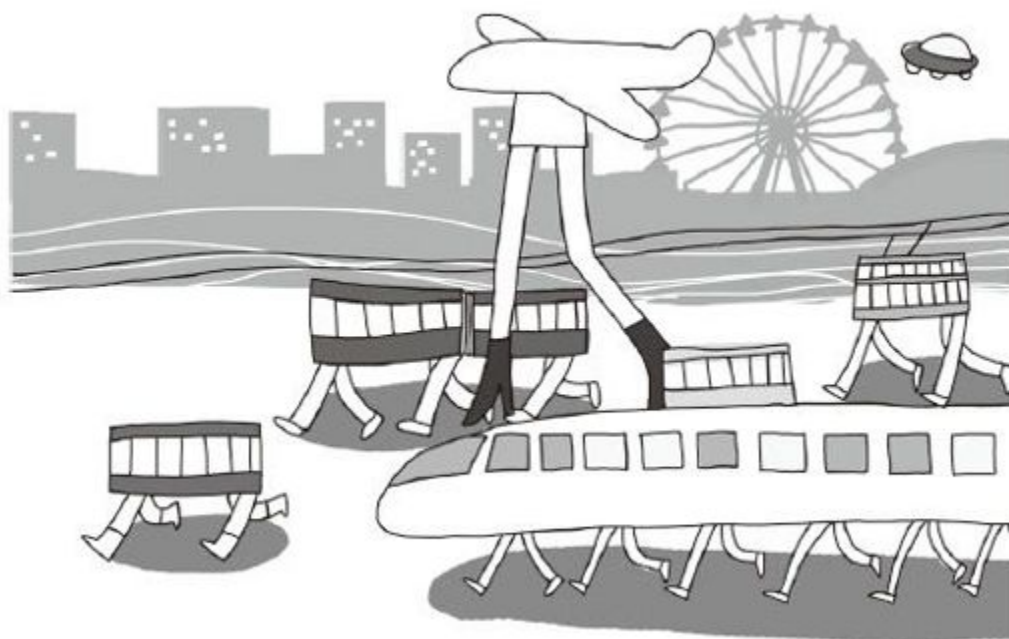
考虑再三，我选用了英文短语来表示“个人所关注的利益圈大小”，把“格局”翻译成“personal scope”。它虽然不像中文那么恰切，但勉强能让这个概念被更多西方人理解。

格局也要与时俱进！

回到小悦悦事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前文提到：都是“格局”惹的祸——现在人们的格局不够大，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所以，才出现了这一问题——人类社会一直在发展和进步着，但在精神意识方面，很多人的格局观依然停留在古代。

在古代，人们过的是男耕女织的生活，男人种田，女人织布，家里吃的、穿的统统自行解决。如果说古代人可以相当于“一个人”的话，当代人只能算是“一条胳膊”“一条腿”，甚至“一根手指头”。

“地球村”的概念是麦克卢汉首先提出来的。麦克卢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媒介是人的延伸。”比如，起重机是手臂的延伸，收音机是耳朵的延伸，车轮是腿脚的延伸等。



不仅如麦克卢汉所说，很多“现代化工具”是“人的延伸”，而且使用这些现代化工具的“人”也扮演了相应的角色，行使着相应的功能！

操作起重机的人，行使的是“手臂”的功能；开公共汽车的人，行使的是“腿脚”的功能；在媒体工作的人，行使的是“视听觉”等感知器官的功能……所以，人和人之间是“互为延伸”的。

当代的每个社会成员如果想保持自己作为“人”的完整性，就不得不把格局扩展到更多人。

大格局有着显而易见的好处，保险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保险”的理念是用更多人的力量共同来抵御风险，前提是每个人都要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但换来的是一份“保险”。尽管付出这笔保险费多少让人有点舍不得，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交纳这笔费用，我们已无法想象退回到没有保险业的时代。

这是社会向更高级的文明发展之后，对个人格局的倒逼——只可惜，很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由此才出现了一系列被人们称为“道德滑坡”的事件。

其实人在本性中是或多或少有大格局意识的：绝大多数人，其格局通常都不仅仅是自己，而是以家庭为基本的格局单元，自然而然地

会考虑到父母、子女、妻子或丈夫——但是，这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大格局，至少与当今时代的需求尚有差距。

把格局再放大一些，明白我们每个人和身边的人其实是相依相存的，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前景，我们的生活或许会随着格局一起豁然开朗。

一小步=一大步

个人在格局上迈出一小步，真能促使人类向着文明迈出一大步吗？

这年头的垃圾短信实在太多！如果每个人平均一天收到10条，在每条短信上平均被耽误30秒时间（听到提示音，拿起手机，打开短信息，阅读，恶狠狠地删除，生气……），加起来就是5分钟；中国约10亿手机用户，总共每天约有8000万个小时被相互耗费，这相当于1000万人的8小时工作日，按照一年250个工作日计算，相当于约有4万人一年的“全部工作”就是处理垃圾短信。真是既浪费资源，又破坏心情。垃圾短信就像城市牛皮癣一样，成了高科技产品的寄生虫，挥之不去。

比普通垃圾短信更可恶的，就是诈骗短信了，最司空见惯的莫过于“请把款汇入××银行，账号×××，户名××”。我们该拿它们怎么办呢？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大格局中显智慧

有这样一道智力题：小明有10个空饮料瓶，按照饮料公司的促销规定，3个空瓶可以免费兑换一瓶饮料。请问，小明用这10个空瓶，一共可以喝到几瓶饮料？请您先想一想！

正确答案是：5瓶。

怎么会是5瓶呢？

10个空瓶，其中的9个，可以换3瓶。这3瓶喝完之后，又可以换1瓶，再喝完之后，总共剩下2个空瓶。然后，小明向小卖店老板赊了1瓶，喝完之后，把3个空瓶还给他，两不相欠。



一个充满智慧的故事，也是一个大格局的故事。

就像那位小卖店老板一样，格局稍微大一点点，对自己没什么损害，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不也很好吗？

而小明也足够智慧，他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时间上的大格局，稍稍地借用一点将来，然后有借有还，在一段更长时间内保证了收支平衡。

现在，让我们向这个故事学习：做个聪明人，格局大一点！

做个聪明人，格局大一点

让我们回到垃圾短信和诈骗短信问题上。

相信很多人都收到过那样的诈骗短信，那么，您的反应是什么？

不理它？那当然！显然那是诈骗。但也的确有人糊涂到给里面汇款（或许因为确实有几笔账需要汇，而自己又没有仔细核对信息），于是就给了诈骗者可乘之机。

问题在于，虽然人们上当的概率很小，但诈骗“风险”同样也非常小：收到短信的人，基本是两种反应：不理它，或者汇款。

但是，还有第三种选择：拨打110报案（只要格局稍稍大一些，就会选择这种方式）。

诚然，由于公安机关警力有限，难以对所有此类案件一一回应，但如果警方能建立一个相关资料库，同一诈骗源被举报的次数多了，就应当引起更多重视并优先处置，那么发出诈骗短信越多的人，就意味着被举报和被惩处的风险也越大。

当然，这种解决方案的实现前提是：收到诈骗短信的人们更多地提供“举手之劳”来报案。可是，因为报案的人不够多，所以这种已出现好几年的低级诈骗手段依然存在。

同样的道理，如果有朝一日人们实在不堪广告类垃圾短信的困扰，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惩治它们（想做广告，其实还有很多合理的途径有待开发）。

假如我们足够聪明，就会让自己的格局大一点，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展！

每人格局大一点，世界将会怎样？

每人格局大一点——不用大太多，哪怕一点点就好啦！

无论是一瓶汽水，还是一个举报电话，都不过是举手之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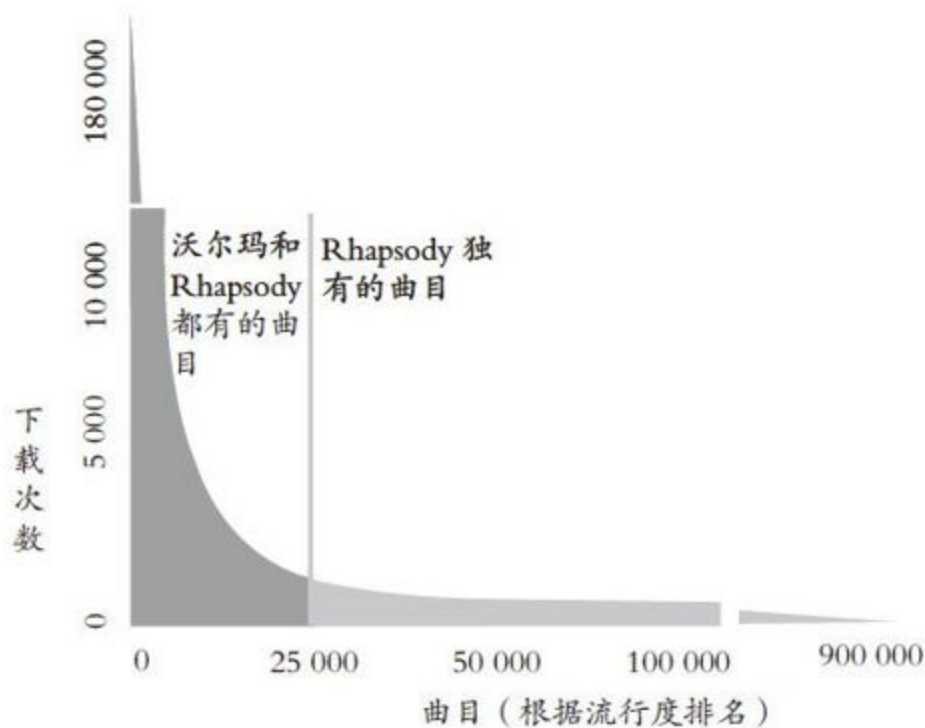
您可不要小看这“举手之劳”——有一个典型的正面案例就是“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儿童”，这个倡议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并且确实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些案例所共同揭示的规律是非常微妙的：大家都知道，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大家的信息相对闭塞，想要获取某些信息，不得不求助于图书馆或者专业人士，而当有了互联网之后，“获取信息”变成了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它的原理就在于“每个人只提供自己所拥有的信息”，然后所有的人便实现了共享。

如果要对其效果给出一个数字，我认为“长尾理论”是比较合适的。

什么是“长尾理论”呢？它和我们熟悉的一句话有关，就是“20%的人掌握80%的资源”——这也叫“80/20法则”或“帕累托法则”，它被证明是普遍有效的——那80%的人就像是长长的尾巴。

用下面这张图来表示是很形象的：



这张图引自《长尾理论》一书，提出这一理论的克里斯·安德森最早是在“数字点唱机”领域发现的这一规律。安德森说，2004年1月，Ecast公司（一家“数字点唱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范·阿迪布让他猜这样一个频率：收录在点唱机中的一万张专辑中有多少张能达到每一季度至少被点播一次的频率。

安德森原本以为，根据80/20法则，正常的答案应该是20%。但是范·阿迪布说在数字产业中，这就有点不同了。所以安德森决定冒一冒险，猜是50%。但实际上，他的答案依然差得太远太远了。正确的答案是98%。

虽说“长尾理论”和“帕累托法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但从上面这张图中不难看出，它们并不矛盾，只是关注点不同。

图中深色的部分是20%的重点产品（或VIP客户），它们产生了80%的收益，这就是帕累托法则的“头部”。

过去人们往往只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曲线的“尾部”忽略不计，因为“尾部”需要投入80%的精力，却只能产生20%的收益（这也就是多数商家会选择关注少数几个VIP客户，而无暇顾及大多数普通消费者的原因）。

不过，在网络时代，情况发生了微妙却惊人的变化：由于“关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能够以很低的成本“关注”正态分布曲线的“尾部”——在某些情况下，关注“尾部”产生的总体效益甚至可能超过“头部”。

例如，某著名网站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广告商，它没有一个大客户，收入完全来自被其他广告商忽略的中小企业——因此，克里斯·安德森认为，网络时代是关注“长尾”、发挥“长尾”效益的时代。

那么，“长尾理论”和“大格局”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长尾理论实现的前提是有无数网民的参与，也就是“多点式”的分布，每个人提供他个人所拥有的资源，这个资源无论多么“小众”或“冷门”，总有能用得上的时候，正如歌曲98%的点播率一样。

第二，长尾理论意味着“关注成本的降低”，即不需要超大规模的仓库来储存货物，因为不同的产品分散在不同的提供者手里；同样，也不仅仅依靠某个职能部门来实现完全的管理——比如，要让公安机关去单独追踪某个特定的失踪儿童，花费的成本非常高；而每个公民留心自己身边的弃儿，其成本相对较低。正是由于关注成本降低，所以才能够带来长尾效应。

第三，长尾理论揭示的比例是令人深思的：20%——虽然听上去只是少数，但如果像某些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整个社会正在走向“溃败”，那么，这20%或许就意味着由死向生的转变，意味着某种走向复苏的可能。套用一句众人皆知的名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

试着迈出一小步吧！

您是否注意到，“步”字的上下结构，其大体意味着“止于少”？一小步本身并不大，但即便如此，很多人也不愿意迈出这一小步。而恰恰因为太多人迈不出这一小步，所以人类才难以迈出那一大步。

古人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以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龙应台曾在很多年前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她说：“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

——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这就是一种“大格局”的呼吁了，这个呼吁出现在约30年前（该文曾经广为流传，可见这个“每个人迈出一小步”的方式是颇具诱惑力的），而现在的世界依然存在同样的问题（个人的“格局”依然不够大）。试想，每个人都多一点点责任感，这个世界会增添多少可能性？！

不要犹豫，迈出这一小步吧！

或者，如果您还缺少一些实实在在的动力去迈出这一步，可以接着往下阅读。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人格局的大小，和他个人的幸福息息相关！

权势尊位功名利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

每个人对幸福和快乐的定义各不相同，但在幸福和快乐的话题上不能够存在共识吗？

穿越到大约二千年前，濮河边。

庄子正在悠闲地钓鱼，楚国国王派两位大夫前去请他做官。

他们对庄子说：“想将国内的事务劳累您啊！”

庄子拿着鱼竿，头也没回，懒散地说道：

“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有三千年了，国王用锦缎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愿死去留下骨头让人们珍藏呢，还是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呢？”

两个大夫说：“情愿活着在烂泥里摇尾巴。”

庄子说：“请回吧！我要在烂泥里摇尾巴。”

这就是极品的庄子——功名利禄权势尊位，在庄子看来都不如像神龟一样赖活在烂泥里，悠闲地摇着尾巴。

每个人都想要追求快乐幸福的生活，这一点恐怕没有谁会反对。但是对于“人如何才能快乐幸福”这个问题，每个人却有着不同的答案。

生活的“一团乱麻”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当人们在数千年中不断争论“人如何才能快乐幸福”，并由于各执己见而争得面红耳赤时，这个世界的秩序一直就隐藏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

这可以从最简单的生活景象说起：

走到花园里，经常会在那里看到随处横放的浇水管，从远处看这些浇水管，就像是一维的。但走近来看，水管的第二维（管壁上环绕管道的那一维）就显现出来了——第二维因为尺度很小，通常会“卷缩起来”，不容易发现。为了看清它，你得用更高的精度来看它们。这是由B.格林所著的超弦理论经典著作《宇宙的琴弦》中所描绘的景象。

这个例子强调了空间维的一个微妙而重要的特征：空间维有两种。它可能很大，延伸远，能直接显露出来；它也可能很小，卷缩

了，很难看出来。这根水管还只是空间卷曲最简单的例子。

同样，这个理论也可以用地毯的例子来说明，从远处看，铺在地板上的地毯，只是一个平面，但是如果把它的局部放大，有可能在这平面中卷缩着很多维。

这些卷缩的维可能以六维空间的形式呈现。那些谁也不曾想过的维，紧紧地卷缩成一个看起来眼花缭乱的形状，这是卡拉比—丘成桐空间（亦称“卡—丘空间”）的一个例子，它看上去很像用来洗碗的钢丝球（甚至比那更复杂），就像是“一团乱麻”。

按照超弦理论，宇宙多余的维卷缩成很多卡—丘空间，也就是说，在寻常的三维展开空间的每一点上，都有可能生出一个卷缩着的六维空间，而这些维度是无处不在的，它们加在一起，使得宇宙的维度总共有11维之多。

即便对于理工科出身的人来说，想要完全读懂超弦理论也是有难度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就其结果展开某种浪漫主义的联想。

回到“人如何才能快乐”这个既古老又历久弥新的话题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各抒己见，每一种听上去都有些道理，却又不尽相同，它们会不会也像“卷缩的六维”一样，相互纠缠，其实是“和谐共存”的呢？六个维度，其实可以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这同一个平台究竟是什么呢？

一只小小小小鸟

关于“快乐”的相互纠缠的“一团乱麻”，如果要放到同一个平台上，不妨用个“虚化”的词来指称，即“向上”——这个多数人都容易理解。

什么是“向上”？所有“好东西的增长”就是“向上”。

什么是“好东西”？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想要获得的东西”。

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想要获得的东西”？那就因人、因时而异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功名利禄权势尊位”；对于庄子来说，则是“在烂泥里摇尾巴”。

不管想要的是哪种好东西，只要它不断地增长，就会给人带来快乐。把它变成一个“虚化”的方向就是“向上”。而且，在“向上”这个方向上，隐含着大量彼此密切联系、相互纠缠着的因素（它们是不同维度的表述，但方向基本相同）：



向上、增长、快乐、
控制、拥有、强大

这张图，可以用一句改编歌词来表示：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飞得更高！

由于“高”可以翻译成英文“high”，所以我们常常误以为只有“高”才让人“high”，其实，“飞得更高”这个过程才真正让人“high”——想要获得快乐，或许更重要的是“向上”的过程。

“向上”与“快乐”直接相关，这其实不难理解，正如这样一些话：“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强！”“步步攀升！”“更快、更高、更强！”“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读这些昂扬向上的语句本身就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因为我们从读它们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向上”的态势。

每个人都在寻找一种幸福和快乐的生活，在我看来，让自己快乐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天天向上”：每天找到“一个点”，或者“几个点”（金钱、健康、安全、亲情、爱情、友情、知识……那些我们需要的好东西），增长一下，就会快乐——“天天向上”，就能“天天快乐”！

快乐的心境，总需要自己来经营，需要付出时间、精力、勤奋、智慧去浇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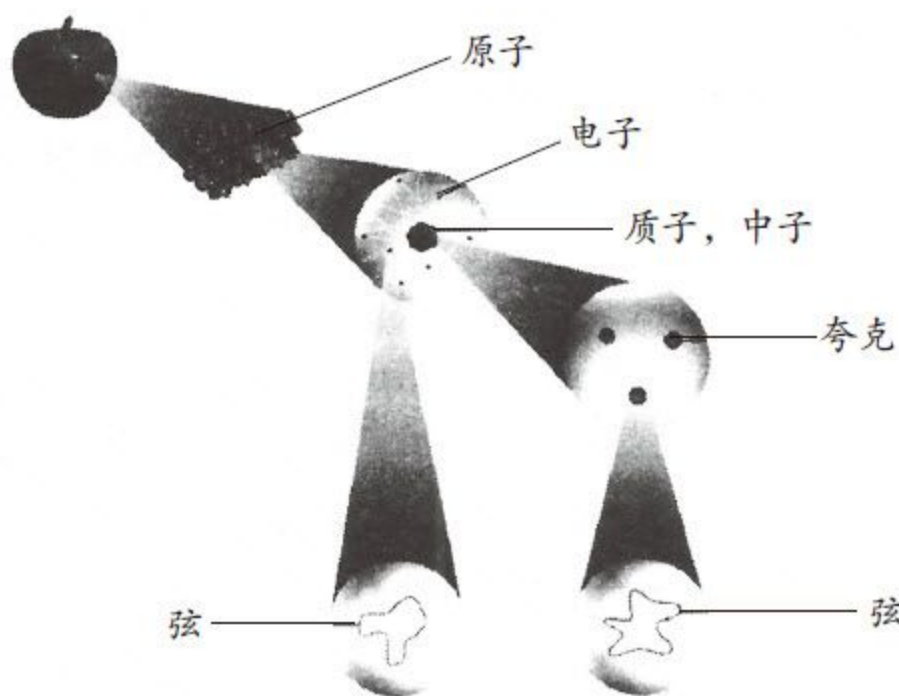
权势尊位功名利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

权势尊位功名利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这之间有关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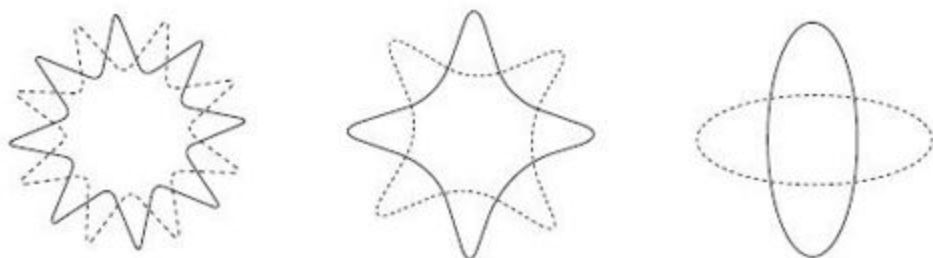
从抽象的哲学层面看，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

氢氦锂铍硼碳氮氧，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元素，它们包含着同样的质子、中子和电子，只是这些“质子中子电子”组合的方式不同而已，于是就形成了表面看来各不相同的化学元素。

比“质子中子电子”更微观的粒子，则是夸克。下面这张图摘自《宇宙的琴弦》，它是把一个苹果不断往下细分的示意图：



根据弦理论，所有这些不同粒子，分到最后可能都是一根闭合的“弦”（类似于牛皮筋）以不同频率振荡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同一根弦，振动频率不尽相同，就形成了不同的粒子。超弦理论的提出，就是在寻找不同微粒背后更普遍的形式（更多相关内容，将在后面的《小心！珠穆朗玛峰再高一倍就会倒掉！》中作进一步介绍）。

上述是“比微观更微观”的情况，那么“比宏观更宏观”的情况呢？

对于生活在宏观世界中的人来说，权势尊位功名利禄，这些看似各不相同的目标，它们所蕴含着的快乐原理或许是相通的，其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向上”的（权势地位越来越高、钱越挣越多、成就越

来越高、声名越来越显赫……都是“向上”的），只不过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于是就变成了似乎各不相同的人生追求。

每一个人——在此我们要很认真地强调，是“每一个人”——无论您的人生信条是什么，权势尊位功名利禄……一切目标，都可以被视为“向上”的追求，这是不变的。

或许，纷繁复杂事物背后的一致性在“更宏观”和“更微观”两个向度上才能找到。

人类的历史，总包含向着“终极”的探寻，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也到达不了，但是，探寻的每一段历程所留下的印迹，都意味着人类在心智上更加趋近于成熟——因为，越简单的，越是本质的东西。

哲学的好处，则在于它的简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如果哲学提供的答案是简单、有效的，那就很容易记住它，不会让人在纷繁复杂的“一团乱麻”中迷失。

一个人，能够以简单而清澈的方式，过上快乐而幸福的生活，无疑是一种至高的智慧。正如古希腊人对“哲学”的界定，就是“爱智慧”。

相信爱智慧的您早已对“不变的快乐法则”了然于心：快乐，是一种“向上”的过程！

痛并快乐着，并非不可解释

人性都是卑劣龌龊的吗？

有一部著名的电视专题片，讲到了这样三个男孩：

第一个男孩，举起一根木棒，把一朵盛开的美丽向日葵打得花瓣凋零；第二个男孩，扛着个大背包来到海滩上。他从包里拿出了铲子，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很深、很长的沙坑；然后，从包里取出一些削尖了的木棍，插在沙坑里，锋利的尖头朝上；再然后，他退到几米之外，起跑、冲刺，迈开大步跳过了那个很深、很长、很疼人的沙坑！第三个男孩，在一次家族聚会上。全家人正在给90岁的老奶奶过生日，忙活了一整天，做了一大桌丰盛的菜肴。这时，妈妈让男孩表演一个节目，男孩的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转，突然，大叫一声，抓住桌布，将它扯下！

这三个男孩怎么了呢？是人性反常吗？还是当今的教育出了问题？抑或是由于人性本恶呢？

人心，如此简单清澈

这三个男孩的行为，说明了什么呢？

人性都是追求真善美的！

第一个男孩，他或许把自己想象成了古代一位孔武有力的战士，正在面对入侵的敌人或者野兽，进行英勇的殊死搏斗。

第二个男孩，他或许想证明自己有多么勇敢：这么危险的地方，我都敢跳过去，这不是很勇敢吗？

第三个男孩，他或许想表示自己很有个性：你们都不敢这么做，只有我敢，所以，我是最有个性的！个性，不也是我们经常赞颂的一种优秀品质吗？

于是，世界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一些离谱的、邪恶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故事，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或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追求着真、善、美。

在唐纳德·帕尔玛的伦理学著作《为什么做个好人很难？》中有这样一幅插图，其标题为“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善意铺就的”：



用这种方法，我们能以某种方式重新探讨“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问题：人性都是追求善的——只是有时候过于局部和片面罢了。

用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可以来解释人性中很吊诡的一面。

比如很多人认为受虐倾向非常不可理喻。但或许，受虐的同时，带有某种雄壮、豪迈、坚忍之美；也或许，受虐的过程使人之感官达至了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满足了人对自身身体极限的某种好奇心，总之，痛并快乐着，并非不可解释。

不过，由于人心还没有那么敏感，以至于难以仔细地辨别出“快乐”只是和“向上的、真善美的”那一部分相关，于是有时候爱屋及乌地认为一切能够带来某种快感的東西，在“总体上”都是好的。

也就是说，“动机”和“结果”往往并不一致——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或“驱动力”，或许都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哪怕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或者只在潜意识中意识到。

心理的“趋光性”

我的一位大学本科同学，在读完我的上一本哲学专著之后，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聊了很久。

她说，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太困惑了，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却因为残酷的社会现实似乎“实际上”在倡导另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手段。所以，我的那本哲学专著，让她特别有感触的是其中关于“趋光性”的描述（事实上，由于那本书的内容比较多，“趋光性”这个词只是点到为止，没想到却给了她最多的道德理由）。

“趋光性”，源于人类的一种生理本能，比如古时候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现在尽管有灯光扰乱了白天黑夜，但多数人依然是白天活动、晚上睡觉；而且人们普遍感觉晴天让人心情愉悦，阴天则使人莫名伤感等。

或许，其实人在心理上也同样存在“趋光性”——人总是在内心深处追求着某种光明的、向阳的、温暖的东西。无论人的行为如何复杂异常，光明仍是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

人性和陀螺，会有什么关系呢？

2008年冬天，某位很知名的老师来广院做讲座，说起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是留下了太多不可磨灭的记忆：除了成功举办奥运之外，还伴随着南方低温雨雪、华南和中南的洪涝、汶川地震、新疆干旱、四川泥石流……也是这一年，温家宝总理在黑板上写下了“多难兴邦”四个大字。

世上本无完美之事，人类注定要在蜿蜒曲折中前行。

在那次讲座中，这位老师还提到了自己的一次生活经历：“世上难有完美的东西！圣诞节前后，我和几位朋友约在一个酒店的大堂。因为过节的缘故，这里布置了很多竹子，远远一看，青翠欲滴，非常好看！我的朋友们都说：‘真好看呀！这些竹子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说：‘肯定是假的！真的竹子怎么会一片黄叶子也没有？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这竹子肯定是假的！’后来等我们走近一看，果然是假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同学们听到这里，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没错，世上难有完美的东西，这个结论大家都接受，只不过，那位老师讲的故事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论证”。该故事的逻辑大致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所以……所以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这是一种循环论证。

世上难有完美

世上难有完美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一切真善美的东西，本来就处在不同的方位上！

比如，“勇敢”和“危险”相连（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才能体现出勇敢），而“危险”和“安全”又是一组反义词。所以，尽管“勇敢”和“安全”都被视为是“美好”的东西，但它们几乎在相差一百八十度的不同方位上。

再比如，“华丽”是一种美丽，但“节约”也是一种美德，古今中外，凡“华丽”者，往往不太容易兼顾“节约”，这两者也几乎在相差一百八十度的不同方位上。

不过，在某种很小的概率下，那些几乎处在相差一百八十度不同方位的东西，也能奇迹般地相互结合。比如，中国古人建造一段长城，按理说如此宏伟的建筑很难做到节约，但居然也可以在设计时仅仅多出一块青砖以作备用，这一块砖放在城墙上，让世人慨叹设计者的掌控能力和建造者的精打细算。只可惜，省了料，却未必节省人工，于是又有了“孟姜女哭长城”的凄美传说。

现实生活中，类似的残缺之美数不胜数。

比如，“多难兴邦”，我们都见证了中国人民恰恰由于灾难降临而被激发出了更强的凝聚力。

比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溢美之词让人听了心花怒放，但它未必就是真实的；真实的评价虽然符合求真原则，却未必中听。

比如，“良药苦口利于病”，有利于身体健康的东西，口感上未必是美味。

比如，有的人行事莽撞，但常常伴随冒险精神。这种人在陌生环境或者应对新的挑战时，比小心谨慎的人更果断和坚决，也就更容易发现新的机遇。

比如，有的人不爱说话，习惯于沉默，但也恰恰是这种人更能够保守别人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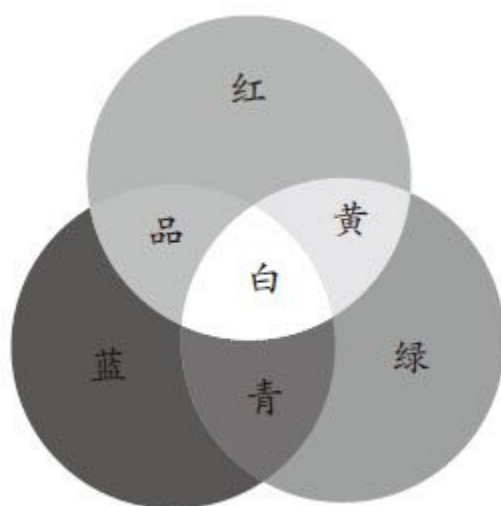
比如，有人做事丢三落四，看起来稀里糊涂，但同时也往往心胸开阔，不会小肚鸡肠、斤斤计较……

世事就是如此，人世间难有完美的东西——只因为所有美好的东西，它们压根儿就不在同一个方位上！

美丽的白色光

让我来打一个比方：所有美好的东西加在一起，就像是一束白色的日光。我们透过棱镜，能看到它被分解成五颜六色，如此绚烂迷人，令我们心驰神往，但它们都只是局部而已，我们所看到的、触摸到的、欣赏到的那些绚烂，都只是终极白色光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真善美，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三原色，它们互补，同时又互斥——所有一切的美好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只是任何一个个体都难以达至这种境界。



因此，没有人是真正意义上“完美”的。不过，依然不能否认，人的品格确实存在高下之分，人的行为确实存在美丑之别。

以最简单的方法来评判，真、善、美，如果只做到了其中的一条，那就只能打三十来分，属于严重“挂科”。

做到两条，没有做到另一条，那凑合能打六十来分，刚够“及格”线。

如果三条都基本能达到，那就可以打到九十多分，这就是值得表扬的“好成绩”了（因为程度上可能还略有欠缺，所以想得一百分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列举教科书上倡导的美德，不难发现它们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聪明、勤奋、理性、纯真、宽容、严格、欣赏、诚实、忠诚、孝顺、独立、信任、威仪、亲和、仗义疏财、勤俭持家、持之以恒、灵活应变、自信、自知之明……

用上述“挂科”“及格”或“好成绩”的评判方法来分析现实生活中几个鲜活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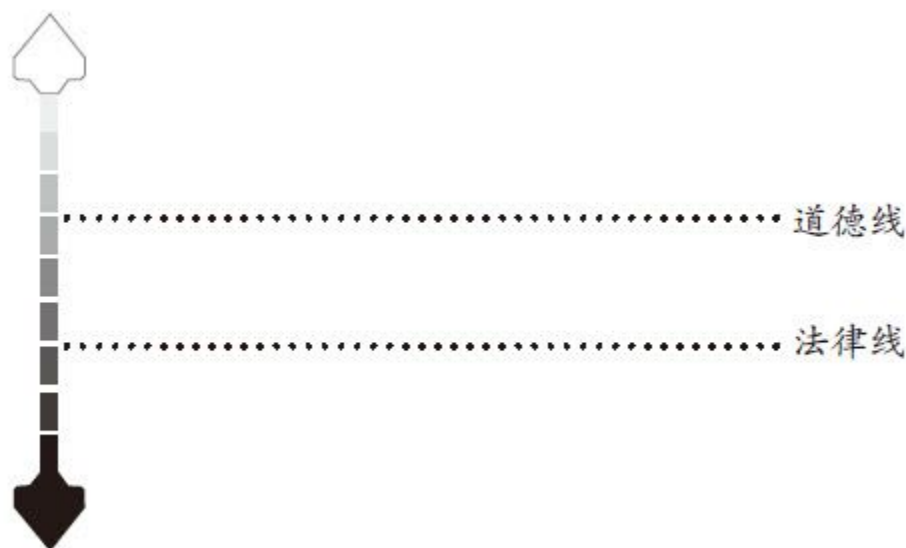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原本是想说“持之以恒”能够带来惊人的效果；不过，如果谁真的用铁棒来磨针，只能说明他不够“聪明”，不会“灵活应变”，又很“浪费”时间，总体算下来，严重不及格！

苏东坡在临终之前曾说：“吾生无恶，洁白无瑕，死必不坠。”（意思是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坏事，洁白无瑕，死了之后一定不会下地狱”。）因此，他最后能“谈笑而化”，苏东坡的这种坦荡境界着实让人心生敬佩。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想要做到完全洁白无瑕恐怕是有难度的一一白色光近乎虚无，我们“看不见”它，它几乎只是一个传说。

不过，总体而言，有些人的行为更接近终极的白色光，有的人则有更多的污点和阴暗面。不同的人，处在从白到黑的狭长过渡带上。

过渡带上有两条明显的界限：一条是道德，二条是法律，它们的分数不同。逾越了第一条线，在道德上是不值得称颂的；逾越了第二条线，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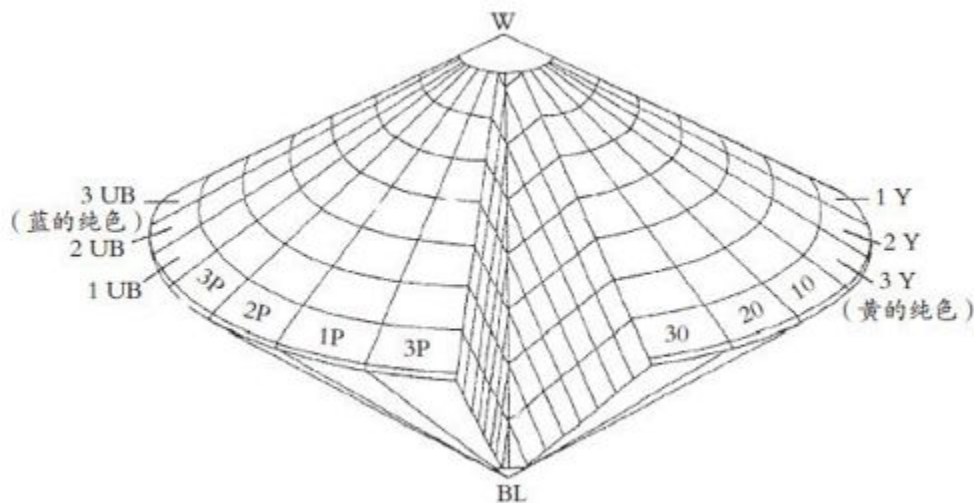


对于存有争议的事物，其实也有一个较为理性的判断方法：大数法则——我们不能只站在某一个人的立场上，而是应该引入更多人的声音，用百分比来说话。这其实就是常见的“民意调查”。

对于真正能打高分的人或事，自然有相对更多的好评（比如奥运会上凭借自身实力获得冠军的人），而那些引起争议的人或事，或多或少有这样那样的瑕疵；至于很多炒得异常火热、争论异常激烈的事件，往往因为在“及格线”上下，所以才让大家争论不休。

颜色是立体的

关于色彩，奥斯特瓦尔德曾将不同颜色组合成一个立体的陀螺形状：



最靠上的顶端W表示白色，最靠下的底端BL表示黑色，贯穿上下的中心轴是从白到黑的过渡；在水平方向上，随着离开中心轴越远，色彩的饱和度（即鲜艳程度）越高，比如纯蓝、纯黄等。

我们可以把这个陀螺理解为前面两张图的综合体（三原色图是水平方向的，从白到黑的过渡是垂直方向的）；而陀螺中的每个不同区域，都是不同的“三原色”和“深浅不同的灰”以各种比例混合的结果。

也许，不同人的精神追求可以类似地“组装”成这样一个“魔幻的彩色陀螺”，每个人的追求似乎都能在其中找到相对应的位置。（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不同事件中可能会有所差异，但这张图比较形象，它意味着每一件事情的好坏都是可以标记的。）

这就是说，人性“重口味”——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每一件所爱之物也必然有可爱之处。

关于人性的种种争论，或许可以从这张色立体图中获得某种解释——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也不能简单把人分成好人坏人，它们既是相互割裂的也可以相互统一，它是丰富而立体的！

更神奇的是，这张色立体图也暗合了某种学界公认的“社会分布”景象，那又是什么呢？

巧合：纺锤型社会分布

由陀螺的形状可联想起某种社会分布——在社会学中，人们时常探讨哪一种社会分布模型更合理，比如金字塔型、纺锤型（亦称橄榄型）、哑铃型……相比较之下，纺锤型的社会结构是多数学者认为最合理的社会结构。

按照我的浪漫主义联想，这个纺锤型或许和奥斯特瓦尔德的色立体模型有某种神秘的关联——至少它们在整体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只是细节不同而已，毕竟，无论“纺锤”“橄榄”还是“陀螺”，都是一种虚化的描述，表示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意思）——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用色立体图来“证明”纺锤型分布的合理性，但这个色立体模型或许也能提供某种更为形象的参考和启迪。

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如果由高道德（接近“白色光”）的人占据社会的顶层，那么整个社会无疑将更加有序（在后面的《“上”清“下”浊》和《高官与高道德》中，将继续探讨这种社会分布的合理性及其实现方法）。

尽管想要完全实现这种理想的分布，无论在什么样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都有一定的难度，但至少从理论上说，它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对于每个人而言，无非是要让自己尽量拥有更多优秀品质，这样才更有可能在陀螺中占据一个更高的位置！

人性之争的终结

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历经两千多年的争论，已到了该判定结果的时候。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讲述了一个不幸的故事：

一个名叫冉阿让的年轻人，从小失去父母，由他的姐姐养大成人。孀居的姐姐有七个孩子，最大的才八岁，最小的一岁。冉阿让为了报答姐姐的养育之恩，四处打零工挣钱养活这七个孩子。

有一年冬天，生活实在太艰难了，他找不到活干，家里连一丁点儿面包渣都没剩下。无奈中，冉阿让在深夜打碎了面包店橱窗，偷了一块面包。还没来得及跑远，他就被店主抓住了。此时，他已经把面包丢下，但胳膊上还流着血……由于这块面包，冉阿让被判处五年的监禁……

雨果的这个故事是有真实来源的：1801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穷苦农民，因饥饿而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刑满释放后，持黄色身份证找活干又处处碰壁。

生活在19世纪的雨果在书中写道：“一项英国统计表明，在伦敦五件盗窃案中，有四件是由饥饿直接引起的。”

格局：解开人性之争的钥匙

因饥饿而偷东西的人，是坏人吗？人生来就是自私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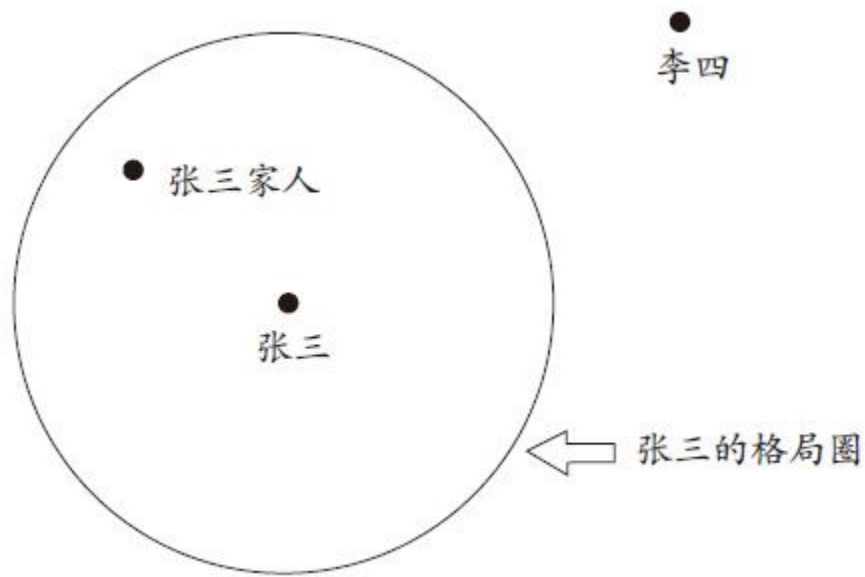
或者，用更宏大的方式来提问：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在我看来，“人性本利己，格局有大小”。而所谓“善恶”的区别，其实和“格局大小”很有关系。

听上去很像偷换概念。我们先来看看格局大小是如何影响到善恶判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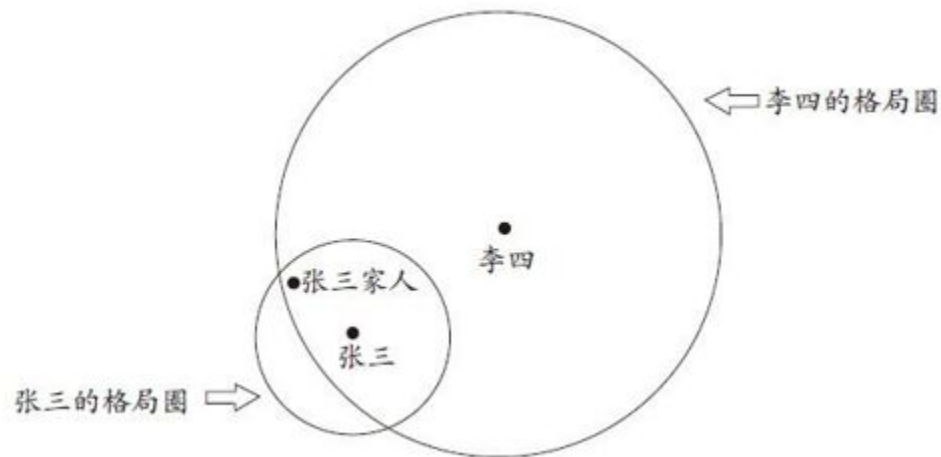
举个简单的例子：张三的家人快要饿死了，张三因此去偷了李四的面包，那么，张三的家人会觉得张三是善的还是恶的呢？他们很可能觉得张三是善的，因为张三的格局把家人包括在内了。

但是，被偷了面包的李四会觉得张三是善的还是恶的呢？他很自然地会觉得张三是“恶”的，因为张三把格局分界线划在了自己和李四之间，把李四排除在自己的格局范围之外。



但是，如果李四的格局足够大，在心理上把张三和张三的家人也包括在内，他可能会觉得，反正自己正好有一个富余的面包，张三拿去也挺好，至少还能救人性命，所以他不会觉得张三是“恶”的。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格局的大小是如何影响到我们对于“善”与“恶”的判断的。



因此，与其争论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不如先用一个中庸的、客观的方式来表述：“人性都是利己的”。

其实，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一来这个宇宙的秩序或许本来就如此（后面将在《“我”是全世界的中心》一文中解释这种秩序），二来这

种设计自有它的好处（在《世界不只你一人》一文中将阐述这种秩序的好处）。

我们不妨将人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人性都是利己的”，然后看看格局大小如何对善恶产生了影响。

每个人的行为，在他自己的格局圈之内，都可以被视为“善”（利己）的；但是，因为格局太小，很有可能因此将别人的利益排斥在外，甚至剥夺了他人的利益，那么在这个格局圈之外的人们看来该行为就会变成“恶”（损人）的；相对来说，“大格局的利己”，将更多人都包纳在格局范围之内，更多人会感受到这个行为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该行为会被视为“善”（利他）的。

所以，格局越小越容易表现为“恶”，格局越大则越接近于“善”。虽然不能说“百分之百”地严格对应，但这里面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其趋向是鲜明的。

用这种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之争：人性本身是追求“善”的，但因为格局太小常常以损害别人为代价，于是就表现为“恶”。

所以说，格局是解开善恶之争的钥匙。而且，用“格局”的方法，我们可以重新解释“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之争的经典论据和观点。

孩子、布娃娃、小蚂蚁

关于人性追求“善”的普遍性，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可以提供某种证明。

有实验人员给6个月大的婴儿看布娃娃演出，情境一是布娃娃A在爬山，布娃娃B帮助布娃娃A爬上了山；情境二是布娃娃A在爬山，布娃娃C从山上把布娃娃A推下了山——显然，布娃娃B是善良的，布娃娃C是邪恶的。

然后，实验人员让这些6个月大的婴儿选择更愿意和布娃娃B还是布娃娃C玩耍，结果婴儿们纷纷选择了布娃娃B。这个实验，常被作为“人性本善论”的经典证据，它比较有说服力，即至少在不涉及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谁都愿意追求美好的东西。

至于主张“人性本恶”的学说，则经常采用一个例证：小孩子通常有暴力倾向。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孩子存在一些“利己”的诉求，比

如说情绪宣泄、好奇心、英雄情结等等，但在追求这些利己诉求的过程中很少顾及外界的感受。

很多人小时候都做过这样的事：看小蚂蚁搬家，在它们的必经之路上浇水，于是蚂蚁就走不过去，或者被淹死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体验到一种掌控感：“我”能够决定小蚂蚁的生死，“我”存在着，“我”是有价值的！

不过，多数人长大之后，类似的行为越来越少——不仅仅因为失去了兴趣，恐怕也不仅仅因为没有闲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此类行为中体验到了某种“痛”感，觉得伤害了无辜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是“我”存在着，那些弱小的生命同样“存在”着，它们有着相同的感受。



这种变化，就映射出一个人格局的变化：格局越来越大，把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或事物考虑在内，变成自己所在乎的一部分——人的一生，格局往往是从小到逐渐发展的（参见《盖世武功，从三只小麻雀练起》一文）。

性恶说、性善说、小乘、大乘

荀子的“性恶说”（认为“人性本恶”）和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人具有某种“原罪”，即指人顺从自己的私欲而违背上帝旨意的所言、

所行和所想），似乎与人的“小格局”状态有关——每个人生来“小格局”，亟待改善。

孟子的“性善说”则强调的是“人追求真善美的潜在趋向”——每个人都“追求”大格局，“追求”真善美，这是内在的行为动机。

两者无疑是同时存在、相互兼容的，前者是“初始状态”，后者是“发展趋向”。

此外，人的一生格局从“小”到“大”的变化，在佛教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说法。

众所周知，佛教中有“小乘”和“大乘”之分，那么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如果一个孩子快要饿死了，为了救这个孩子去偷东西给他吃，这算是善的还是恶的？



在小乘看来，这个行为是恶的。小乘最重要的戒律之一就是偷盗。如果一位小乘比丘为了送食物给饥饿的孩子吃而去偷盗，那么他就破了戒，不再是个比丘；也就是说，他主要的修行已经不再存在

——虽然他因为送食物给饥饿的人吃而获得功德，但是他还是失去了他的戒。

在大乘看来，这个行为是善的。大乘里最优先的是帮助其他众生。因此，一位大乘比丘可能会偷东西去给饥饿的儿童吃，虽然他小乘的戒破了，但偷窃的这个行为却成为大乘行者的善巧方便——透过这个让小乘比丘毁堕的行为，他完成了自己主要的修行。

需要指出的是，小乘和大乘之间一直有理论上的争论，小乘坚持认定佛陀从未真正给过大乘教法；而大乘还是得承认小乘是佛陀给予的教法，因为小乘是大乘的基础。

我并无意卷入佛陀是否给过大乘教法的争论，仅就小乘和大乘在上述案例中的区别来看，小乘更像是“追求个人小格局内的修行圆满”，而大乘则像是“更大格局、将更多人的利益考虑在内的修行方式”。

为什么“小乘”叫“小”乘，“大乘”叫“大”乘？恐怕这不仅仅是个巧合吧！

在我看来，格局是解开善恶之争的钥匙——“格物致知”，因此蕴含深意。

更重要的是，格局也是判断一个人行为方式的钥匙——在我们的身边，有着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似乎都各不相同、时好时坏、难以捉摸。但是，他们的格局大小其实并不难判断（个人格局当然会因时、因地、因事变化，但“平均数”是比较清晰的）。

当我们明白一个人的格局有多大，就能更好地了解他的想法，进而对他的行为作出更准确的预测。这比简单地说“他是好人”或“他是坏人”更准确！

您相信吗？不妨试试看哦！

香香的，臭臭的

香和臭，美和丑，真和假，它们并不是约定俗成的，更不是随机选择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内在规律。那是什么呢？

银幕上，汤唯坐在咖啡馆的大玻璃窗前，优雅地从包里取出香水，抹在耳后和手腕上。她所饰演的王佳芝在等待一个时刻、一个决定某个人生死的时刻。

这是李安电影《色·戒》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在影片中，王佳芝想方设法要和易先生拉近关系，其目的只是除掉他。当政治斗争中掺杂了个人情感，人的行为就变得不可捉摸——人是一种多么奇怪的生物，时而接近，时而背离。

《色·戒》，其英文名翻译作Lust, Caution，其中lust意为渴求、强烈的欲望（尤指性欲）；而caution则意指警告（以防危险）、谨慎、小心——这两个词，一个表示接近，一个表示背离，它们放在一起，必然会带来某种戏剧性。

至于香水，则是一种卓越的发明，用香味来掩盖让人生厌的身体异味，它承担着某种社交功能——由香味的吸引，然后人们的心更容易彼此靠近。

不过，与其说香水体现出人的“社会性”，不如说它更体现出人的“生物性”——对香香和臭臭的判断，并不需要过多高级逻辑思维的参与，这纯粹是本能。

香香和臭臭，为什么呢？

为什么香的被称为“香”的，臭的被称为“臭”的？

为什么我们喜欢“香”的，拒绝“臭”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人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发展出的一种杰出本能，“臭”的东西可能包含着某种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所以它的臭味就是一种警告：离我远点！尤其是千万不要吃我！否则你会中毒的！

这种本能非常好，它很直接，也很有效，避免我们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本文要讨论的则是与“香香”或“臭臭”相关的两种不同趋向：“接近”或者“背离”；或者用更抽象的方式表述成“联结”与“疏离”。

宇宙的一切事物似乎只有这两种倾向：“联结”与“疏离”。

与此同时，人的一切行为，似乎也只有这两种倾向：“联结”与“疏离”。

“联结”的同义语还有“接近”“吸引”“凝聚”“结构”……

“疏离”的同义语还有“背离”“排斥”“分散”“解构”……

总之，不管具体用哪种称谓，这是两种彼此相关、相互对抗的力量，它们同时存在，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后果。

举例来说，人的行为，吃与喝，是接近好东西；拉与撒，是排斥坏东西。

爱，是接近可爱之人；恨，是拒绝可恨之人。

垃圾短信，是别人想联结你，你不想被联结。

QQ隐身，是疏离你想疏离的，只联结你想联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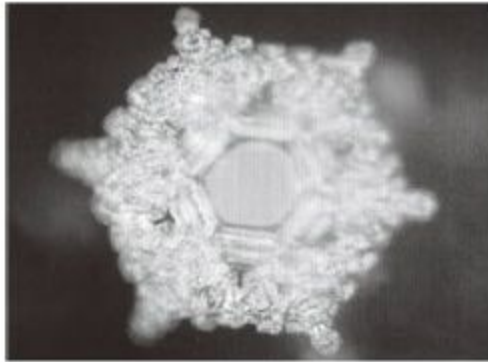
那么，把“联结”和“疏离”作为宇宙及人类行为共同的两种趋向，意义何在？

美是美的通行证，丑是丑的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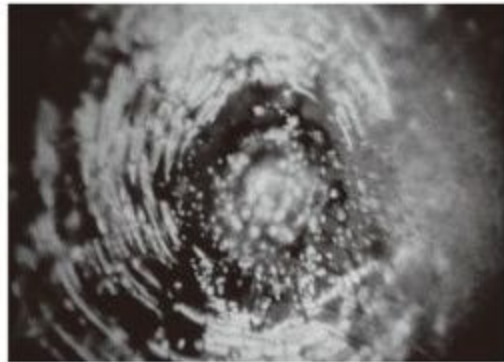
美德，通常具有联结性质；丑恶，通常具有疏离性质。

先来看几幅图，这是日本学者江本胜在《水知道答案》一书中展示的实验结果。江本胜做了一系列实验，他把一些写着字的纸条（比如“爱·感谢”“混蛋”“好可爱呀”“对不起”“保持本色”等等）贴在盛满水的玻璃杯杯壁上，放置一个小时；然后将其拿到-5℃的房间中，用两百倍的显微镜观测并拍摄它们结晶的照片。

贴着“爱·感谢”字样的水结晶非常漂亮，而贴着“混蛋”字样的水根本无法形成结晶。



“爱·感谢”的水结晶



“混蛋”的水结晶

江本胜做了很多次实验，包括使用不同国家的语言、写不同的词语、给水播放不同的音乐等，实验结果是具有普遍性的：美好的讯息代表着良性的波动，能够产生美丽的水结晶；而对于人类所不喜欢的那些讯息，水会表现出混乱的、无法结晶的状态——江本胜认为，这并不是说水能够像人一样“看”和“听”，但是，那些词语和音乐携带着某种讯息和波动，这种讯息和波动就会对水产生不同的影响。

《水知道答案》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有很多人从中获得了感动；也有一些人表示疑惑，因为江本胜并未对实验过程作出足够充分的说明；还有一些人则表示质疑：这些图片真的足以用来劝导人们向善吗？

对于水结晶实验，我的基本看法是：

其一，实验的细节有待进一步验证和推敲，但没有人质疑江本胜伪造了这些图片，它们的确是由实验产生的客观结果。

其二，我们或许还不能直接用它们来劝导人们向“善”；但如果要在上面两张图中选择一张我们认为是“美”的，大多数人会选择“爱·感谢”的这一张，这不难印证。

其三，这两张图片最大的区别在于是“联结”还是“疏离”：能“结晶”的意味着“相互凝聚”的，它具有“联结”倾向；不能“结晶”的，则具有“疏离”和“解构”的倾向。

其四，这个世界存在着一个普遍规律：“真善美”是倾向于“联结”的，而“假恶丑”则是倾向于“分散”的。比如：色香味俱佳的菜肴，是有诱惑力的；美女帅哥，是具有吸引力的；品德高尚者，是有人格魅力的。反之，散发恶臭的东西让人逃之夭夭，相貌丑陋的人常让人不忍卒睹，行为龌龊的人让人心怀戒心。是“联结”还是“分散”，其趋向通常比较鲜明。“美好”的东西，通常具有“联结”性质。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水结晶的图片在实验结果方面是具有合理性的。当然，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晶，这个世界还有哪些未知的力量，还有待将来的人们作进一步研究。

要说真话，不要说假话

水结晶是一个小插曲，提供了某种生动的“图解”——“联结”和“疏离”的差别如此明显。

回归到更现实的生活话题。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人应该说真话，不应该说假话。假如有孩子非得较个真儿，问句“为什么”，那么答案是：这不只出于“直觉美好”的要求。

从理论上说，如果教科书告诉我们“人应该说假话，不应该说真话”，那么这句话本身又是真话还是假话呢？如果您经过思辨，会发现这在逻辑上不成立。

假定一：它是“真话”——那么我们应当像它的内容倡导的那样“说假话”，可它自己又说了“真话”，相当于打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假定二：它是“假话”——那么我们不应该像它倡导的那样“说假话”，而应该“说真话”，可它自己又说了“假话”，所以也等于打了自

己一记响亮的耳光。

因此，“人应该说假话，不应该说真话”是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在逻辑上不成立，无法自圆其说。

将这一条推而广之，就是“假恶丑”的东西“相互解构”“互相拆台”；而“真善美”的东西，它们彼此可以“相互支撑”“互相印证”。其背后的原理恰恰就是“真善美”具有“联结”倾向，而“假恶丑”具有“疏离”倾向。

比如说，公安机关在侦破案件时，总是会向当事人进行仔细的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行为、人证、物证……总之，所有的细节都能彼此印证，那才是更可信的，而如果某些细节互相对不上，则很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利用这条普遍原理，如果想要证明某件事是真的或想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就要能够提供更多的细节（时间、地点、人物、行为、人证、物证……），这些细节，其实就是各种与外界“联结”的通道，把事实真相串联在一起。

当有了更多“联结”的通道之后，其结果将是假恶丑被解构、真善美得到弘扬。这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而是客观规律。

当然，现实有时候看来未必如此，比如坏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联结的通道还不够多，还不足以凝聚该凝聚的，也不足以解构该解构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有一个条件发生了日积月累的变化，就是联结手段越来越丰富了——说谎者能够联结，揭穿谎言者也能联结，最后的较量将回到事实本身。随着联结通道的逐步增多，“联结”与“疏离”的差异将会越来越明显。

深受观众好评的电视剧《潜伏》，其实也不违背这条原理。

首先，当个间谍不容易，不得不经常说谎，不过他更需要把谎言相互编织、串联，而且能相互对得上；而且越能相互对得上，越有助于安全解围。恰恰是有效利用了“联结”，才显示出足够的智慧（所以，一般人的智商玩儿不转）。

其次，《潜伏》所描述的那个时代，联结通道本来就不多，如果把每个办公室装上摄像头试试看，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像美剧《24

小时》（讲述21世纪美国反恐故事）那样，到处都是摄像头，就会给被监视的敌人带来很多麻烦，这也是一种通过联结对真善美提供的辅助作用（恐怖分子不能像政府一样随心所欲地到处安装摄像头，所以他们的联结手段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最后，您是不是觉得看谍战剧时总是心惊肉跳？那恰恰是因为谎言具有“解构”趋势，这是它先天的缺陷。一个人如果真的像余则成那样生活在谎言中，那就得被活活累死。

总而言之，香香和臭臭，带来了联结和疏离；同样，真善美是相互联结的，假恶丑是相互解构的。从理论上说，这个结论并不难理解，但它是我们对未来重拾信心的一个重要前提。

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

每个人都希望变得强大，而走向强大的法则是简单清晰的，万变不离其宗。每天默念这一法则，将能顺利开启更多机会之门。

自然界每天都在上演精彩的故事。

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送奶公司送到订户门口的牛奶，既不用盖子也不封口，因此，麻雀和红襟鸟可以很容易地喝到凝固在奶瓶上层的奶油皮。

后来，牛奶公司把奶瓶口用锡箔纸封起来，以防鸟儿偷食。没想到，经过20年，英国的麻雀竟然都学会了用嘴把奶瓶的锡箔纸啄开，继续吃它们喜爱的奶油皮。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20年，红襟鸟却一直没学会用这种方法——当然，它们也就没有美味的奶油皮可吃了。

这种现象激起了生物学家的兴趣，他们对这两种鸟儿进行研究，从解剖的结果来看，它们的生理结构没有多大区别，那为什么这两种鸟在进化上却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原来，这与它们的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关系。

麻雀是群居的鸟类，常常一起行动，当某只麻雀发现了啄破锡箔纸的方法时，就可以教会别的麻雀；而红襟鸟则喜欢独居，它们的沟通仅止于求偶和对于侵犯者的驱逐，因此，就算有某只红襟鸟发现锡箔纸可以啄破，其他的鸟也无法知晓。



动物世界如此，那么人类是否也一样呢？

一部生动的“联结史”

人类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生动的“联结史”。

相互“联结”的过程使得人类一步步走向强大；与此同时，人类的一切发展、一切向往之物，似乎也都与“联结”密不可分。

“人类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曾经被认为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尽管动物学家珍妮·古德尔后来的观察研究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并使用简单的工具，但是，“使用工具”无论如何也应该属于人类进化史中的“一大进步”——这意味着，“人”和外界的“工具”有了“联结”。

人类具有成熟的“语言体系”，虽然我们不能完全证明动物就没有这种语言体系，但是人类语言的复杂程度排第一却是毫无疑问的——语言，是人和人“相互沟通的手段”，当然与“联结”密切相关。

《圣经》上说，巴别塔是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的塔，并希望借此能通往天堂。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他们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这个故事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类不能够强大的某种原因。

幸好，尽管全世界的语言在形式上各不相同，但是它们所指向的“意义”却是相通的。比如，汉语中的“我爱你”，在英语中叫“I love you”，希腊语中是“S’agapo”，意大利语中是“Ti amo”，德语中

是“Ich liebe dich”，法语中是“Je t’aime”，俄语中是“Ya tebya lyubliu”……尽管我们能找到100多种不同语言的表述方法，但是，人类情感是共通的。如此才有了各国之间用来翻译和转换的“字典”，用来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得以相互“沟通和联结”。

直到今天，我们对于“语言”这种“联结方式”仍有狂热的崇拜和迷恋：会说外语的人，总是让人“刮目相看”；同时会说几国外语，就令人“啧啧称奇”了；GRE、托福、雅思……奖学金似乎和外语程度（而不是专业知识）有最直接的联系，各种外语补习班也因此大行其道。总之，语言似乎成了“通行证”。再往下说，“海归”之所以“吃香”，也是因为类似的联结作用：看到过国外的景象，于是“眼界开阔”，便“更有价值”……这一切，都与人类与生俱来的联结基因有关。

语言之后的一个里程碑是“文字”。“文字”更了不起，使得人类真正地比动物先进了一大截：就算黑猩猩能够制造并使用简单工具，就算它们有较完整的“语言”，也只能是“口耳相传”，每一代黑猩猩对相关技能的学习“从头开始”。如果有了文字，就可以大大突破“口耳相传”的束缚，进入到一种“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联结之中。

再之后，印刷术出现了，有了这个“加速器”，联结的速度成倍增长。

印刷术再往后，广播、电视、网络、流媒体相继出现，这些都是大众传媒，统统具有“加速器”的作用，于是，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带来了人类联结上的重大飞跃。

不仅在精神层面有联结，在物理层面、地理层面，人类的活动同样与联结密不可分——哥伦布之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是因为各块“彼此分散的大陆”之间迫切地需要联结。

至于现在绝大多数人所向往的金钱，在我看来，也无非是用来联结的一种手段而已——只要看看人类的经济史，就会发现人们对这种相互联结的偏好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对金钱的追逐就是最赤裸裸的证明。

再来看看最近20年由网络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知道人类的这种联结基因有多么强大了。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

彼此联结的，自然是相对“大格局”的（正如当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区别）。所以，“大格局”和“强大”在同一个方向上，我们把它添加到向上箭头旁边：



请不要认为“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是一条早就被充分注意到的规律——比如说，中国古代曾经出现过的“务本抑末”政策，“务本抑末”中的“本”是指农业劳动，“末”则指工商业，“务本抑末”就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汉书·郑弘传》曾有“务本抑末，勿与天下争利，然后教化可兴”的说法。

现在看来，商业无疑是一种联结的活动。今天无处不在的贸易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繁荣，我们已很难想象在一个商业不发达的社会中如何能高质量地生存。

总之，整个人类的历史，似乎都在印证着“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的规律。

联结：走向强大的力量

联结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是如此重要，那么它对于个人走向强大也有同样的作用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后面的《高官与高道德》一文中将继续论述其中的博弈原理）。不过，当今社会中人们的普遍冷漠，似乎意味着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一普遍法则。

为了说明“联结”对于个人的价值，我们可以举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例子。

我如果深更半夜独自打车回家，身边细心的朋友可能会留意一下车牌号（虽然其实并无太大必要，因为北京的出租车总体上是很可靠的），然后叮嘱我到家发个短信。这就是一种相互联结的方式，它提供了某种安全保障。

反过来说，出租车也有相应的保障措施，比如乘客有时会听到“叮咚”一声，然后是车载系统的语言提示“您现在已驶出五环外……”假如真有人打算抢劫的士司机，就得掂量一下，因为车辆行驶方位是能被追踪到的。这也是由于相互联结所提供的某种安全保障。

这种以相互“联结”来提供安全保障的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教导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也有内在的一致性。“父母在不远游”，是对父母的尊重，随时能照顾父母的需求，这是一种联结；实在不得已要出游时，“游必有方”，告诉父母自己要去哪里，既是对父母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保障。无论“血缘”还是“伦理”，都是天然的“联结”方式。

当然，联结的好处绝不仅仅是保障安全而已。联结也是使人走向强大的力量，它具有非常广泛的适用性。

比如，现在很多商业活动中普遍采用的打折券、免费体验等方式，就是一种用来“联结”的方式，看似商家损失了一些利益，但总体上反而有助于获得更多收益；还有各个不同商家之间相互赠优惠券以吸引客源，或者采用连锁、加盟等方式……这些五花八门的经营策略，从抽象的哲学角度看，无非都是联结手段罢了。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种新的联结方式出现，不仅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每一种新的联结方式出现，都意味着提供了一条新的起跑线，每个人同时站在新的起跑线上，带来社会分布的“重新洗牌”。远的先不说，仅仅互联网就造就了多少新的权贵，这是大家亲眼所见的事实。

时至今天，又有一种新的联结方式有待开掘——把更多人联系在一起“大格局观”。我认为，在这种新的联结方式上，我们目前仍停留在“史前文明”的阶段，一切时机和条件正在孕育之中……

没有金钱，用什么来替代？

没有钱，并不是万万不能的。您不相信？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笑话，说的是中秋期间一盒月饼流转的故事：甲给乙送去一盒月饼，乙一转手又把它送给了丙，接下去丙又拿去送给丁……转一圈下来，这盒月饼重新回到了甲的手里。

这样的笑话真的有可能发生（所以送月饼可得小心）——如果把故事的主角从“一盒月饼”替换成“钱”，这样的流转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

一盒月饼从甲的手里出发，最后又回到了甲的手里，那么，是否真的又回到了起点？看似谁也没有占到便宜，其实每个人都有收获，无论如何，送出去的都是情意，所以每个人都在表达并收获着这种情意。

还有一句流传更广的话，“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有道理，但道理不在“金钱”上，那又是什么呢？

金钱，只是一种联结手段

金钱为什么招人喜欢？

参考宇宙的普遍规律，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冷酷的现实：金钱并不是“目的”，它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

金钱，是一种“联结”手段，一种使人能借此达至“大格局”的手段。

如果回顾金钱产生的历史，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人类社会早期，大家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并不存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易，因为富余的生活资料实在少得可怜。

慢慢地，生产力有了发展，生活资料渐渐充裕起来，甚至偶尔还会有些富余，于是交易的需要产生了，把富余的粮食、牲畜、饰品等进行物与物的交换。请注意，这已经意味着人的“格局”开始变大了。

在这之后，专用钱币诞生了（比如贝壳等），它本身不值钱，但是作为“符号”，可以代表用来交换的粮食、牲畜等。专用钱币的好处是：它可以使每个人的“劳动”被贮存起来（因为粮食和牲畜都有可能腐烂变质，而专用钱币则不会），因而在满足自身生活所需时，不再

受到太多关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比如不用过分担心粮食腐烂，可以先把粮食换成专用钱币，在粮食不够时再换回来）。

时至今日，财富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金银、珠宝或纸币等等，其实也都承担着类似的功能——也就是说，金钱之所以被人们竞相追逐，是因为它能够扩大我们自身的格局，使我们满足自身需要时“不再受到时空的限制”。

按照经济学中的说法“钱是市场上通用的交换手段，用钱可以在竞争的市场上购买到任何一种商品，而不附有其他限制条件”。“不附有其他限制条件”意味着：金钱之所以那么招人喜欢，是因为它能用来“交换”，几乎换什么都行，所以它的“通用性”是最强的。

而其“通用性”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让我们把“自己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相互“联结”起来，能够以“大格局”的方式生存。

人情，是另一种联结手段

除了金钱之外，还有一种用来联结的方法，那就是人情。中国人对此再清楚不过了。

凡事要考虑人情，这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有优势的地方，虽然它常常因被滥用而遭到贬斥，但究其性质，它也是用来“联结”的一种手段，而且确实有效。

如果完全不考虑人情的话，那么社会就纯粹是经济式的。比如，有一天，某个人找你做一件事，你付出了劳动，他因此付给了相应的报酬。过了一段时间，你反过来请他做一件事，难度基本相当，因此你也付给他相应的报酬。从结果上来说，这笔钱一来一回，谁也没真的挣到钱（只有GDP因此增长了）。早知如此，或许可以谁都不花钱，相互帮个忙，不但彼此的事情都办成了，还额外增进了一份友谊，这就是中国人关于人情的常识。（只不过，我们常用一个略带贬义的词去描述它，叫“人情世故”，但它只是一种“联结”罢了，无所谓好坏。）

所以，当一个人需要你的帮助，就相当于给你提供了一个机会，你可以从中“挣钱”，也可以换个思路，从中“挣人情”。两者各有各的好，金钱似乎有保障（它不会落空、更具通用性），人情则更美好（而且弹性空间更大）。

帮助和互相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相互建立“人情的联结”，慢慢地营造出自己的大格局；而且，四通八达的人情，使得生活越来越有保障。

有读者或许会提出疑问：中国有些问题恰恰出在“人情”上，怎么能这样大张旗鼓宣扬“人情”的好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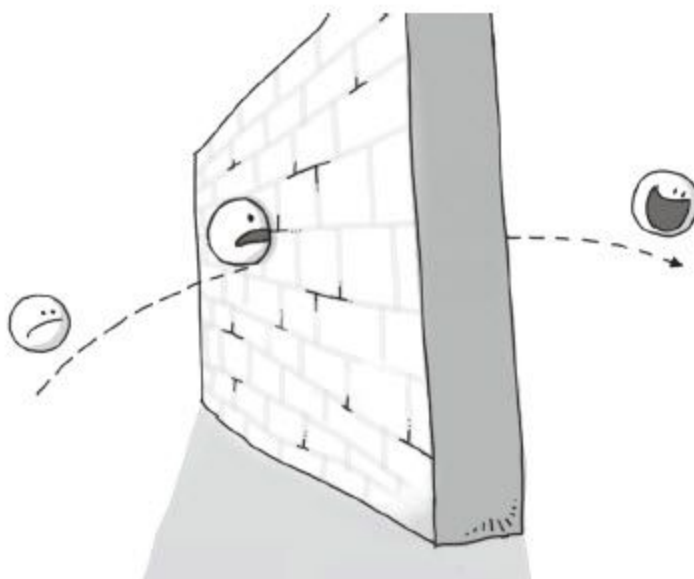
让我们冷静客观地看看自然界的情况：量子穿墙而过的特异功能。

穿墙而过的特异功能

量子世界，不同于我们生活的宏观世界，它有一些匪夷所思的诡异现象。

假如你向着三米厚的混凝土墙射出一个塑料小球，经典物理学的结论与你本能的感觉是一样的：球会反弹回来。原因是，小球没有足够的能量穿透这堵难以逾越的障碍。

但是量子力学确凿地证明，在基本粒子的水平上，小球有小小的一——但不是零的一——机会能穿透那堵墙，出现在墙的另一边。



怎么能产生这种结果呢？

在《宇宙的琴弦》一书中，作者为了向读者解释清楚这一匪夷所思的现象，就打了一个比方：想象一个一贫如洗的人，他在远方的亲戚死了，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然而，他没有钱买飞机票，去不了那儿……但是朋友们也没钱。不过，他忽然记起一位在航空公司的老朋友

友，便向他求救。那朋友还是没钱借他，但提出一个办法：他只要在到达终点后24小时内把钱电汇过来，公司的会计系统是不会发现钱是在出发以后补的。这样，他可以去继承他的财产了。

书中写道：“量子力学也允许粒子‘借’能量，只要它能在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所规定的时间内把它还回去。”根据类比，这和我们以“借钱”坐飞机（只要能尽快还钱）是很相像的。

的确匪夷所思吧？这可是科学哦。或许绝大多数人很难理解量子世界，不过我们很容易理解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是如何贷款的：动用了将来，在当下得到享受。

那么，这个穿墙而过的特异功能，和“人情”又有什么关系呢？

质能方程： $E=mc^2$

爱因斯坦有一张著名照片，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著名的质能方程： $E=mc^2$ 。该方程是说，质量和能量是等效的，两者之间可以互相转换。人们经常使用这个方程计算，如果把一些物质转变成纯粹的电磁辐射时会产生多少能量（比如，1千克物质湮灭后产生的能量相当于2000万吨TNT炸药爆炸产生的热量）。

质量是看得见的，能量则是看不见的，它们竟然可以相互转化。质量转化成能量，能量转化成质量——这种转化不只是在自然界中。

金钱，就好比“质量”，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物质财富；人情，就好比“能量”，虽然看不见，但也真实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我们很容易理解人情是如何在某些时候帮助我们不依靠金钱，从而摆脱了面前的困境、把需要办的事往前推进了一步。

中国的很多问题出在“人情”上，但责任并不在“人情”这种用来“联结”的手段——“联结”手段没有错，这是中国人智慧的一面，错是出在了使用人情的人，他们对人情的无原则、无尺度的滥用，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反过来讲，我们应该感谢这个世界还有“人情”这种能量的存在！

当我们抱怨这个世界存在着无数“透明天花板”的时候，或许需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像量子世界的那些小小的粒子学习——至少，透明天花板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穿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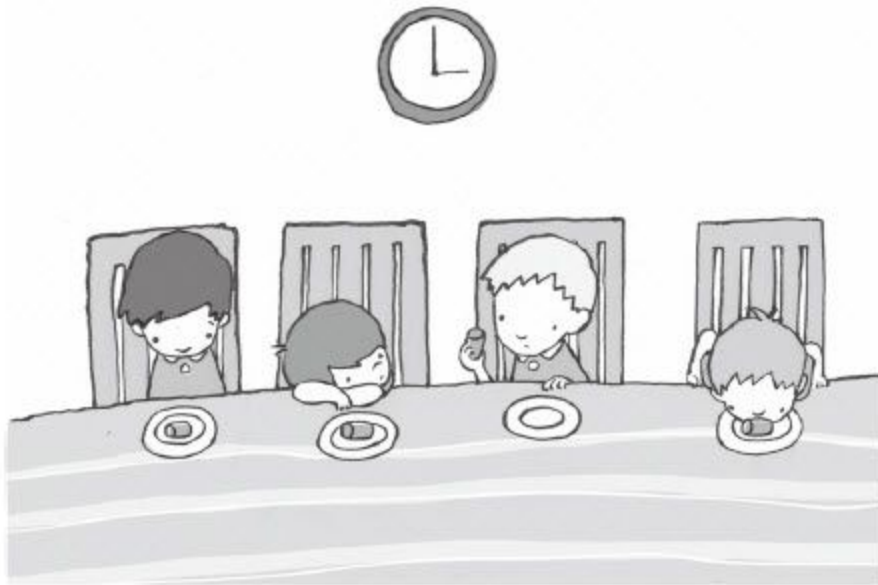
当我们抱怨自己没有钱疏通关系的时候，或许需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忽视了另外的一些帮助自己穿越透明天花板的可能性——至少，人情并不都是用钱买来的，它也可以用自己的其他行为来换取。

如果，现在有人向您寻求帮助，如果对方的请求是正当而合理的，如果这也是您力所能及的——那么，您会帮助他吗？

着眼未来的孩子，多一块棉花糖

Hold住！一定要hold住！这句话之所以流传，因为它的确有强大的内在逻辑。什么逻辑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沃尔特·米歇尔博士，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棉花糖试验”。他以4岁的小孩为实验对象，给他们每人一块棉花糖，然后告诉他们，如果15分钟内坚持不吃，他会再给他们一块棉花糖。



参加试验的孩子，1/3等不了15分钟就吃掉了棉花糖。大概2/3的孩子很好地坚持到15分钟，于是就多吃到了一块棉花糖。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这个实验中，抵制住棉花糖诱惑的孩子，后来成长为会调节压力，能约束自己，具有良好社交能力的优秀青少年。

这个实验反映出的另一层含义是：一个人，能否以更长的时间来考虑得失，和成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那些成功抵御了眼前诱惑的孩子，无疑是倾向于“着眼未来”的，他们更加“成功”。

时间上的大格局

“着眼未来”，是一种时间上的大格局。

在面对生活抉择时，每个人的“着眼点”是不同的：有的人着眼于“现在”，有的人着眼于“更久远的未来”。

有些人觉得，将来虚无缥缈，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因此，如果眼前已经有了美食、爱情、金钱、名誉……就应该立刻去享受它！也有人觉得，眼前的美食、爱情、金钱、名誉……固然很好，但如果一味沉溺于此不思进取，将来就有可能挨饿受冻，生活黯淡无光，所以，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前景，可以拒绝眼前的诱惑。

在正常情况下，不存在任何一个人“仅仅着眼现在”而“从不着眼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始终着眼将来”而“从不考虑现在”。因为这样极端的人一定都活不长——所谓“着眼现在”和“着眼将来”之分，只是相对而言的，是“哪种选择更经常”的问题。

正由于“着眼点”不同，才导致了行为选择的差异。比如，要修筑一条公路，其间路过一座山，有的设计师会采用盘山公路的方式，有的设计师则采用隧道的方式，其实各有利弊。盘山公路修起来稍稍容易一些、施工成本也较低；而隧道的施工难度大一些、成本也相应提高，但能提高通行效率。严格地说，不能简单地评判哪种更好，只能说哪种更合适：资金、山体结构、气候状况等诸多因素都要考虑在内，才能得出综合判断。

那么，既然着眼现在和着眼将来都各有优势，谈论它们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总体上说“着眼未来”和“时间上的大格局”是更值得追求的（当然，前提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个大方向很关键，也是我们评判一件事物的重要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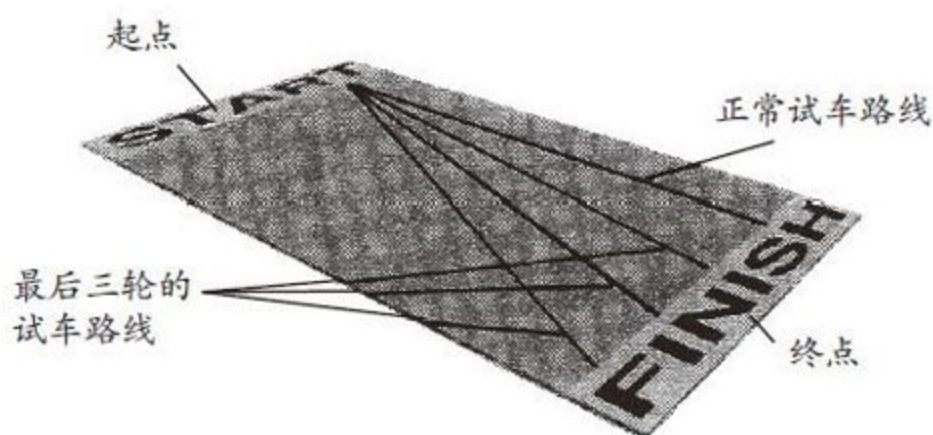
凭什么这么说？因为“时间上的大格局”更容易带来“空间上的大格局”——“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关的维度，它们是可以相互打通的！您相信吗？

时间和空间的相互交织

在《宇宙的琴弦》中，讲了这样一个很容易理解的故事：

让我们想象有辆不那么现实的汽车，能很快达到省油速度，160千米/小时，然后保持这个速度，不快也不慢，最后突然刹车停下来。然后，我们找来了一位具有高超驾驶技艺的赛车手，请他在广袤平坦的大沙漠中一条笔直的路上试开这辆汽车。从起点到终点，路线长16千米，汽车6分钟（1/10小时）就能开过去。

令人困惑的是：尽管多数记录的时间都是6分钟，但最后三次却长一些：6.5分钟、7分钟、7.5分钟。起初大家怀疑是机械故障，但是，认真检查后却发现汽车没有一点儿问题。直到后来询问了赛车手才发现真正的原因：在最后三轮，天近黄昏，车从东头开向西头，赛车手的眼睛正对着落山的太阳，于是把车开偏了一点儿，如图所示：



换句话说，当路线偏离一个角度时，160千米/小时的速度有一部分耗在了从南到北的方向上，于是从东到西的速度就慢了一点儿，从而经过这段路线的时间会长一点儿。

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生活常识，不过，爱因斯坦却发现，这种“运动在两个方向上分解”的思想，正是狭义相对论一切惊人的物理学事实的基础。不光是“空间维”分解运动，“时间维”也能“分享”运动。

总之，爱因斯坦经过复杂的研究证明，在过去似乎分离、绝对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实际上是“相互交织的”，是相对的。爱因斯坦还接着证明，世上的其他物理性质也是出人意外地相互关联的。

在本书中，我并无意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进行过于严肃的探讨（那是科学家们需要做的事情），我只想用这个有趣的故事得出一种“哲学式”的理解：“时间”和“空间”，常常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时间，空间，变变变！

“时间”和“空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尽管爱因斯坦理论很高深，但这个结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难理解和印证。

生活在当代，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人们“行走速度”越来越快，无形中缩短了两地之间的“距离”——“时间”和“空间”的转化无处不

在。

从更抽象的“生活哲理”上说也是如此：“时间”和“空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上的大格局”，的确也常常带来“生活空间的大格局”，如果想获得更大的生活空间，就要学会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看待问题。

一个经常被拿来对比的现实，西方人吃饭的AA制是小格局，因为讲求“眼前”的平衡；中国人互相请客吃饭是大格局，因为讲求的是“更长时间”的平衡，并且似乎有额外的收获，那就是友谊和人情。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大格局的。

再来看一个例子：如果有人请您帮忙，您帮不帮他呢？

小格局的人会想：如果帮忙，自己就要付出时间、精力、人情等，甚至影响了自己某些眼前需求的满足，所以就不帮忙。

大格局的人可能会想：虽然自己眼前要付出时间、精力、人情等，但是今天帮了他，在将来某个时候如果需要他帮忙，他也可能反过来帮自己，所以就会选择帮忙。

当然啦，一个人帮助别人，很多时候并没有主动地这么去想（即便有这种想法，或许也只在潜意识中），但是，这并不影响结果，也就是说相对大格局的人是更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反过来也一样，更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就是相对大格局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在前面那张“小小鸟向上箭头图”旁边，再加上“着眼未来”（事实上，更准确地说应写成“时间上的大格局”，既包括“未来”也包括“过去”；但是“着眼未来”一词更具有“可操作性”）：



向上、增长、快乐、
控制、拥有、强大、
大格局、着眼未来

所以，要做一个大格局的人，就要力争具备长远的眼光。

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

这不是在进行品德教育，只是陈述冷酷的客观现实。

不懂规律的人，常常是死于无知。

在电视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中有这样一段话：

“今天的世界是倡导消费的世界。消费的人们物欲横流。每年，我们消费40亿美元在球迷球衣上，每年消费500亿美元在色情杂志上，3000亿美元在酒精上，2600亿美元吸烟，9000亿美元制造杀人武器，400亿在购买音乐上。但是你知道吗？每年只需要500亿美元就能拯救1825万人，相当于每天有5万人获救，可是现在很多人只愿意为自己消费、不愿为别人救命。”

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这是哲学中的一个命题，也是当小悦悦等事件发生后人们经常自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需要更充分的理由。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

对于一些天生热心肠的人来说，这个问题丝毫不成其为“问题”，因为“助人是快乐之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助人为乐”。

可是，对于更多人来说，帮助别人需要更多理由——其实，这个理由既远在天边，又近在嘴边。

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自己。

这里的逻辑关系是：“你帮助了别人”，“别人才更有可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于是才有了“人和人需要互相帮助”这句话——这里是因果链条，可是我们的教科书就是不把中间这句话说出来，于是，帮助别人这码子事常常缺少一些动力。

我们不妨首先承认人就是利己的——承认这一点让人沮丧，但也没什么不好。正因为人是利己的，才最大限度地推动了社会进步。

此前曾经谈过“人情”是一种用来“联结”的手段，它像是一种“无形资产”——并非每个人都对这条规则心知肚明，这是人情冷漠的一部分原因。

不过，另一部分原因是在这里：有些人太不仗义，你帮了他，等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帮你，怎么办？由于“人情”不像“金钱”那么实在（装进口袋就拿不走），“人情”具有不确定性，常常像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尤其是碰到“白眼儿狼”的时候），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青睐于以金钱来交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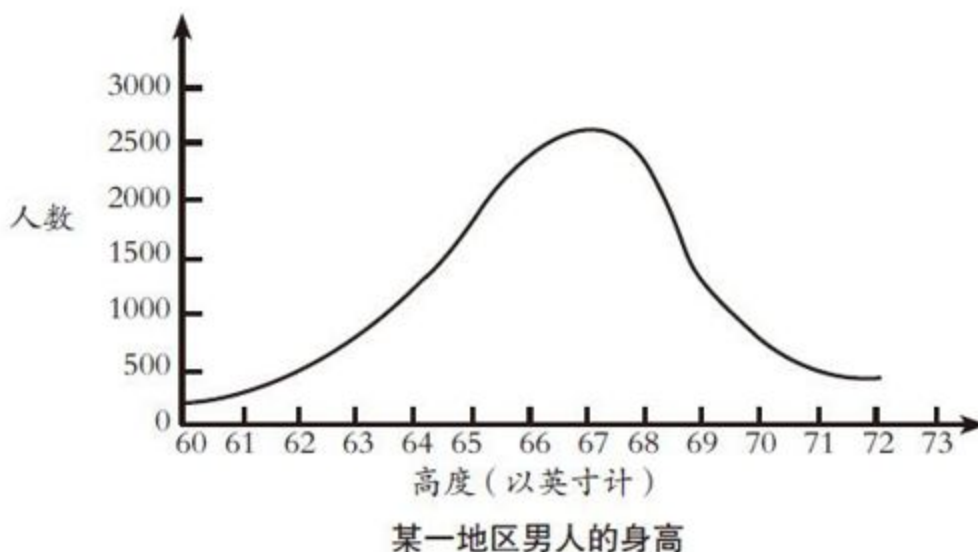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又该如何破解呢？答案存在于更宏观的层面上。

助人者，获得更多帮助

有的时候，你帮助了一个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你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时，他却转身离去了，这样的人被称为“白眼儿狼”。真不幸，“白眼儿狼”一定是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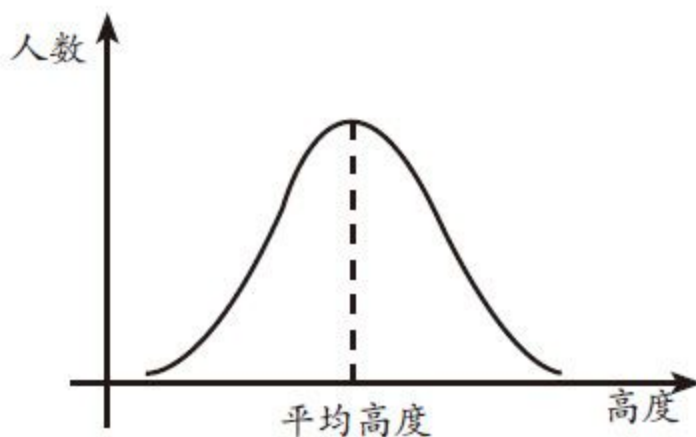
这甚至能从统计学角度作出解释——统计学中当然不会有关于“帮助和被帮助概率”的现成统计，所以借用一个关于“身高分布”的统计学原理，这样会更便于理解。

“平均身高”是统计某一地区所有人的身高（也可给出一个限定，比如18—50周岁男性）所得出的一个平均数。在平均数的附近，人数是最多的，偏离平均值越远人数越少。比如，像姚明这样的人则是极少数，在曲线最靠右的位置上——整个分布可以用“正态分布”（扣钟形）曲线来表示：



上图是某次实验中获得的实际数据，而当统计的人数越多时，就越接近数学家作为理想分布的正态分布曲线（就如同正多边形的边数

越多，就越接近圆一样）。下面是一个标准的“扣钟形”：



在“扣钟形”中间的垂直线（这里用虚线表示）就是平均高度——这不难理解，因为“平均身高”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如果说，身高存在“平均值”，那么道德恐怕也存在某种“平均值”，或许也是“正态分布”的形状——有句老话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白眼儿狼”的，这是自然规律，也有其“科学性”。但是，遇到“白眼儿狼”，人们的自然反应就是下次不再帮他，甚至说些“闲言碎语”，告诉别的朋友也不要再去帮他。后面这种情况是人们经常有意无意就会做的，因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气愤难平，就通过告诉其他人的方式来出气，因此“白眼儿狼”会越来越得不到帮助，这很公平。

这个“扣钟形”同时还揭示了一个道理：除了“白眼儿狼”之外，一定也存在另外一个极端的人，他们异乎寻常地感谢某个人的帮助，并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这些人就和“白眼儿狼”相互扯平了，总体上使整个正态分布的中心线处在“帮助者，会得到帮助”的正常逻辑之上。

就像身高统计中的“平均高度”一样，“帮助者，会得到帮助”作为正常逻辑就好像“平均值”。总体来说，一个人帮助别人越多，他得到的帮助就越多。

当然，有的时候别人不能够提供应有的回报，或许是因为他在这次不具备客观条件，所以，也不必太介意。他这次没能回报，或许

更觉得有所亏欠，下次有条件时就会尽力补偿。

因此，帮助别人的理由“既远在天边，又近在嘴边”——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这是符合“统计结果”的。

道理近在嘴边，为何欲说还休？

在古代中国，老子两千多年前就在《道德经》中写下“无私为大私”的深刻见解：如果你真的无私，你得到的其实最多。有人因此评价说，我们的思想工作也要向老子学。天天让人无私，然而人性是自私的，太多人贪或占。可如果换个角度，用大私诱惑你，但前提是无私，好多人会接受或仔细思量，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思想教育。

可惜，老子言简意赅却未作更多的解释，所以很多人未能参透“无私为大私”的要义。

无独有偶，在近代西方史上，亚当·斯密作为公认的西方经济学鼻祖，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在出版《国富论》（1776年）之前，先写过一本《道德情操论》（1759年）。他谈到，人除了作为“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之外，还不得不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否则，就难以实现利己的目的。“经济人”同时还具有“道德人”的一面，即具有利他心或同情心。

可惜，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种价值取向：一是道德哲学领域内的以同情心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一是经济学领域内的以利己主义为基本的价值取向——这被后来的人们称为“斯密悖论”。

于是，“既远在天边，又近在嘴边”的道理——从更大格局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就像是一层薄薄的窗户纸。

不能轻易捅破窗户纸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恰恰也是伦理学的经典困境。

伦理学认为，一个道德理论中的原则应该是可公开宣扬的，不然它们没法指导人们的行动，但一位“利己主义者”（持有“每个人都应该最大程度地利己”观点的人）对他的原则却有点羞于启齿。这并不是因为其原则低劣得不能见人，而是因为隐藏这个原则符合利己主义者的最大利益（因为如果每个人真的听了他的话而去利己，那么这个“利己主义者”反而得不到更多的好处）。

不过，一个理论如果不能公开宣扬，它就多少存在一些不足。

按照天道来论，没什么不能公开宣扬的，因为这就是宇宙本身的秩序（参见后面的《道德的理由：直觉？功利？》《“我”是全世界的中心》以及《世界不只你一人》等文章）。

另外，让更多的人利己，未必就侵害了自己的利益。按照“椭圆有两个焦点”而论，“利己”应同时包括“利身”和“利心”在内。

所以，近在嘴边的道理，该说就说出来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尤其是当人们越来越冷漠的时候，没准儿需要善意地互相提醒一下：如果有人请求帮助，只要他的请求是正当而合理的，只要我们力所能及，能帮人处且帮人！

道德的理由：直觉？功利？

这个世界，存在太多的二律背反。真的无法调和吗？

有个故事说，一位登山队员在探险时遭遇了暴风雪，于是很不幸地迷失了方向。

不过，他的意志力非常顽强，知道自己绝不能停下脚步，所以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他始终不懈地寻找回营地的路。

只可惜，最后他还是由于饥寒交迫、筋疲力尽而放弃了，倒在雪地中——既然看不清方向，再走下去也是徒劳的。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他的尸体——令人惋惜的是，在离他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是那个营地。

这位登山队员无疑具有英雄般的品质，只可惜他在茫茫风雪中真的难以辨别方向，或许越是努力行走，越是远离营地，这是他最终放弃的原因。

如果，他有一个有效的GPS导航仪，有其他队友能通过GPS导航系统告诉他应该去往哪个方向，他或许是可以生还的——没有人能够在身处迷雾时，依然清醒地意识到应该去往何方，只能在事后留下诸多叹惜。



这个登山者的故事告诉我们，或许只有当我们站在迷雾之外，才能告诉迷雾中的人们，应该去往哪个方向。

拨开道德迷雾

道德困境，犹如一团迷雾，将人紧紧包围——助人，究竟是纯粹的美好的直觉天性还是出于功利目的？

助人有其非常功利的一面，但这个观点让人心里不太舒服。于是，我们对此三缄其口，就是不把那近在嘴边的道理说出口。

同样，我们对“人性善恶”的追问，或许也在迷雾之中，就像暴风雪中的登山队员一样，只因看不清方向。前方不远处就是那个温馨的所在，人类也从未停止过追寻的脚步，但依然可能随时倒下，或彻底迷失。

为什么有些人被称为“好人”，有些人被视为“坏人”？为什么有些人“善良”，另一些人“邪恶”？为什么有些人是“热心肠”，另一些人却“铁石心肠”？这些问题，除了迷雾，还是迷雾。

让我们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试着作出回答。

助人者的利他行为，主要有两种原因，其一是美好的直觉天性，其二是出于功利目的。

先来说第一种，因为帮助别人是一种美好的“直觉天性”。

有句话叫“助人为乐”，也就是说，帮助别人是自己快乐的来源。

有实验结果证实，2岁大的幼儿在“分享玩具”时，比他们“获得玩具”时更加感到快乐——所有曾经在助人过程中体验到快乐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快乐是真实的——既然助人让人快乐，那就帮助别人了，它们不分先后同时发生，这就是直觉天性使然。

另外，有更细致的研究结果显示，帮助别人会令我们体内的多巴胺浓度大幅增加，所以才觉得愉快。2009年发表于《分子精神病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正常的基因变化作用于调节神经传导素多巴胺，与人们的利他行为密切相关。人体内的多巴胺是与渴望、愉悦、回报等情绪有关的一种化学物质。可见，“助人为乐”作为真实存在的“直觉天性”是有科学依据的（只不过助人为乐者自己都未必知道，他们只是出于“直觉”）。

再来看第二种，出于“功利目的”而提供帮助。前文已经从理论上给出了某种解释，而这些解释也不难找到更多人观点的印证。比如哥

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米德拉斯基与伊娃·卡哈娜合著的《晚年的利他主义》一书中，提到了五个助人的好处：

- 第一，我们感觉自己的生命收获了更大的意义；
- 第二，注意力转移到他人身上，使我们更能面对压力；
- 第三，我们感觉自己拥有更好的社会关系；
- 第四，我们感觉自己更有能力和影响力，做事更有效；
- 第五，帮助他人能引发更积极、更有活力的生活方式。

以上的列举未必详尽，但总而言之通过“利他”而“利己”是合乎逻辑的。

道德的理由究竟是“直觉”还是“功利”？让我们放眼更宏大的宇宙去寻找答案。

宇宙走极端

放眼宇宙，并回溯一下自然科学的某段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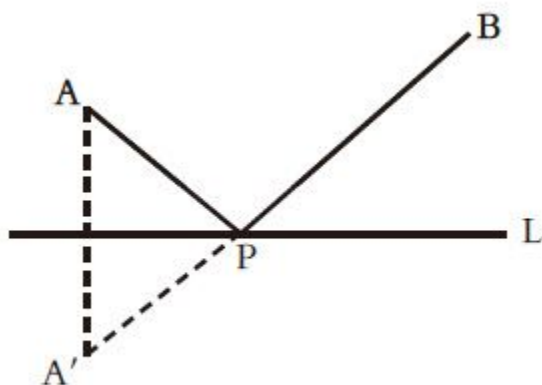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曾经一度信奉光线走的是直线。这是为什么呢？它和“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数学原理有关。

假设有一条小河L，在小河的同一侧有两座城市A和B（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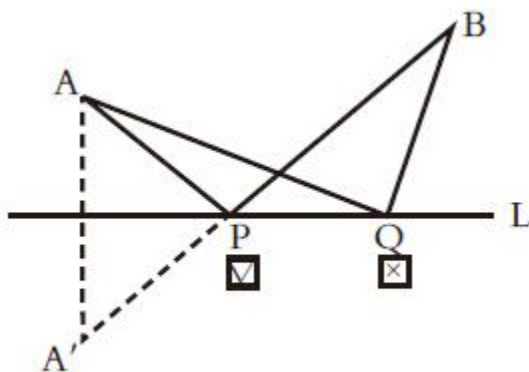


现在，如果要建造一个能让A、B两座城市共享的取水站P，那么，P点的位置选在哪里才能最节约修路的工程？

答案如下：当城市A相对于小河的对称位置A'和城市B形成一条直线时，它们与小河L的交合点P就是所要找的公共取水站位置。



上面这张“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图，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光线走过的路径：假设L此时代表着一个镜面，那么在“镜面反射”中，如果想让一条光线同时通过A和B两个点，那么这条光线必定沿着AP和PB这条“特定路径”反射（因为这是最短路径），而不会选择诸如下面这张图中AQ和QB之类的“任意路径”来反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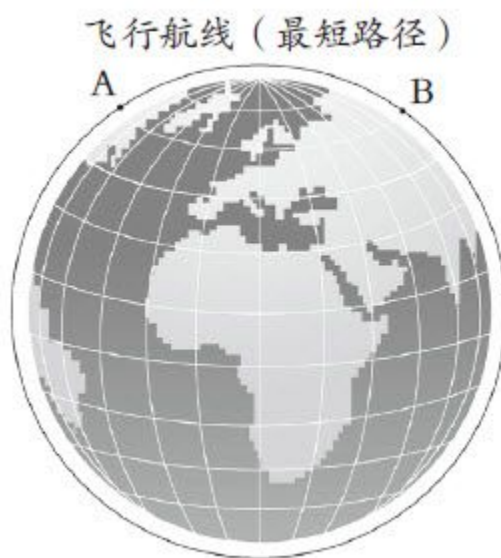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而光线走的也是“直线”（即最短路径），它所需要的时间最短——请注意，这虽然是正确的，但它也是“片面的”。

后来人们意识到还存在着这种情况，一条光线走过的路线需要的时间最多。

的确，这个结论超出了我们的生活常识——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我们用地球来打个简单的比方：飞行航线，从A地到B地，它总是选择

最短路径，也就是地球“大圆”（穿过两地和地球中心的截面）中较短的那部分；而和这条最短路径共同组成“大圆”的另外那一部分便是最长路径（其他所有通过A地和B地的直线型路径，其长度都介于最短和最长之间）。



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中指出：光线会同时走过“最短路径”和“最长路径”，这被称为“宇宙走极端”。后来，这条原理又被推而广之，完整表述为：自然界行为的结果不是极大化就是极小化，它经常趋于极端，喜欢极端化。

直觉与功利，殊途同归

宇宙走极端，道德问题或许也如此。

比如助人行为的原因，有时候是“直觉天性”，它像是“最短路径”；而有时候是“功利目的”，它像是“最长路径”。如果真的“功利到极致”，人也同样应该尽可能地帮助别人，这两个极端是可以殊途同归、完美融合的。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很多人出于“利己”的目的，不去帮助别人呢？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历史上曾经花费很长时间才发现“地球是圆的”。在此之前，全世界的人都曾误认为往东走和往西走，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就像现在的很多人，也误认为想要利己，就不应该帮助

别人，就像那位倒在暴风雪中的登山队员，不懈地寻找，可惜离圆满的结果就差一点点，只因为看不清方向。

为什么世界如今天这样呈现一片纷争、功利、战乱、抢夺、自私自利的乱象？因为人类的心智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逐渐发现，“利己”和“利他”的行为最终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但愿这种“宇宙走极端”和“殊途同归”的理念，能够引导我们走向“合作互助”的大格局。

关于“道德的理由”，不只是“知其然”，还应该“知其所以然”。幸而，在绕了一大圈之后，我们终于可以重归简朴。

“人应该遵从道德”，不论走“最短路径”还是“最长路径”，结果都是一样的。记住这个结果，就足够了。

盖世武功，从三只小麻雀练起

没有人一口气吃成胖子，大格局的修炼也是如此。

问题在于，大格局有什么好处？

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说到杨过小时候住在小龙女的古墓中，小龙女教他武功，从三只小麻雀开始。

小龙女把杨过带到一个石室，放出来三只麻雀，让杨过去抓，可是麻雀灵便异常，杨过累得气喘吁吁，连羽毛也碰不到一根……练到第五日，终于抓到了一只……到了第八日，才一口气将三只麻雀全部抓住。

后来，这项抓麻雀的训练又升级了，他们到了更大的石室，有了更多的小麻雀；再后来，在最大的大厅中抓九九八十一只麻雀；最后，两人来到了古墓外，敞开的空间无疑又增加了不少难度。

金庸笔下是这样描述的：“小龙女抖开布袋袋口，麻雀纷纷飞出，就在此时她一双纤纤素手挥出，东边一收，西边一拍，将几只振翅飞出的麻雀挡了回来。群雀骤得自由，哪能不四散乱飞？但说也奇怪，小龙女双掌这边挡，那边拍，八十一只麻雀尽数聚在她胸前三尺之内。”

小龙女的盖世武功真让人艳羡不已，盖世武功和大格局又有什么关系呢？

大格局，更多选择权

照理说，小格局有小格局的好，简单，天真，轻松，不费脑子……为什么非得要大格局呢？

的确，“格局大小”纯属“个人意愿”。常言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格局也拥有小富即安的幸福生活。仅从理性角度看，大格局和小格局都可以拥有幸福生活，其差别仅在于拥有多少“选择权”。

比如，手里的钱多，想吃什么就有得选，什么好吃就可以吃什么，可是如果手头拮据，就只能拣最便宜的吃。

再比如，人脉关系广，想办一件事，这个人办不成就可以换一个人，总之，更有可能办成事。

所以，“大格局”以及由此带来的“选择权”，直接和生活品质息息相关，一般来说，格局越大，能够调动的资源越丰富，生活品质也就相应提高，生活得更加舒展，舞台也更加广阔。

每个人，都想获得更多的东西，就像小龙女那样，武功高强，能同时掌控很多很多只“小麻雀”——“一切尽在掌握”，这是大格局的意义。

不过，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年轻的时候拿命换钱，年老的时候再拿钱换命。”想要练就盖世武功、营造大格局当然要付出很多辛劳。生命中有些东西是变幻莫测的，时常带给人惊喜。

大格局，更健康的生活

操劳的生活是否更健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确，各种情况都会发生。

不过，很多项研究早就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拥有“控制力”有益于人的健康。

心理学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把养老院中的老人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分成两组，一组完全由养老院规定所有的生活作息细节，另一组则提供较大的自由度，比如可以随意布置自己的房间、种些花草植物等，跟踪调查几年之后，发现自由度较高的老人明显长寿。该实验的分析认为，拥有“控制感”能够影响到人的健康和寿命。



史蒂芬·波斯特和吉尔·奈马克的伦理学著作《好人会有好报吗？》中还提到了一项研究：

19世纪60年代，国际健康与社会中心主任马特博士曾以英国公务员为对象进行了一项有名的调查研究，这一研究时间长达十年以上，跟踪调查了1.7万名以上英国男性公务员的死亡率。

资料显示，随着男性公务员的“职位逐渐升高”，他们的“死亡率”呈现稳定且一直下降的趋势。研究显示，每位男性都可以得到同等的医疗照护，但是职位最低等的，其死亡率是最高者的三倍。即使在他们退休或进入八十几岁时，这样的情况都还继续存在。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马特总结说，影响我们的荷尔蒙分泌、免疫系统以及致病率，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潜在因素。社会地位低的人，压力相对比较大，不太容易获得尊重，也不像社会地位高的人那样易于控制自己的生活。

1985年，马特和同事又开始了另一项大规模的调查研究，这次研究对象包含了男性和女性。他们还加入问卷调查，以便了解这些公务员感觉自己在工作上有多少权限。结果发现，缺乏控制权的人至少占有死亡率的一半。

2004年《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一篇题为“阶级——一个被忽略的却决定着全国人民健康因子”的文章，简单而直率地说明了这一问题：不论是心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甚至癌症，一个人所遇到的风险与他们的社会等级有关。而且这不只跟贫富，也不是简单地与能否获得最好的医疗有关，这主要与你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尊重有关。

另一些研究则表明，许多疾病如结肠炎、心脏病以及抑郁症等都与在疾病发生之前所产生的无助感、失控感密切相关。

的确，控制感是一种美好的感受——除了有益于健康之外，诸多研究也表明当我们拥有控制力时便是更快乐和更有成就的人。

比如，在拥挤的电梯里有人愿意站在靠近控制板的地方，在那儿，他们会觉得电梯不那么挤，也不感到焦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控制这种环境。

人的很多负面情绪（生气、狂怒、愤慨等），多是由于自己的控制力受到威胁，于是人就通过生气、狂怒、愤慨等行为来反抗，以此来恢复自己的个性自由。

这一系列的概念都有着很强的关联：“更强的控制感”和“更多的选择权”有关，“更多的选择权”和“更大的格局”有关，而“更大的格局”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也有关（原因参见《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这些彼此相关的因素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健康、更快乐。

那么，想要培养更大的格局——或者说，想要练就“盖世武功”——要通过什么途径呢？

大格局，并非一日之功

罗马并非一日建成，大格局也并非一日练成——它是主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个人心怀宇宙，他就是大格局吗？谁都可以偶尔仰望星空，然后胸怀无比宽广，但接下来总得回归现实生活。当他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手头拮据而不得不斤斤计较，那他依然算不上大格局——这就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一个人拥有足够多的物力财力，也拥有足够多的物质选择权，却精神空虚如同行尸走肉。如果他不再有更多对美好事物的精神追求，

不仅是缺少精神财富，就连物质财富也很可能逐渐萎缩，那他也算不上真正的大格局——这就是主观条件的缺失。

在主客观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格局便必须经历一个逐渐和缓慢增长的过程，每一步都需留下一个脚印。

其实，人的一生，自然而然地暗含着向大格局转变的脉络——只不过每个人的成长速度和程度不同而已。

一个小孩子，往往只懂得满足自身的需求，别人不满足他，他就哇哇大哭，于是大人们说：“孩子毕竟是孩子。”这就是天然的“小格局”状态。

当一个人初为人父或初为人母，就从照顾孩子开始，不自觉地关注其他人的需求，也就是越来越会照顾人了。这说明，在一个人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这个人的心理格局也会越来越大。成年人能够更多站到他人的立场上，因此，和孩子比起来属于相对的“大格局”。随着年龄增大，格局会增大，这是普遍的发展方向。

孔子有句名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个人格局随着年龄而增长，于是渐渐领悟到“天人合一”，自然也就“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很显然，孔子的这种描述，包含了“向大格局演变”的意思。

不过，尽管每个人的格局都会自然地成长，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的最终格局都会一样大——在格局方面，人和人的差距简直大得超乎想象——有些人，至死都不明白自己此生格局太小，正是他难以成就事业的重要原因。

一个人拥有足够大的格局，才能成就足够大的事业。格局的培养，是在一点一滴中积累的。

为此，每个人都得“从三只小麻雀”开始，才能练就“盖世武功”。

美德与格局

美德与格局有关。与其谈论“美德”，不如改用“大格局”一词，这样更加客观、准确。

您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是这本书中最无聊的一篇，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完成某种必要的论证。

本文主要是想证明“美德”与“大格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各种美德几乎都可以被放到和“大格局”同一个方向，即“向上”的那一端，如下图所示：



向上、增长、快乐、控制、
拥有、强大、大格局、着眼未来
聪明、公平、道德、理性、
宽容、勤劳、真、善、美

在证明“美德”与“大格局”具有“强相关”的过程中，我们将引入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如果 $A \rightarrow B$ ，同时 $B \rightarrow C$ ，那么 $A \rightarrow C$ 的结果就成立）——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先证明某种“美德”具有“联结”倾向，而“联结”则自然意味着“大格局”（这是“大格局”本身的意义所在，而“小格局”则意味着各自为政的、分散的状态）。于是，由“三段论”可以得出：“美德”和“大格局”之间具有“强相关”。

如果您同意“美德与大格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那么就不必看以下那些只为打算质疑该观点的人而写的内容了。

美德之一：聪明

“聪明”指什么呢？“聪明”，从字面上来说就是“耳聪”“目明”。

诸葛亮是聪明的，闻名于世的火烧赤壁是因为诸葛亮懂得气象、知晓天文，在某一个气候的前三天后三天，会转东南风。他算准了这

个日子，所以装模作样借东风，因此打败了曹操。相传，诸葛亮拥有这些知识源自他研读过《易经》。

看来，聪明不仅仅是天生的，聪明意味着“耳聪目明”。真正聪明的人，可能会听到、看到别人听不到、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人要多听、多看。要多与朋友交流信息，要多见世面、多长见识，如此才能使自己更聪明——显然，聪明是倾向于“联结”的，也是倾向于“大格局”的。

美德之二：公平

“公平”是什么？“平”，是一种“比较”，“两者一样多”就叫“平”。无论是“天平”“平衡”，还是“度量衡”，这些字眼都与相互之间的“比较”和衡量的“尺度”有关。

那么，“公平”的尺度到底是大还是小呢？这就要看“公平”的“公”字。“公”，意味着“公众”“公开”“公共”，无论怎么论，都是大尺度、大格局。

我们有时候说，有些竞争是“不公平竞争”，因为存在暗箱操作。“暗箱”，就是局限在不可见人的小范围之内，不能接受更多公众的检验和认可。暗箱操作是小格局，公开、公正、透明就是大格局。

美德之三：道德

“道德”又是什么呢？

偷东西的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却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在他自己的“小天平”上，他的内心非常渴望这件东西，于是就要通过偷盗来满足内心的需要，以求得自己这杆“小天平”的平衡；但是，那件东西是别人的，对于别人来说，本来应该属于那个人的东西被偷走了，“别人的天平”就不平衡了。

所以，一个有道德的人，虽然内心也渴望得到那件东西，但是不会去偷盗，因为有道德的人会用更多人的天平来衡量，既有自己的天平，也有别人的天平，这就是用更大的格局、更公平地来衡量，所以，他才不会去偷盗。

也就是说，道德本身，就意味着在“更大尺度”上的“公平”，意味着大格局。

美德之四：理性

“理性”是什么？首先来看“无理性”，即“冲动”。

相比较之下，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冲动，年轻人血气方刚，而老年人则往往“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了，相对来说是不太容易冲动的。

婴儿的格局是最小的，不高兴了会直接大哭大闹，因为年龄越小越冲动；长大之后就渐渐多了些伪装，即使不高兴也较少直接表达出来。这常常和“理性”相连，因为担心“丢脸”，担心别人不高兴，或者担心将来产生不良影响……

有的时候，成年人也会很冲动，这时如果有朋友在身边，往往会劝他“理性”一些，因为“更多的朋友”就提供了“更多的视点”，就看到了更大范围内的公平；而“理”字本身就意味着“早已被更多的人检验过的真理”，检验它的人越多，越有道理，这就是“大数法则”。

于是，如果一个人起了坑蒙拐骗的念头，可是在“理性”的作用下，他不会真的去坑蒙拐骗，这自然是更“道德”的，所以，“理性”显然也应同“聪明”“公平”“道德”放在一起，属于“大格局”。

美德之五：宽容

“宽容”这个词，毋庸置疑，代表了大格局——“宽”是相对于“窄”而言的，而“容”意味着“有容乃大”。

宽容的人，会更多地“换位思考”，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于是才更有可能宽恕一个人。能够站在对方立场上，本身就意味着大格局。

关于与宽容有关的大格局，上帝的经典劝诫是：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你应该把右脸也凑过去——这便是兼顾“双方”的大格局观。幸好，上帝永远不会说：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你为了让对方高兴，干脆一头撞死算了，因为这样“只符合对方利益”而“丝毫不顾自己的利益”，又反过来变成了“小格局”。所以，宽容是有一定限度的，格局不能大到超越了自身的基础，格局的扩大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美德之六：勤劳

“勤劳”是什么？勤劳就是在可以休息的时候主动地选择工作；和休息相比较起来，工作是着眼于更久远的未来，它带来向上的变化。

另外还有一个佐证：“勤劳”有个近义词是“努力”。

“努”字本身包含一个“力”字，也包含着“奴”字。奴，就是奴役、奴隶、奴仆，不管是你奴役别人，还是别人奴役你，反正，“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些都意味着相对的大格局。

同样，“勤劳”这两个字中也都包含了“力”字。

美德之七：真诚

“真诚”的“真”，用逻辑运算的语言来说，就是“true”。这是一个相互比较之后“两者一致”的概念，“真诚”也是同样一个意思。

另外，“真诚”的“诚”字，也传达出“诚实”“如实”“一致”的意思。

当一个人表里如一，能够把他自身如实地扩大到朋友圈，身内身外的“理”是一致的，是“true/真”的，便是“合”“理性”的，是趋向于大格局的。

反过来说，不真诚，不诚实，就是表里不一，心里想的是一套，嘴上说的是另一套；或者内心有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所谓“秘密”，是和“局限在某个小范围内”有关的，是小格局。

美德之八：善良

什么样的人，被称作“善良”的人？牺牲自己的需要，去满足他人的需要，这样的人便是善良的人。

可是，为什么善良的人会宁可牺牲自己的需要，去满足他人的需要呢？

原因有这样几种：善良的人是大格局，除了自己的躯壳之外，别人也是他所关注的一部分，因此他同样在乎别人的需要；当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更迫切、更重要的时候，他当然还是愿意去满足这些需要的；与此同时，他在眼前满足了别人的需要，就有可能在将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此外，善良的人将“助人”视为自己的“快乐”，也就是说，善良的人除了关注物质，也关注精神——这就意味着，善良本身是“出自于大格局”，也“导向大格局”。

总之，“美德”与“大格局”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上”清“下”浊

很多社会事件乱象频出、违背常理，都与对这一条规律的认识模糊不清有关。什么规律呢？

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描述了天地初开时的景象。

世界开辟以前，天和地像个鸡蛋一样，是混混沌沌的漆黑一团。在这黑暗之中经过了一万八千年，孕育出了一个力大无穷的神，他的名字叫盘古。

盘古醒来睁开眼一看，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拿起一把神斧怒喊着向四周猛劈过去。此后，阳清之气上升成为天，阴浊之气下降成为地。

盘古站在天地中间，不让天地重合在一起。天每日升高一丈，地每日增厚一丈，盘古也每日长高一丈。

这样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

这个神话传说中有一个细节：自从盘古开天地之后，世界就有了“清”和“浊”之分，清在“上”，浊在“下”——这是随机的吗？

隐藏的秩序

近些年来一系列事件的争论，比如范跑跑、苏紫紫、绿领巾、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等，都与我们对某种深层原理的认识模糊不清有关。

在得出具体的结论之前，我们先仔细考察一下万事万物的内在差别。

为什么美好的东西被称为“阳光的”，丑恶的东西被称为“阴暗的”？

为什么我们“称赞”那些“阳光的”，却“贬抑”那些“阴暗的”？

细心的您或许注意到了，“阳光的”和“阴暗的”是一对反义词，“称赞”和“贬抑”是另一对反义词。

我认为，世界上事物有两种不同属性，一种是向上生长的、向外扩展的、接近白色的，即“阳光的”，另一种是向着地下的、向内收缩的、接近黑色的，即“阴暗的”。

比如，一朵花的盛开，是阳光的、绽放的；而这朵花的败落，则是萎缩的、干瘪的。

比如，冬天的多数植物会落叶，这是一种“自我保全”的方式。如果有太多叶子吸取了养分，那么这株植物就很难在严酷的冬天存活下来。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把“岁寒三友”梅、竹、菊都称为“君子”，因为它们在寒冷的环境中、在其他植物都已经凋零的时候依然能够绽放，带给人赏心悦目的美。

再比如，人的基本需求“吃喝拉撒”，也存在这两极属性：吃和喝，是相对来说更美好的，而且常常会聚众进行，大家因此很“开心”；而拉和撒，却需要关起门来偷偷地进行。也就是说，“吃和喝”更多采取相互联结的大格局方式，“拉和撒”则采取彼此分散的小格局方式——这是遵从事物本身应有的属性，不能颠倒的。

热点争议问题：搅乱了秩序

很多人都记得“范跑跑”——那个在汶川地震中只顾自己逃跑、不顾学生的“老师”，事后居然还以此为荣，在博客中大肆炫耀他在地震中的行为，是典型的“自我保全”式，就像冬天的树一样，只剩下树干没有了树叶，光秃秃的一点也不好看。可是，他还要到处炫耀，好像在说，大家快来看呀，我多么“抽巴”！这个一点也不美。

有人为他辩解，说这是“求真”呀！遇到地震，逃跑是自然的反应，这很真实，他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不正是一种“求真”的体现吗？

什么叫“求真”？我认为，“遵从事物本来应有的属性”，这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而谈到“属性”，有些是“阳光的”，有些则是“阴暗的”。

请注意，这并不是说，“阴暗的”东西不允许存在——绝不是，就像拉和撒，必须允许存在，但是，只允许在“小范围内”存在！

作为一个老师，理应有比一般人更大的格局（至少对于学生来说是如此）；作为一个普通人，选择逃跑情有可原，虽然不那么高尚，但也不算上十恶不赦。问题在于，不那么阳光和绽放的行为，就不要放到光天化日之下炫耀才好。

这是由于我们对“求真”存在着误解，因而在2008年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讨论。

可是，这场全民讨论依然没有带来应有的结果。

2011年，有一位女大学生苏紫紫，她主动赤裸全身在镜头前接受诸多媒体的采访。在某次专访中，苏紫紫说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大意是说，裸体模特是一种艺术，是给那些带着艺术欣赏眼光的人们看的。可是，却有些人自己想歪了，所以才显得很不好。

的确，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具备欣赏艺术眼光的，但也有很多人尚不具备，这是事实。如果她期待自己的观众都是具有艺术眼光的人，就应该把裸体仅限于艺术场馆之内——在那里，她的付出才会获得应有的尊重。

苏紫紫所带来的争议，依然是我们对于“求真”的认识误区：不遵从事物应有的属性，不去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场合和最合理的尺度，美就会被践踏。

2011年秋天，西安又出现了“绿领巾”事件：好学生戴“红领巾”，差学生戴“绿领巾”，美其名曰，是为了敦促差生上进。

可是，应该被放到阳光下的，本应是那些好的、应当鼓励的东西——至于相对差的、不被鼓励的，自然意味着不那么好，谁都会知道这种感受，何必去刻意放大它。如果用公式来表示，“红领巾=好学生+放大”，而“绿领巾=差学生+放大”，在这两个等式中，只有一对相反的元素（“好学生”和“差学生”），而另一个元素是一样的（“放大”），这不符合宇宙复杂和精妙的原理。

这种复杂和精妙的原理，有着非常普遍的体现方式。

宇宙的复杂对称：两次联合变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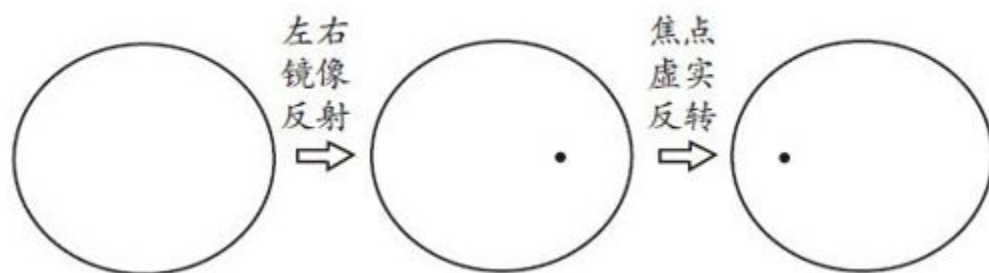
我们来观察下面的图片，考察一下其中存在什么样的原理：



古老的太极图，围绕中心旋转180°相当于黑白互换，再经过一次黑白反转之后，才能回复到原先的样子——也就是说，必须是两次变

换联合起来，才能使图形完全不变（另外一种保持图形不变的方法，是旋转 180° 之后，再旋转 180° ，也同样需要两次相反的变换联合起来）。

在椭圆图中，这一原理同样是适用的。前文提到过，行星椭圆轨道中的两个焦点，一个是有形的（看得见），一个是无形的（看不见，但在数学意义上存在），这个椭圆图案如果经过“左右镜像反射”和“焦点虚实反转”这两次联合变换，也能与原图保持完全一致：



如此看来，很多事物对称的复杂性，超过了“单纯的黑白互换”或者“单纯的镜像反射”——这个世界，恐怕并不像“单纯二分法”那么幼稚——换句话说，“二分法”的确是存在的，这符合常识，但仅仅在一个维度上还远远不够，它常需要两次联合变换。

说得更通俗一点，我们都知道“负负得正”，一个“负”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而两个“负”联合作用之下，才能与原来保持高度一致。

这就是说，“上”清“下”浊，“惩”恶“扬”善，这之间的关系都属于“两次联合变换”或“负负得正”的结果——这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天理本该如此：光明和美好的应该被放大，黑暗和丑陋的应该被贬抑。

现实的复杂性：附带条件的影响

光明和美好的应该被放大，黑暗和丑陋的应该被贬抑，这个并不难理解，在多数人的内心深处是认可的，但是，为什么那些事件（范跑跑、苏紫紫、绿领巾等）依然会引起热议呢？

因为每个引起争议的事件，都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在前面的《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中曾经论述过事物的复杂性），它们包含着很多附带条件。

如果如前所说，黑暗和丑陋的应该被贬抑、应该将其限制在小范围之内，那么是不是一切不那么光明正大的东西，都不应该被曝光呢？比如说，贪污腐败，是件坏事，要不要曝光？答案是：当然要！

为什么？

那就要看想曝光的这件事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以及“跟谁有关系”。

拉和撒，只跟自己有关系，当然不应该当众进行。

差学生，如果学习成绩不好，主要跟自己或家长有关系，但并不因此妨碍别人。

贪污腐败，和人民群众却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一个高官由于贪污腐败导致了某项豆腐渣工程的出现，人民群众每天要在那个豆腐渣的桥梁、道路上行走，因此存在安全隐患或生命危险，就有权利知道是谁造成了这一切。

在近几年的官员雷人雷语中，有一句十分有名：

2009年“两会”期间，记者询问某省一位高官“怎么看待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以及“是否会提这样的建议或者议案”时，谁知得到的回答竟然是这位官员的反问：“不会。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那些（私营）企业老板的利润为什么不向工人公布？”

事实上，很多国家为有效防止腐败都实施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20多年来，许多有识之士也一直在努力促其在中国早日确立——至于在中国要不要公开、在怎样的尺度下、以怎样的时间表来公开，都可以再进一步探讨，但至少我们要遵从规律。

如果从理论上讲，老百姓个人财产，或者高官的个人财产，哪个更应该公开，或者哪个应该先被公开，这不应该存在争议，更不能像那位官员所反问的那样：“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这一反问，是无知的体现。

绿皱豌豆，黑天鹅

常识有时候被怀疑，是因为“绿皱豌豆”和“黑天鹅”等存在着。

但因此就应该挑战常识吗？

什么是“绿皱豌豆”？就是豌豆种子长得又绿又皱，不同于“黄圆豌豆”，这是豌豆在外形上的不同性状。

什么是“黑天鹅”？就是全身乌黑的天鹅（据说长得很丑），它在自然界真实地存在，于1697年在澳大利亚被发现。此前人们曾确信天鹅全都是白色的。

有一本名为《黑天鹅》的书，该书作者认为，有些事情出现的概率很小，比如“9·11事件”等，但它们对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事件可以称为“黑天鹅”事件。

那么，“绿皱豌豆”和“黑天鹅”又有什么关联呢？或许可从遗传学中寻找。

绿皱豌豆：小概率事件

稍有基因常识的人都知道，基因中有些是显性的，有些是隐性的。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显性基因更容易显现出来，隐性基因则倾向于隐藏，不容易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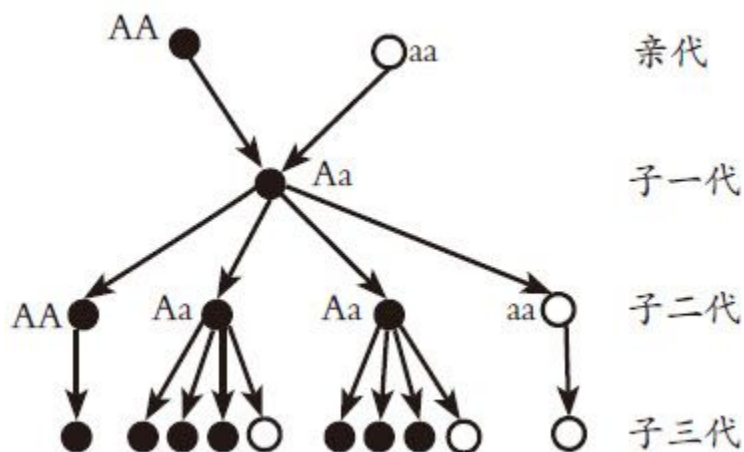
这个结论不难理解，问题是这一科学发现是如何获得的。要知道，从生物的“整体形式和行为”中想要观察并发现遗传规律并不那么容易；而“个别性状”虽然容易观察，但人们往往只见局部不见整体，这也是遗传规律使科学界长期困惑的原因。

在《科学实验之光》中介绍了遗传学研究的大致历程：孟德尔为遗传基因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考察生物的整体，更着眼于生物的个别性状，这是他与前辈生物学家的重要区别之一。1856年，孟德尔以豌豆为材料开始从事实验，前后约历时8年，以证明生物性状遗传给下一代是遵循确定的规律而不是混沌无序的。

以高茎与矮茎为例，首先将矮茎豌豆雄蕊摘掉，再将高茎豌豆的花粉撒在矮茎豌豆的柱头上，使两者交配，观察它们所产生的子代为

高茎或矮茎，结果发现所得的第一子代均为高茎植株。换句话说，高茎相对于矮茎表现为显性。

接下来，孟德尔又利用所得的第一子代相互交配，结果在第二子代中发现显性性状的高茎者约占总数的 $\frac{3}{4}$ ，另一相对的隐性性状，即矮茎者，约占总数的 $\frac{1}{4}$ 。再接下来用子二代相互交配得到的结果，体现出相同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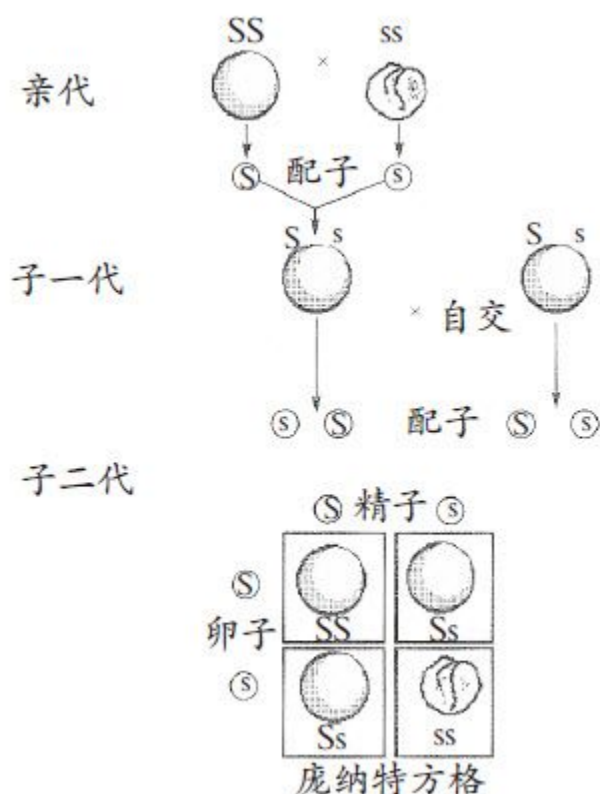


上面这张图是孟德尔用来表示两个具有不同特殊性状豌豆株系的杂交结果。在具有AA或Aa基因型的个体中都表现出显性性状（●），而隐性性状（○）只在具有aa基因型的个体中才表现出来。

孟德尔选择的实验材料也非常科学。他选用豌豆作研究，因为豌豆属于具有稳定品种的自花授粉植物，容易保持纯种，容易栽种，容易逐一分离计数。此外，豌豆的某些特性常有两两成对的情形，且易区分，如高茎和矮茎、种子有圆的和皱的、子叶有黄色和绿色、花的位置有在主茎轴上或主茎顶端的等等；同时豌豆生长期短，播种后约三个月便开花结果；其杂交后结实率高，产生的种子仍有生殖力。更重要的是豌豆的自花授粉特性便于人工授粉的可控实验。孟德尔选取七种两两对偶的性状，分别进行交配，然后观察它们所产生的子代。

他对这七对性状分别进行相同的实验，得到的结果均与上述高茎和矮茎的规律相同。他的结论是，第一子代只表现出显性的性状，而第二子代中隐性性状出现的比例则分别为 $\frac{3}{4}$ 对 $\frac{1}{4}$ ，即相当于3:1。

孟德尔又用具有两对相对性状的豌豆做了杂交试验。结果发现，黄圆种子的豌豆同绿皱种子的豌豆杂交后，子一代都是黄圆种子；子一代自花授粉所生的子二代，出现四种类型种子。在556粒种子里，黄圆、绿圆、黄皱、绿皱种子之间的比例是9:3:3:1，如下图所示：



由实验结果9:3:3:1可以得知，黄和绿相比，黄是显性的，绿是隐性的；圆和皱相比，圆是显性的，皱是隐性的——所以当显性和隐性相互PK时，“绿皱豌豆”就成了“小概率事件”。

这个“小概率事件”存在数学规律，即当只有一对性状时，小概率事件占1/4（即1/2²），而当具有两对性状的时候，这个比例锐减到1/16（即1/2²×1/2²）……随着性状的不断增多，全部呈现为隐性性状的会越来越少，直至成为“极小概率事件”。

黑天鹅：极小概率事件

如前文所说，“黑天鹅”本身指的就是极小概率事件。在《黑天鹅》一书中，指出“黑天鹅事件”是满足以下三个特点的事件：“首先，它具有意外性，即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也就是在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的可能性的证据。其次，它会产生极端影响。最后，

虽然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织理由，并且或多或少认为它是可解释和可预测的……简而言之，这三点概括起来就是：稀有性、冲击性和事后（而不是事前）的可预测性。”

《黑天鹅》一书的作者认为：“少数的黑天鹅事件几乎能解释这个世界中的所有事情，从思想的胜利到历史事件的变迁，到我们的个人生活。自从大约1万年前的更新世以来，黑天鹅事件的影响一直在扩大。”

书中列举了一些被称为黑天鹅事件的大事，除了“9·11事件”之外，还有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崩盘、泰坦尼克号的沉没等等，这些带来巨大灾难的极小概率事件的确曾经发生过。

人性的小概率事件

下面以“绿皱豌豆”和“黑天鹅”等小概率事件的视角来探讨一下“人性的小概率事件”。

众所周知，人类具有很多被称为“美德”的品质，比如聪明、公平、道德、理性、宽容、勤劳、真诚、善良……而我把这些美德称为类似的“显性基因”，把它们反面（即小格局引起的恶行），称为“隐性基因”（至于为什么这样来对应，而不是反过来，可参见本书《香香的，臭臭的》《人性之争的终结》《美德与格局》《“上”清“下”浊》等）。

由于上述“绿皱豌豆”之类的“性状越多，呈现比例越小”的原因，一个人所具备的统统是“隐性基因”（即邪恶的部分）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微小的，因为人类可以被考察的品质种类实在太多，非常复杂地纠缠在一起。

即便是迄今为止最典型的反面例证希特勒，据他的秘书回忆，也具有有一些优秀的品质（以至于战后一度让秘书很困惑），比如希特勒并不喜欢在房间里摆放花，因为他不喜欢看到花凋谢枯萎（似乎他还蛮有人性的，甚至有时还颇具“人格魅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不自觉地卷入他所谓“宏伟”战争计划）。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发现，你很难将身边的一个人视为“不折不扣的坏人”，这样的人真的很难见到，即便见到了也常常是陌生人；而这个陌生人在他自己的生活圈中，没准儿还算不赖呢。

当然，如果真的出现了某种“人性的黑天鹅”，这样的人会带来极大的影响，但是，恐怕没有多少人期望自己成为那个黑天鹅。为什么？因为黑天鹅是“由于不被预期而发生和加剧的”，它不可预期，所以可遇而不可求（由此才被称为黑天鹅）。

这无疑是一个矛盾：它不可预期，所以想也白想；如果我们一定要从“黑天鹅”中学会些什么，那应该是：负面黑天鹅的确存在，碰上它就算倒霉；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历史统统是负面黑天鹅决定的，因为这只是世界两种力量（向上和向下）中的一种。同时正视这两种力量的存在，是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

反过来讲，最优良的“基因”应该是什么样子呢？理论上说，或许类似于AA、BB、CC、DD、EE、FF、GG……总之，统统由显性基因（大写字母）相组合而成（当然，这里的“基因”是一个比喻，指的是人类的一切美德），几乎“纯白无瑕”——这样的人也非常非常少，同样属于“极小概率事件”。从理论上说，具有最多美德的人，理应占据权力的巅峰。

高官与高道德

不要让情绪击溃理智。在这样一些敏感话题上，理性一直在场。而且，理性越多，越能够与感性握手言和。

Z去赴一个饭局，那天一同吃饭的有某部队的一号首长、二号首长、三号首长……

“真奇怪，我谁也不认识，更不知道谁的官大，但是竟然一猜一个准。其实方法很简单，最面善的就是官最大的！一问身边的朋友，果然如此。”Z对我说，“似乎官职越高的人，越是和善！”

旁边的F此时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讨论：“没错儿，反倒是有些处长级别的人，最牛哄哄的，一看就没什么仕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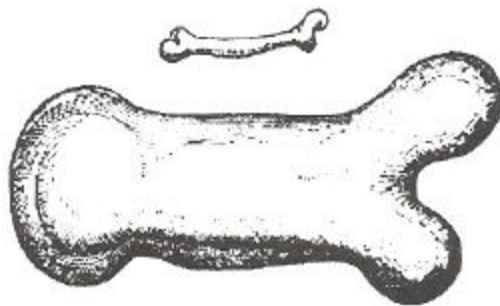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提起过类似观点，即一般情况下“道德品质”似乎与“官衔高低”成正比。这是为什么呢？

自然界的一些现象能给我们启发。

巨犬的骨头

下面这张图是伽利略在《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描述的两块狗骨头：

那块较小的狗骨头是正常比例。



但是，如果假想有那么一条巨犬，其长、宽、高都比正常狗大一倍，那么为了足以支撑身体的重量，它的骨头应该有多强壮呢？

对这个问题，不能想当然地把正常狗骨头的长、宽、高只简单地按比例放大一倍，而是要像图片所描绘的那样，这只巨犬的骨头必须

更加强壮和坚固，以至于它的粗壮程度夸张得不成比例——这是伽利略在经过严格的物理学计算之后得出的结果。

生活中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大象粗壮的四条腿，与其他小型动物的腿也是不成比例的，马从两倍于它身高的地方跌下来会摔断骨头，而猫可以从五六倍于自己身高的地方跳下来安全无恙，老鼠从相当于身高几十倍的天花板上跌落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体型越大，骨骼应当越强壮；与此同时，体型越大，骨折的风险也越大。

在《关于两种新科学的对话》中还记载了威尼斯造船厂一位有经验工匠的话：“在最大的船只下水时必须格外注意，以避免大船在它们自身的巨大重量下发生开裂的危险。”这和粗壮的狗骨头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想，道德问题也是如此吧——高官掌握更多的资源，“体型”比较大（要对一个单位、一个集体甚至更多人负起责任），因此其品质也必须比常人更加可靠和坚固，否则就容易出现危险。

简言之，“高官”应当具有“高道德”（或者反过来说，民众有权要求高官具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水准），这是合乎情理的。

最经典的正面例证是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的选择无疑是更“大格局”的（在前面的《美德与格局》一文中曾论证过“高道德”与“大格局”之前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大禹被后人称颂。

反过来，如果占据高位的官员不具备比常人更高的道德，只为一己私利，那么将对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其代价太大（就像巨犬的骨头不够粗壮就无法承受重荷一样）。

道德：不可或缺的力量

之所以中国的民众期望高官能够拥有高道德，这和中国政治体制有关，国家机器的权力相对集中，因此有人评价说，“其优越性是干好事效率高，弊端是干坏事效率也高”。于是学者纷纷呼吁大力推进法制化建设，以提供更缜密的规章制度。

这当然非常有必要，不过，人们常常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所有问题都出在目前的法律不够完善，等到完善了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可惜，不幸的是，法律作为一个逻辑体系，它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完备（“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在分析哲学领域是人所皆知的，

有一系列的悖论皆与此有关，后面的《左脑和右脑，缺个心眼儿的机器》一文将作简要介绍）。

那么，假如法律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达至“完善”，那怎么办？还有必要推进法制化吗？当然有必要。法律当然有必要越来越走向完善（提高犯罪成本，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是它不应当成为唯一的期望所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遇到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办？在某些国家，这个问题是通过宗教得以解决的。人们心里想的是：“我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但我心中的上帝（或其他神）不允许，所以我就不去钻空子。”

的确，宗教是一种解决方法（这是事实，无须回避），但它不是弥补法律漏洞的唯一方法——宗教虽然有它的作用，却也有自身的障碍（因为宗教常常难与科学相容）。

除了宗教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弥补法律的漏洞？

其实“道德”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假如人们心里想：“我可以钻法律的空子，但我内心的道德不允许我这样做，因此我就不去钻法律的空子。”这样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绕了一大圈，似乎回到了某种“常识”上：谁都知道应该宣扬“道德”，谁都知道“道德”要求我们做什么，可惜就是有些人不按道德规则行事——只不过，“道德”应当不断进化（详情参见前面的《道德的理由：直觉？功利？》），它不仅应该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且应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应该这样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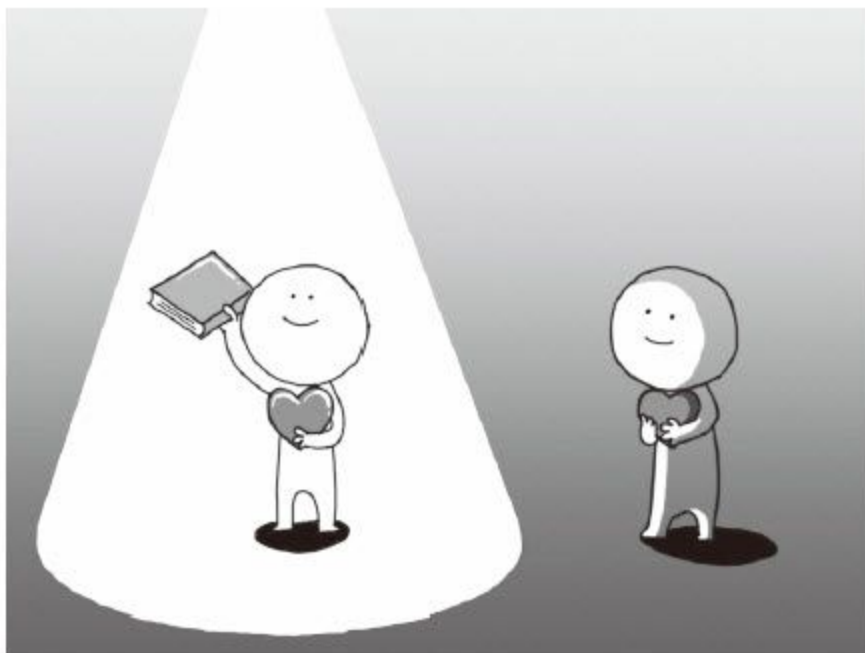
官员晋升：道德和能力的复杂博弈

我们继续探讨“高官与高道德”的问题，我把它总结为以下四条：

第一，高官，通常情况下的确会具有高道德，因为这是复杂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达尔文所说的“优胜劣汰”。

为什么呢？我们做一种较为细致的理论思辨：

假设两个人同样“善良”，一个“聪明”，一个“傻”，谁会更有优势？显然是“聪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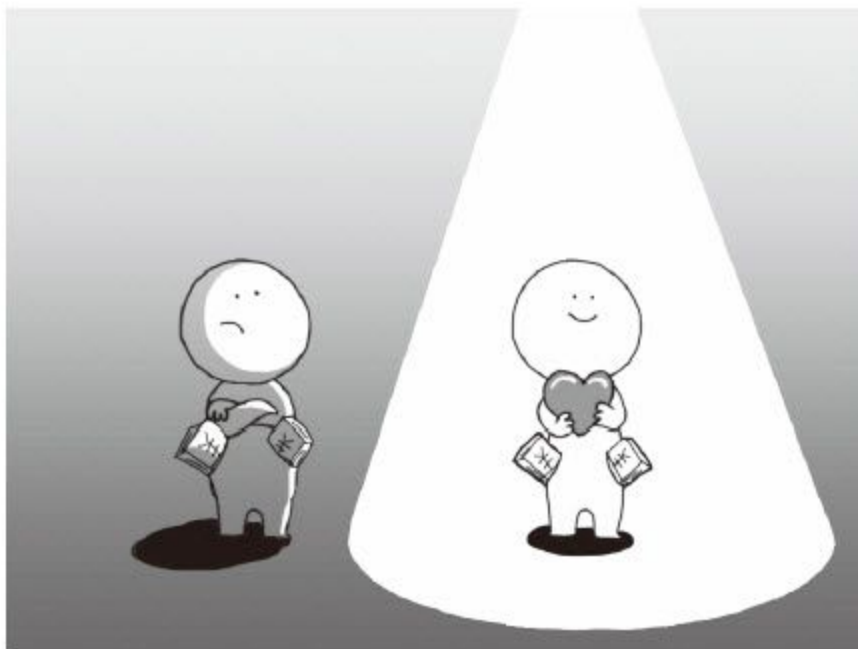
现在假设两个人同样“聪明”，一个“善良”，一个“坏”，谁会更有优势？

如果这个善良的人不是傻子，即善良的人和坏人一样聪明时，坏人也未必占得着什么便宜！

前文说过，真善美似乎在不同的方位上，它们像三原色一样，似乎不那么容易同时兼顾，所以，每个人拥有的、追求的品质似乎不尽相同（参见《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

再来假设两个人同样“有钱”，一个“善良”，一个“坏”，谁会更有优势？

如果这两个人都拥有足够的金钱来经营自己的事业，即有德者同样不差钱，那么有德者依然会胜出——这就是多数成功商人心知肚明的“诚信”原则对事业的推动力。



可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好人得不到好报”，认为似乎“当坏人更占便宜”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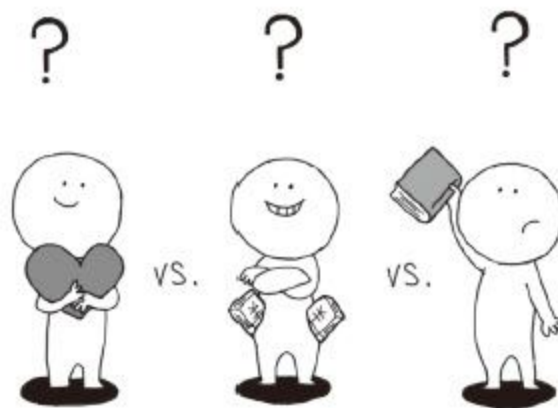
因为好人有点“傻”，坏人又有点小“聪明”——宇宙之道鼓励的是“聪明”，惩罚的是“傻”。其实，所有那些“优秀品质”，才是真正被鼓励的东西（参见前面的《香香的，臭臭的》和《“上”清“下”浊》）。

因此，当一个人拥有更多的优秀品质，他就会逐渐进入社会上层，甚至占据权力的顶峰。就像《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一文中所描绘的“白色”位于陀螺顶端一样。

不过，多数人未必能如此接近完美，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家庭出身、健康状况、智力条件、教育环境……），或者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理想信念、勤奋程度……），很多人并不那么完美，要么是“有点傻的好人”，要么是“只剩下钱的粗人”，要么是“聪明的坏人”……

现在，让我们从理论上来把这些“有点傻的好人”“只剩下钱的粗人”和“聪明的坏人”放到一块儿比较，谁更占便宜？

这个问题就有点复杂了，其中各种优秀品质的“程度”就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实生活中，正因为它太复杂，所以才让人们产生了困惑。



遇到这种困惑，又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把这个难题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这项PK跟您有关系；另一种是这项PK跟您没有明显关系。

先说第一种情况，如果跟您有关系——或者说，您就是其中那个“有点傻的好人”——那么您要做的是让自己“聪明”一点（聪明并不完全是天生的，它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提升，详见前面的《美德与格局》）。



如果您属于一个“只剩下钱的粗人”，那不妨把钱花出去一点点，结交一些有文化的朋友，多多增长见识，那就会让自己更有江湖地位。

如果您属于一个“聪明的坏人”，如果能够让自己保持那份聪明，同时尽量与人为善，那么总体上就会更加有利可图。



再来看第二种情况，如果跟您没关系（在您的最大格局之外）——当事人既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的近亲好友，你丝毫不能以自己的力量帮助或改变那个人——那么，管他呢，反正您心里知道，从总体上说，胜出的人意味着拥有了“更多优秀品质”。

通过以上假设，我们至少可以认为，一个人拥有某种权力，一定是因为他具备了某些优秀的品质，即高官在通常情况下是和高道德成正比的，当然，现实情况下可能会存在反例。比如贪官污吏的存在，那是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相应的阶段，就像“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社会的博弈不得不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得以体现，某些贪官污吏是因为“能力强”而不是“道德高”而成为高官的。

第二，如果现实社会中存在某些“高官，低道德”的现象，那就像“有点聪明的坏人”一样，这个人由于“能力强”（这也是一种优秀品质），甚至有可能通过耍小聪明获得了权力，这依然不违反第一条。

针对这种情况，更重要的是我们该拿这些人怎么办？这就涉及以下的第三条和第四条。

第三，通过某些方法，提升“低道德的高官”的道德水准，使其逐渐走向大格局（道德是可以不断进化的，具体方法参见《为富不仁？》一文）。

第四，通过一些帮助“高道德的中层官员”晋升的方法，使其变成“高道德的高官”，把“低道德的高官”淘汰出局（具体方法参见《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困境？困境？困境？》和《人“吃”人的社会》），这将形成一种倒逼的力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竞争：一种漂亮的手段

在江本胜的《水知道答案2》中，有一张图片是“竞争”这个词的水结晶。虽然我们无法用这张图片来“证明”些什么，但它非常美丽，也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竞争”这个词的水结晶美丽得超过了实验人员的预期，作者因此在书中称其“出乎意料地异常美丽，看来遵循一定规则的合理竞争是必要的”。亚当·斯密曾经把“市场”称为“无形的手”，恰恰是由于同一原理在起作用。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使得商品总是围绕着真实价格出售：卖得太便宜，自己亏本；卖得太贵，没有人买，久而久之也会被对手淘汰出局。所以“竞争”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调控手段。

经济学中“竞争”这种漂亮的手段，其实和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发现的“优胜劣汰”几乎是同义语——“竞争”手段是普遍适用的。

至于官员的升迁之道，无非也是个不断竞争的过程；而竞争这种机制，使得“商品”不得不围绕着“真实价格”出售。

但从前面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官”和“高道德”是具有相关性的，而且随着竞争的不断升级，社会将越来越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当个坏人更占便宜吗？

当代人如果谁没思考过这个问题，那他活得简直太迷糊了。

但是，结论又是什么呢？

作为广院的优秀校友，白岩松每个学期应邀到播音学院来做一次讲座。

有一次，他开场先提了个问题：“在这个全民皆记者的时代，作为职业记者，又该如何做一个记者？”同学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

我站起来说：“职业记者更要遵从‘大数法则’。根据《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一书中的推论，在大数法则下，人们会成为平均人，而平均人将体现出真善美的原则……”

白岩松回应道：“大数法则，我犹犹豫豫地相信着，因为某种‘劣币驱逐良币’原理的存在……”

这里，他用到了一个词“犹犹豫豫”，这个词非常准确，没错儿，“劣币驱逐良币”是一条著名定理，但与这条原理有关的内容却比较复杂。

格雷欣法则：当个坏人？

“劣币驱逐良币”是在16世纪由英国伊丽莎白造铸局长格雷欣提出的，也称“格雷欣法则”。他观察到：消费者保留储存成色高的货币（贵金属含量高），使用成色低的货币进行市场交易、流通。由此，“劣币驱逐良币”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定律。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仅在铸币流通时代存在，在纸币流通中也有。大家都会把肮脏、破损的纸币或者不方便存放的镍币尽快花出去，而留下整齐、干净的货币。

这种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也同样存在，比如“失德者得利，守德者失利”，比如“低俗传媒的发展往往比严肃传媒更有优势”等。这都与“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类似，那些坑蒙拐骗的人经常占到便宜，于是搞得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当良民。

正由于“劣币驱逐良币”原理的存在，我们经常据此慨叹社会“道德滑坡”。

然而，这个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潜在含义是：良币都被每个人收藏在家里，不拿出去流通，所以市面上劣币更多，并不意味着早已不存在良币。“道德是否滑坡”也是如此，尽管媒体放大了某些失德现象，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世界已经彻底道德沦丧。

至于“劣币驱逐良币”经常被用来解释官场黑暗的原因，这个结论也须进行更深入、更周密的辨析和甄别。

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分析了古代官场的游戏规则，即在众人皆贪的时候，独善其身者常常被视为异己分子，无处容身，被迫同流合污，否则必然被排挤出局。最后廉吏越来越少，越来越无法生存。这也是劣币驱逐良币原则在起作用。

的确，这条规律是存在的，铁证如山，也合乎逻辑。但是，如果有人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这个世界必然是当坏人更占便宜，那也未免偏颇。

反格雷欣法则：当个好人？

有研究者指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存在的基础是“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称”。因为如果交易双方对货币的成色或者真伪都十分了解，劣币持有者就很难将手中的劣币用出去，或者，即使能够用出去也只能按照劣币的“实际”而非“法定”价值与对方进行交易——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开创者是美国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阿克洛夫，他因此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所以，关键问题似乎出在了“信息是否对称”上——我认为，这和是否具有足够的“联结”条件有关。

本书观点认为：社会越发展，越是倾向于联结的（以“地球村”而论，当代社会的相互联结程度远远高出古代）；同时，格局越大，越是倾向联结的。而如果每个人（至少更多一些的人）愿意逐步扩大自己的格局，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结，那么整个社会的联结程度又会进一步增强——在各种联结手段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有助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因而有可能给“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增加难度。

以现实的例子来说，近年来总能看见网民以人肉搜索等方式“爆料”，某官员的学历是否造假、学习期间的论文是否抄袭、是否符合正规的官员推举程序、是否存在贪污腐败行为……虽然未必每一件被人肉搜索的事情都必然存在问题，但至少经过这个过程，真相会越来越

清晰，要么用事实来辟谣，要么把阴暗的事物推倒，这恰恰是因为“联结”和“解构”本身的不同倾向所致（参见《香香的，臭臭的》）。

回到“劣币驱逐良币”的话题上——在信息更透明的情况下，良币会占据上风，这个结论符合“反格雷欣法则”。

什么是“反格雷欣法则”呢？譬如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外汇市场，亦即没有任何法律强制干预的市场，在各种货币之间，并没有一定的法定比价存在，而这些货币之间价值各不相同，其中走势坚挺、含金量较高的货币被认为是硬通货，即“良币”；反之，走势疲软的货币被认为是软通货，即“劣币”。在国际贸易当中，人们往往乐意接受硬通货，即“良币”，而不愿意要软通货，即“劣币”。从而优胜劣汰，形成了“良币驱逐劣币”的局面，这就是所谓“反格雷欣法则”，也是与“格雷欣法则”同时存在的另一条法则。

由此可见，事物总是成对出现，既有“劣币驱逐良币”，也有“反格雷欣法则”；既有“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也有“上清下浊、惩恶扬善”的规律。这两者，一种向下，一种向上，同时存在着——正如盘古开天地，地日深一丈，天日高一丈。

当劣币还是当良币？

那么，既然两者同时存在，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做劣币还是做良币？选择当坏人还是选择当好人？

客观地说，两种方式都能获得期望中的某种结果，它们只是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区别之一：短时效应和长时效应。

由于恶是向下的，所以它很迅猛，所谓“病来如山倒”，它可以在一瞬间把美好的东西摧毁殆尽；善是向上的，所以它很缓慢，所谓“病去如抽丝”，它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肌体的修复。

自然界也是如此。与“狂风暴雨”相对的“蒸腾作用”，虽然不像“狂风暴雨”那样“貌似强悍”，但是，蒸腾作用也被称为“强大的蒸腾作用”（因为需要克服地心引力）。从水的循环来看，总体是“平衡”的。

“善”是“蒸腾作用”，“恶”是“狂风暴雨”，所以，从“表面上”看，“恶”的确“貌似”更强大——但从更长时间、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两者各有优势。

选择“劣币驱逐良币”的途径，的确有可能走捷径，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相反，选择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走，则需要更长时间——但是如果从更长时间来看是“公平”的。

选择当“良币”的人，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不要过于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区别之二：将来是否容易被解构。

有句俗话叫“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因为它的建筑结构不那么坚固，所以崩塌的概率会更高——这就是为什么从长时间来看是“公平”的，因为走了捷径的人，即便得到了，也可能会重新失去。

还有一句至理名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其后半句常常被忽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就是指一种长线效应。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通过非正当手段走捷径的人都一定会被解构（这也就是人们存在侥幸心理的原因），但是从解构的“概率”来看，必然比一步一个台阶、规规矩矩的人更大一些（关于用概率的方式来看问题，请参见后面《上帝掷骰子》一文）。

区别之三：内心的感受。

曾经读到过一个很美的童话故事：

小熊在上学的路上，路过河马伯伯家，看见河马伯伯的窗台上放着一只漂亮的小哨子。小熊拿起来一吹，“嘟！”真好玩儿！小熊很喜欢这个小哨子，可是河马伯伯不在家，小熊看了看旁边，没有人，它就把哨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到了学校之后，小熊发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小熊心想：“一定是我走得太急了，歇会儿就好了！”可是，它歇了很久，心还是怦怦直跳。

小熊又想：“那我就唱歌吧，每次唱歌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的！”然后它就唱起歌来。可是，唱歌的时候，小熊的心还是怦怦直跳。

它又想：“那我就跳舞吧，每次跳舞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的！”小熊跳起舞来，可是心还是怦怦直跳。

这时候，它想起了那个小哨子。“嗯，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哨子呢？”

放学回家的路上，小熊又路过了河马伯伯家。河马伯伯还是不在家，小熊看了看四周没有人，它把哨子又放回到了窗台上。

咦？真奇怪！小熊的心再也不怦怦直跳了！

多么可爱的一个故事——人心，是一种如此敏感的东西，它精妙得无与伦比。

选择做个好人，才能有“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的坦荡胸怀。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走了捷径的人，心里常常不踏实，总担心哪一天东窗事发，所以比一步一个脚印走路的人多了一些不必要的忧虑。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幸福，而幸福很多时候恰恰只在于内心的安宁与平和，中医认为，阴阳平衡，越平衡越健康，但恐怕平衡的不仅

仅是“生理”，也包括“心理”，心理越平衡、越安宁的，也是越健康的。

人为什么穷？

导致穷或富的理由都有千百种，这一种，普遍通用又切实有效。

有一部好莱坞电影，叫《时间规划局》，说的是在某个想象的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然寿命只有25岁，每个人手腕上都有一个时码表，上面的绿色数字不断跳动着。

时码一旦清零，很不幸，人就“嘎嘣”一下猝然死亡，不论他之前多么健康、多么活蹦乱跳。除非他通过劳动或贷款等其他方式，储备足够的时间，才可以继续活着下去，一直保持着25岁时的容貌。

更有趣的是，在电影中所设想的这个世界里，时间就是货币，想要获得任何资源，都要用时间去购买。这里，“货币”单位，是以“时间”单位来表示的。比如，一杯咖啡标价“5分钟”，坐一趟公车要付费“30分钟”，然后购买者把手腕放在“刷卡器”上，这“时间货币”就变成别人的了。

在这个社会中，也同样有极端的贫富分化，穷人能活到三四十岁就算万幸，而富人可以千年万年地活下去，依然保持青春不老（只要他自己不想找死）。于是，这种差别激起了某个穷人（也就是影片主人公）的强烈不满，他要向生活在“富人时区”的“时间资本家”讨回公道：凭什么，你们那么富有，我们这么贫穷？！

这部影片提供了一种深刻关照，即“时间，就是货币”——对于穷人来说，这个理念尤为重要。

时间，是最通行的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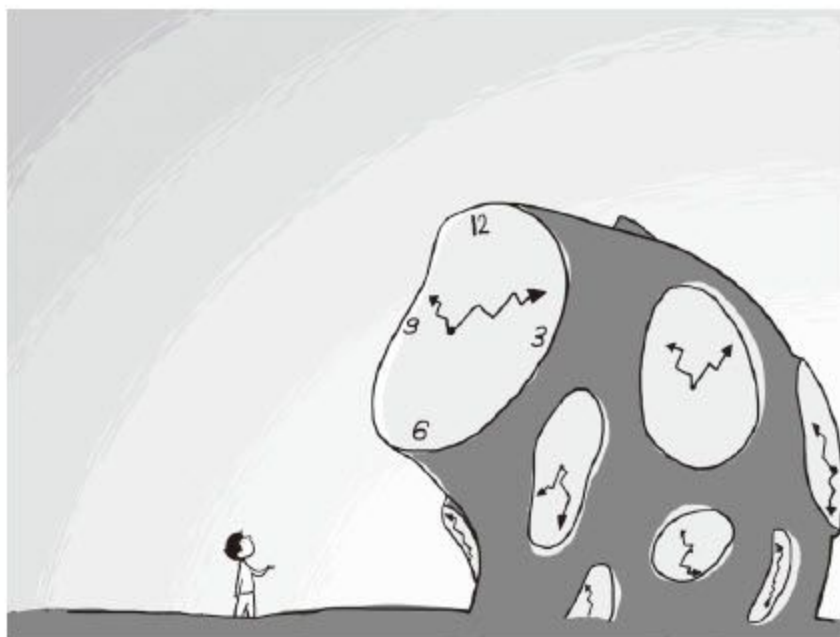
“为什么我也很辛苦地劳动，却不如别人挣得多？”——这是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关于“人为什么穷”的问题，不同人有着不同的解释。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绝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财产性收入和劳动性收入的差别，包括钱滚钱、利滚利的规则，包括权力地位，包括祖宗数代的积累，包括地域优势，包括先天智力的差别……这么数下去，似乎会很绝望，因为上述原因属于“既成事实”，我们个人很难去控制。

但有一个因素是可以控制的，每个人、每一天，都有可能从这里发生改变，进而挣到更多的钱、改变贫穷的面貌。首先，从改变对时间的认知开始。

时间，就是最通行的货币。



“时间就是最通行的货币”并不等同于我们经常说的“时间就是金钱”，它是说“时间是比金钱更通行的货币”。因为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人有五种层次的需要，然而这一切需要都得付出时间去满足，也就是说“时间是满足一切需要的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剩余劳动价值”是怎么来的呢？是在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之外，还有“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生产出的就是“剩余劳动价值”。请注意，如此看来，资本家剥削的也是工人的“时间”！

当某个人获得了一份工作，就意味着要“朝九晚五”地去上班，也就是付出固定的时间，获得相应的报酬——工资是用“时间”买来的（当然，这个人付出了“劳动”，但是，还付出了“时间”）。

时间货币的“含金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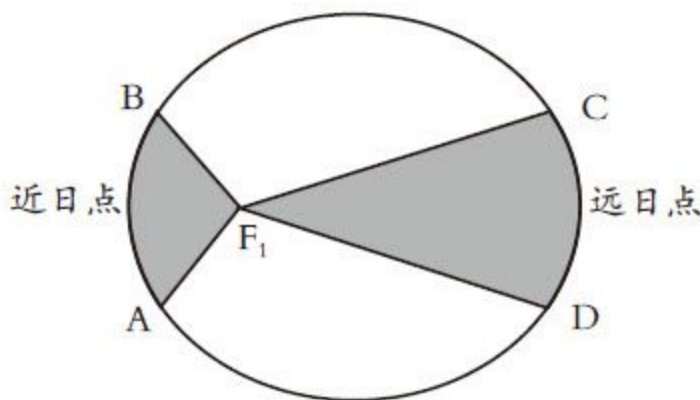
有很多人对自己的工作不满意：“同样是工作，有些人的工资就要比我高很多！”那当然，因为每个人的时间价值不一样，即时间的“含

金量”不一样，有些人的时间更值钱，所以他们工作时间很少，却能挣更多的钱。

那么，如何提高自己时间的“含金量”？无非是要增加劳动的技术含量。掌握的技能越多、越高端，越具有不可替代性，经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调控，才能获得更高的回报。

如何增加劳动的技术含量？无非是通过各种渠道多多学习罢了。这也要付出时间，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金钱。

前面曾经提到过地球椭圆轨道近日点和远日点附近的公转运行速度（参见《上帝偏好椭圆》），让我们再次展开浪漫主义的联想：如果一个人围绕着“精神”团团转的时候（即在远日点附近时）也能像追求物质一样“马力十足”，走得一样快，CD和AB一样长，那么就会出现如下情况：



假如CD和AB一样长，那么右边那个扇形的面积就会大一些——就像分切一块蛋糕一样，分到更大的一块蛋糕！

虽然听上去很“浪漫主义”，但它很容易找到“现实主义”的依据——我们都知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应该让孩子上学、上大学、上好的大学……无非是出于类似的原因：精神的投资是长线的，它虽然貌似占用甚至浪费时间，但在实际效果上提高了自己时间的“含金量”。

也会有人说：“我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条件上大学，怎么办？”

文凭固然重要，但学习并不仅限于校园。尤其是在当今这个“信息无处不在”的社会，精神的能量也无处不在，只看自己有没有学习的能

力。

比如，多看书一定会有帮助——对于一个没有形成看书习惯的人，可能会觉得看书是件离自己很遥远、很费劲又没有收益的事情，其实也不一定，或许是因为读书方法不对。

对于读书，我个人有这样几条经验：

第一，先找和自己有关的、感兴趣的书来读。打个比方，如果您是种树的农民，现在知道应该看书，于是就去找了一本如何制造航天飞机的书来看，那才是最遥远、很费劲又没有任何收益的事。您很可能看不懂，即便看懂了也不会有人找您去造航天飞机。种树的人，看关于如何种树的书，您会发现，看书没有那么费劲，反而很轻松、很实用。

第二，由浅入深（尤其对于没有形成读书习惯的人来说）。虽然经典读物更有营养，但也可能看起来比较费劲，反而会有碍读书兴趣的培养。从稍微浅显的书开始，会在阅读方面更有成就感。所以读书不怕浅，重要的是循序渐进。

第三，设定量化指标。读书不应是一种“虚化”的口号，比如，“我每天要读书！”所以装模作样地在睡觉之前拿起一本书，很快就催眠了，其实收效甚微。每天要设定具体的量化指标，比如说每天看一本，或每天看几十页，或每天看几万字（具体数目因人而异），这样就很具体，时间久了，逐步积累之下也会很有成就感。

当然，光读书还不够，还得提高素质、提高技能——比如，提高现有技能的层次，使自己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更有技术含量，时间“含金量”更高；再比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学几门技能就更好。

总之，在无事可做、挣不到钱的情况下，至少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和提高让时间的付出物有所值，换回其他的一些资本——其原因恰恰在于“时间是最通行的货币”。

时间的投资：恩格尔系数

关于“时间是最通行的货币”，还有一个概念可以参考——经济学领域中著名的“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 × 100%

简单地说，在收入水平较低时，“食物”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我认为，每个人的“时间投资经济账”也有一个类似的“系数”，吃饭、睡觉、休闲、娱乐这些活动是相对较低层次的消费（因为它们只消耗时间，不能因此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我把这些活动称为“一次性消费”。“一次性消费”的比例就大体相当于“恩格尔系数”。

每个在世的人，每天拥有的时间是23小时56分4秒，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非常公平——请注意：这是一个关于“社会公平”的起始点。

如果有人经常抱怨自己太穷，抱怨自己的劳动所获得的报酬不够丰厚，那么，或许他的“时间投资经济账”比例还不够合理——或许我们也能找到，在什么样的百分比之下，生活是更合理、更健康的（或许具体的数字因人而异，但大体“方向”上是确定的）。

略为总结一下：人为什么穷？因为“时间是最通行的货币”——如果觉得自己太穷，那或许应该检查自己的“时间投资经济账”——在吃饭、睡觉、休闲、娱乐方面的“一次性消费”太多了，而“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太少了，自己的“时间价值”还不够高。

因此，如果觉得自己穷，想想看，怎样把自己拥有的“时间”兑换成“金钱”吧！

上帝掷骰子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有时候好人真的得不到好报，这让我们作何感想？我们又该怎样直面残酷的现实？

电影《楚门的世界》，讲的是一个叫楚门的男孩，从刚出生起就是真人秀节目的主角，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关注着他的每一步成长——可是，只有他自己被蒙在鼓里、傻乐傻乐地活到30多岁。

由于节目制作需要，他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不过，长大后的他还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到了父亲的照片。于是有一天，他决心出发去寻找父亲。

可是，如果他真的离开，就会发现那一切“生活”统统是假的、只是摄影棚中的玩意儿——导演组当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所以，他们用各种方式吓唬他：卖飞机票的地方，醒目张贴着飞机被雷电击中的恐怖警示；出海的码头上，一艘小木船由于漏水而搁浅……于是，楚门犹豫了：世界如此险恶，让人如何胆敢独自闯荡天涯？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隐喻！

我们虽不是楚门，但的确不得不在闯荡世界时面对诸多挑战：坐飞机会不会不幸遇到空难？坐动车会不会发生列车相撞？坐大巴会不会遭遇劫持？即便待在家里，会不会遇到地震和火灾？吃东西，会不会发生食物中毒？无任何不良嗜好，会不会也身患绝症？

生活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来面对？

这个嘛，有时候真得认命。即便伟大如爱因斯坦，最后也不得不承认：有些事情，就连“上帝”他老人家也不确定，“上帝”像个赌徒一样掷骰子。

上帝是赌徒？

爱因斯坦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以用他的名言来表示：“上帝不掷骰子！”可惜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伟大的爱因斯坦错了，上帝真的掷骰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是一位科学巨匠，但他同时也笃信上帝，这两者并不矛盾：既然自然界具有如此高的科学性，那么一定有一位全

知全能的上帝安排了这一切——这是爱因斯坦、牛顿等许多科学家深信不疑的信仰。

而且，上帝所安排的一切事物都应该是“确定无误”的。因为上帝太伟大了，不可能有“他”不确定的事。

可是，这个问题在量子物理学研究中出现了某种危机。

想象你往镖板上掷镖。根据牛顿经典物理学理论（也就是旧的非量子理论），镖要么击中靶心，要么没击中。而如果你知道掷镖时它的速度、引力拉力和其他这类因素，你就能算出它会不会击中。

但是在原子尺度下情形就不同了。由单一原子构成的镖会有90%的击中靶心的概率，5%的机会击中板上的其他地方，还有5%的可能什么也没击中。你不能预先说可能发生哪种情形，你能说的只不过是，如果你多次重复此实验，可以预料，重复实验100次，平均有90次将击中靶心——因此，量子力学将一种不可预见性或者随机性的不可回避因素引入科学。

尽管爱因斯坦在发展这观念时起过重要作用，但他非常强烈地反对它（事实上，爱因斯坦正是由于对量子理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尽管如此，他从未接受宇宙是由“机缘”制约的观念。他的感情在这句名言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上帝不掷骰子！”

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量子物理世界的确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以精确的“概率”体现出来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上帝确实像是在“掷骰子”——我们也许不能准确预言每次实验的结果，但是我们能够多次重复实验，并且确认不同结果可能出现的概率……事实上，正是因为量子力学和实验符合得很完美，大多数科学家最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种“不确定性”原理。

概率是个好东西

“上帝掷骰子”说明了“概率”是个好东西。

同样的情况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经常见到。比如，心理学实验，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将实验结果和某一个单一变量相结合，它们“相关”的概率可能只有80%或90%，但这样的概率被视为“显著性相关”，那就意味着所观测的这个变量的的确确是在起作用的。

因此，学会用“概率”的方式来看待问题，应该算是人类科学进步以及心智成熟的一种反映。可是，我们似乎还未对这种“概率”观念引

起足够的重视。

比如，宇宙鼓励真善美，这是一个“确定”的大方向。总有那么些人，喜欢抬杠。你跟他说，这个“确定”的大方向是“向上”的，是趋向于“大格局”的，是鼓励“真善美”的，他就偏偏跟你举反例。

的确，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证明”一件事是不容易的，因为即便你举出10000个正确的例证，也不能完全证明这件事成立；而相反，你能够举出1个反例，就足以证明这件事不成立——的确，这是一种“科学”的观点（但是，“科学”并非唯一的、最高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在《左脑和右脑，缺个心眼儿的机器》中专门作探讨）。

恰恰出于这种所谓“科学”的精神，使得我们迷失在严谨的逻辑证明中，以至失却了常识和信仰。因为有的时候好人没有得到好报，所以我们不再相信有大道正义，这和爱因斯坦的“上帝不掷骰子”有着相同的逻辑，可惜它只是一种错觉，上帝真的掷骰子。

尽管从总体上看，人越接近真善美，强大的概率就越高，但是不能避免其中存在使真善美的人变得弱小甚至被毁灭的可能性——好人冷不丁地出门被车撞死，或遭到小人的暗算，或因患上不治之症而英年早逝……

在前文中曾提到过“黑天鹅”现象：从对称的角度讲，“一个高度不可能事件的发生”，与“一个高度可能事件的不发生”是一样的。好人得不到好报的概率的确存在，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视为“上帝在人类社会掷骰子”的结果。

“上帝在人类社会掷骰子”，其实有着很多方面的证据：最典型的是男女婴儿的出生比例，如果不是人为干预的话，基本上是1:1。全世界的交通事故，每年都以某种相似的比例发生着。另外，根据社会学统计数据，自杀率、谋杀率或者别的犯罪率也几乎是逐年不变的。就好像存在着某种“作用力”，强令一些人去违法，直到达到某个“限额”为止。这个“限额”比例，就是某种“概率”。

上帝像家长：冷酷背后的温情

按照概率，每一年都“必须”有人出车祸、“必须”有人自杀、“必须”有人被谋杀、“必须”有人患各种绝症……上帝真是冷酷得可以！

不过，上帝也很无奈呀，他就像个家长，不得不时常板起面孔。

尽管“上帝在人类社会掷骰子”的结果颇让人不满，就像爱因斯坦曾经不满于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一样，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掷骰子”，会发现它也有一定的好处。

也许，“上帝在人类社会掷骰子”是提供了某种“残酷的机制”：那些犯罪并受到惩处的人，会给其他人提供有力的“警醒”，于是人们引以为戒，尽量使自己的行为更规矩，以免受到类似的惩罚；那些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提醒人们小心驾驶；那些英年早逝的人，告诫人们要重视自己的健康状况……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著名的“鲶鱼效应”：这个“鲶鱼效应”的理论源自19世纪的挪威，当时所有贩卖沙丁鱼的商人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贩运途中沙丁鱼的死亡率，这直接决定了他们获得利润的多寡——后来一位精明的船长在放沙丁鱼的鱼槽内放入了一条鲶鱼，其他沙丁鱼见“异己分子”夹杂其间，便因紧张而加速游动，大多都能活着返港，商人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收益。这就是“鲶鱼效应”的作用。



“上帝在人类社会掷骰子”，仿佛就是某种“鲶鱼效应”。那些可怕的犯罪案件、交通事故、各种疾病导致的生老病死，表面看来与大道正义格格不入，但恰恰是它们作为那用来恫吓的“鲶鱼”，保证了整个人类社会在总体上走向良性。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基本判断：社会是鼓励真善美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尽管存在犯罪率、自杀率、交通事故、

突如其来的疾病和死亡，也不能因此否认这个大方向，它们只不过是“上帝在人类社会掷骰子”的结果而已，是相对的小概率事件。

家长的严厉和冷峻背后，总是一片温情。

我们这些做孩子的，要听话，乖乖的，Be good。

爱情、苹果和万有引力

为什么我爱一个人，但他/她不爱我？

爱情这非理性的情感背后，也有高度理性的公式，听上去像天方夜谭吗？

有一本书，非常畅销，叫《秘密》，讲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法则就是“吸引力法则”，书中写道：

“难以置信的是，过去知道这秘密的，竟然都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柏拉图、莎士比亚、牛顿、雨果、贝多芬、林肯、爱默生、爱迪生、爱因斯坦……过去拥有这秘密的领导者，为了保持自身的权力不与人分享，于是就让他人对这秘密保持无知的状态。人们去工作、做事，然后回家，他们没有权力，只能继续做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因为这秘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

“这个秘密就是‘吸引力法则’！

“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你吸引来的。它们是被你心中所保持的‘心像’吸引而来，它们就是你所想的。不论你心中想什么，你都会把它们吸引过来。”

书中讲到，这个“吸引力法则”，其实也就是“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这个和“苹果”有关的定理，再一次化作新的“苹果”（也就是《秘密》这本小书），砸到了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我。当我在一个温暖的午后坐在阳台上思考，忽然发现“万有引力”的确无处不在。不只在自然界，而且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

爱情，是一种万有引力

“爱情”，是一种“万有引力”。

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万有引力”的公式是： $F=G \times m_1 \times m_2 / r^2$ 。其中，G是一个常量，分子上的 m_1 和 m_2 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分母上的r表示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F就是引力的大小。说得简单一些：质量越大吸引力越大，距离越近吸引力越大。

“爱情”是怎样产生的呢？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会爱上一个人？很多情况下是因为对方“很好很强大”——也就是“质量”很大。这个质

量不仅仅指“体重”，而是指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包括了“物质”和“精神”在内。比如，有钱是一种强大，豪宅、跑车、名牌服饰、珠宝首饰、名贵字画……所有这些“物质财富”，都是某种“质量”的体现。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精神财富”，比如学识渊博、学富五车、才华横溢，或者诚实、守信、勇敢、智慧、仗义、孝顺……所有这些精神上的东西和优秀品质，也都是某种“能量/质量”的体现（很有意思的是，人的“物质”和“精神”可以相互转化，正如质能方程 $E=mc^2$ 意味着“能量”和“质量”是等价的，参见《没有金钱，用什么来替代？》）。



所以说，我们爱上一个人，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对方“很好很强大”，即“质量”很大。

不过，有的时候也存在一些其他情况。比如，我们常常嘲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但现实生活中的确出现“天鹅肉”真被“癞蛤蟆”吃到的情况——很多“校花”，最后竟嫁了非常普通的人，被人戏称为“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又是为什么呢？

或许，只有“癞蛤蟆”，而不是“白马王子”，愿意天天向“校花”或“公主”献殷勤，于是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根据“万有引力”，距离越小吸引力越大，所以，日久生情，“癞蛤蟆”最终就吃到了“天鹅肉”。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也会发生，比如医学界有一个“南丁格尔效应”：护士常常会爱上病人——这又是为什么呢？病人并非“很好很强大”，反而是“很惨很弱小”，护士怎么会爱上病人呢？

或许是因为护士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中，感觉到自己“很好很强大”——因为强大与否，是相互比较而言的，这是 m_1 和 m_2 在人类社会中的微妙互动关系——感觉到自己“很好很强大”，会让胸中充满爱意，这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俗称“母性”（这种“万有引力”，是因为自己的“质量”很大）。于是，护士就爱上了病人。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爱情似乎只和 m_1 、 m_2 和 r 这三个变量有关，再无其他原因。

A女和D男：质量和距离的悖论

在人的世界中，“质量”和“距离”之间有着某种悖论，随着质量的增大，距离也会相应缩小。

比如一个人很好很强大，就会使别人相形见绌，两个人的级别有了“高低落差”，就显得有“距离”。

这种质量和距离间的悖论，在美学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审美倾向：“优美之美”和“崇高之美”。

以“优美”为美的美学倾向源自古希腊，比如古希腊人在晚饭过后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学命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锻炼身体，并通过体育竞技向奥林匹斯山众神展示优美健壮的体魄，古希腊的雕塑也具有真实逼真的艺术美感，这都属于一种离生活很近的“优美之美”。

而“崇高之美”的典型代表则是哥特式教堂，那高高的穹窿给人造成的威严感，通过五彩玻璃折射出的光显示出的神秘气息，这都属于一种“崇高之美”，即“由距离产生的美”。

正因为如此，“A女”就被剩下了。不是因为她们不够好，是因为其他被剩下的男生和她们的差距太大。尤其是按照“B女嫁A男，C女嫁B男，D女嫁C男”的普遍组合模式，那些A女和D男的距离太远，所以一般情况下难以产生爱情的万有引力吧！

万有引力，无处不在

除了爱情之外，人类社会中非常多的现象，其实也都是“万有引力”的体现，它们被冠以不同的名字。比如“吸引力法则”“城市重力”“爱屋及乌”“边际效用递减”“亲情、友情、爱情的力量”“名人效应”“名可养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崇高”和“优美”“钱滚钱、利滚利”“趋炎附势、勾结权贵”“天高皇帝远”“远亲不如近邻”“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地缘政治”（一定还有更多，您有空可以接着想）……尽管名称各不相同，但其实出自同一源头，都是“万有引力”罢了。

同样的万有引力公式，在不同的“数据”下，产生了千差万别、大小不同的“引力”，而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表象背后，真正产生影响的“变量”只有三条：质量 m_1 、质量 m_2 、距离 r 。

万有引力真是无处不在，所以，它才被称为“万有”引力。

从万有引力看社会公平

万有引力在人类社会中同样无处不在，这似乎很好地解释了一个重要的、让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什么是社会公平？

我们来参照自然界在万有引力作用下的情况：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有些行星是没有卫星的（水星和金星）；有些行星卫星较少（地球1个，火星2个），还有些行星则卫星较多（木星和土星都是60个左右，天王星27个，海王星13个，由于不时会发现新卫星，所以相关的数据一直在变动）。

大家知道，行星有大有小，其中直径越大（质量一般来说也相应较大）的行星，所拥有的卫星数目也就越多，比如卫星较多的这四颗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按照其自身的直径大小依次排列，分别属于太阳系的第一、二、三、四大行星。所以说，周围行星的数目，是和自身的大小和质量相关的，根据万有引力，自身的质量越大，当然就越具有吸引力（虽然有一些小小的偏差，但总体“成正比”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对比这个“天上的情况”，它说明什么才是社会公平：并不是每个人拥有的资源一样多，而是“质量越大吸引力越大”。我们都不会否认，每个人在勤奋程度、智力高低、先天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而且在“格局大小”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必然有些人掌握着更多的资源，有些人则相对占有较少的资源，这是符合天道的。

换句话说，很难想象在一种终极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住一样大的房子、享受完全一样的待遇。如果这样，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正如大跃进时的大锅饭，最终只能带来生产的萎缩和社会的倒退。

“万有引力”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公平”绝不意味着“平均”（相关问题，将在后面的《公平是不是乌托邦？》中继续探讨）。

马斯洛的伟大和遗憾

有人说，这个时代的学术再无创新的可能，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要我们用心去探究。

坐在湖中的小船上，戴着遮阳帽，手拿钓鱼竿，四周风光旖旎、水波荡漾。

多么惬意的生活呀，令人心驰神往！

于是，一天过去了，幸福无比；两天过去了，依然幸福；三天、四天、五天……时间一长，还会幸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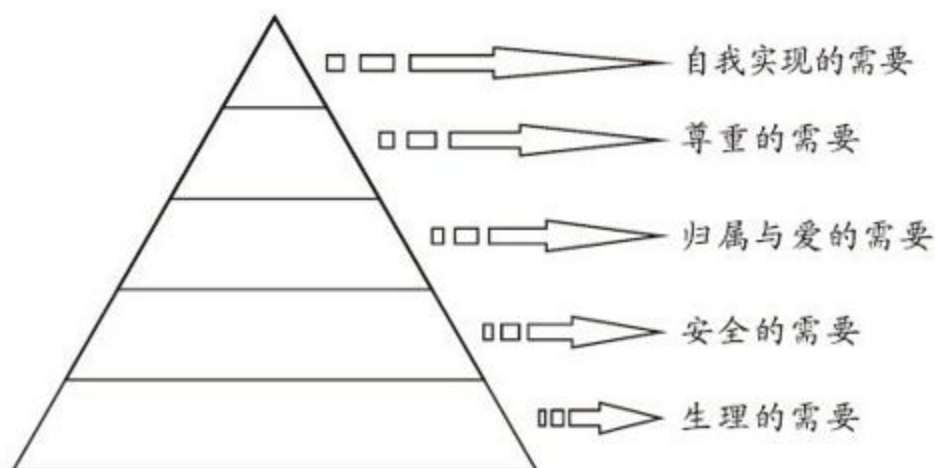
人们总幻想着进入一种终极的幸福状态，可惜这并不真实。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马斯洛早已打破了人们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斯洛需求层次论

马斯洛说，人的需求并不是单一的。马斯洛说，人的需求不论如何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也只有五种最基本的需要，它们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是这样来解释他的需求层次论的：

生理的需要。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就是对生存的需要。人们需要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



安全的需要。它的直接含义是避免危险和生活有保障，引申的含义包括职业的稳定、一定的积蓄、社会的安定和国际的和平等。

归属与爱的需要。马斯洛特别强调要将爱与性区别开来。他指出，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

尊重的需要。自尊包括对获得信心、能力、本领、成就、独立和自由等的愿望。来自他人的尊重包括威望、承认、接受、关心、地位、名誉和赏识。

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模样，实现人的全部潜能的欲望。换句话说，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无法宁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马斯洛充分论述了这五种需要之间的递进关系：“低层级需要”对于“高层级需要”的“基础作用”，他认为，只有“低层级需要”满足之后，才会产生“高层级需要”。

马斯洛密码

马斯洛的理论无疑十分伟大，它早已被广为接受。不过，我觉得他的理论中还潜藏着一些信息未被充分发掘，以至于有个小小的遗憾，我把它称为“马斯洛密码”。

“马斯洛密码”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时间是满足各种需要的前提——这并不是说马斯洛一定没有注意到，因为这个基础太寻常了，似乎没有说它的必要，不过，这恰恰也是发现“马斯洛密码”的必要环节。

尽管看上去每个活着的人都拥有时间，而且似乎很平等，但时间依然是每个人都需要。而且从生命的意义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一种需要，因为，死亡就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拥有活着的时间。

至于其他五种需要的满足，都要付出时间来交换，所以我们可以把“时间”视为“最通行的货币”，用它来换取这五种需要的满足（关于“时间是最通行的货币”这一理念，在前面的《人为什么穷？》一文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在“时间是满足各种需要的前提”这个基础上，潜藏着的“马斯洛密码”就可以表述为：各种需要之间存在相斥性。

让我们考察一下马斯洛所说的五种需要之间微妙的关系：比如位于第三层的“归属与爱的需要”和第四层的“尊重的需要”之间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请您先想一想！）

乍一看起来，它们很相像，都属于某种“美好的感受”，但它们之间却有微妙的相斥性——它们虽然都指向美好感受，但在“方向”上却并不相同。

爱与归属，意味着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并且由于相互亲近而自然地结成同盟——这可以被视为“同一平台上的横向关系”；

尊重，却存在着明显的高低落差，被尊重者的地位略高一些——这像是“存在高低落差的纵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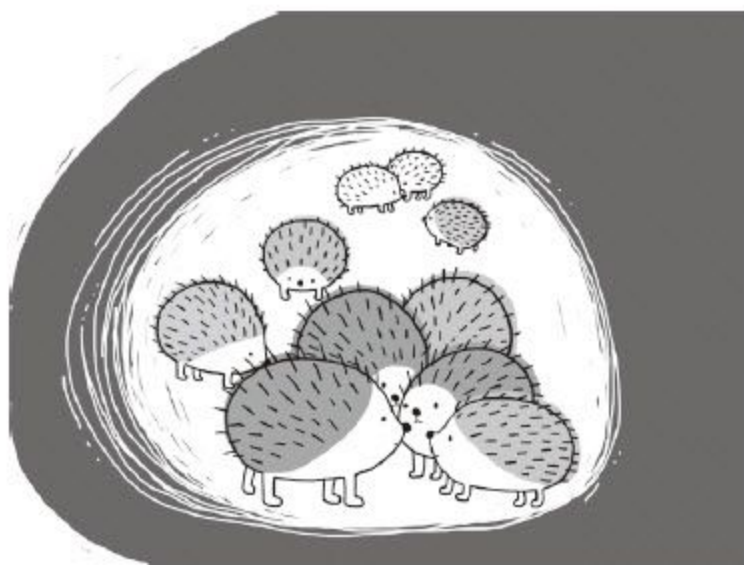
于是，这两种“美好的感受”相比之下就很微妙了：“尊重”增长的同时，常常带来了“归属与爱”的部分削弱，反之亦然。

有很多耳熟能详的词，比如“卓尔不群”“鹤立鸡群”都表达了这种关系。

日常生活中，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在家庭成员中所获得的尊重没有他在外界那么高——俗称为“距离产生美”。

中国古代的皇帝常常把自己称为“孤家寡人”，表达出一种由于位置高到顶点而“高处不胜寒的孤寂”。

叔本华曾经把人比做豪猪，在寒冬腊月，一堆豪猪只能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否则它们就会冻死。但是，由于它们身上有刺，所以又不能靠得太近，否则就会相互被刺扎到。



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这种悖论。

这种微妙关系还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酒桌文化”：一群人聚到一起，身份地位各不相同、有高有低，怎么办呢？拿酒来！喝“好”了之后，大家都一样：满嘴跑舌头、又哭又笑、钻桌子底下……在生理和感性的层面上，人和人的差异实在不太大，于是社会地位差异被刻意削平了。只有家里人才见过的丑态，大家也都见到了，自然也就“亲近”了。这是“酒桌文化”的内在原理之一，它和价值地位削平之后的“归属感”有关。

“酒桌文化”的内在原理之二，也是和“尊重”有关：“尊重”，一定意味着存在某种“高低落差”——对方足够“高”，或者，自己足够“低”，都能引起“尊重感”：频频端起酒杯、主动一饮而尽，这是以近乎自残的方式来表示“我的地位很低，而您的地位足够高，值得我为您两肋插刀”。

这个社会真是奇妙，“归属与爱”和“尊重”这两种不同方向上的需要，居然在酒桌文化上得到了高度浓缩的体现。前文说过，人的行为或许受到类似于“万有引力”的影响，无非是 m_1 、 m_2 、 r 这三个变量在起作用。总之，“地位高”和“距离近”像是一种悖论，常常不在同一个方向上。所以，“归属与爱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并不是那么容易两全的——所以“相敬如宾”才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其他的各种需要似乎也是如此，由于人的时间精力有限，满足了这种需要，就难以满足其他的需要。

前文说过，各种美好的东西，就像是五颜六色共同拼合成的白光，它们统统加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但更多情况下被看到的只是局部——不同的需要，也像不同的色彩，它们的关系，既是互斥的、又是互补的；既是分散的，又是能够融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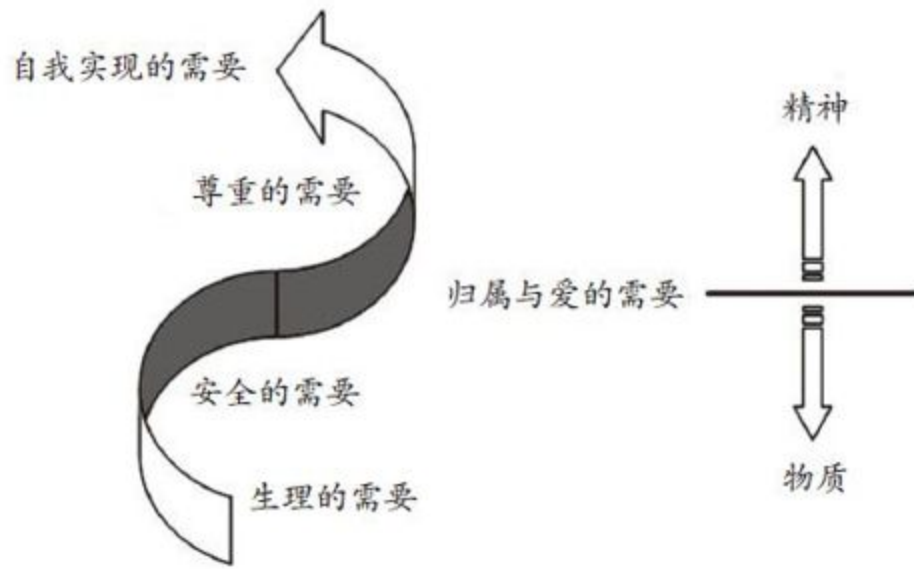
可惜的是，马斯洛并未专门论及各种需要之间的相斥性——缺失了“马斯洛密码”，使他的伟大理论离真正意义上的完整性仅差一步之遥。

人的需求，是色彩的螺旋线

马斯洛在晚年继续推进他的研究时，在五种需要金字塔的顶端，又添加上了一种“超越性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进一步强调超越性自我实现者受超越性需要，也就是受超人类的价值、存在性价值或宇宙价值的激励；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准处于超自我、超个人的水准，因而在管理上就是非个人的，包括自愿放权等。

这样的补充当然也很好，可是，我认为他最后的研究走错了方向，只是沿着原来的垂直方向继续前进。因而，这只是个纵向的维度，不够立体。

如果考虑到各种需要之间的“相斥性”，那么各种需要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在水平面上被串成某种“圆圈”，而在更立体的角度上看，它是螺旋上升的结构。



巧合的是，这条螺旋线，和色彩或许有另一种关联：大家都知道，不同色彩的光波长不同，红色光的光波长，紫色光的光波短，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首尾相接或许并不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更像是某种螺旋形。因而马斯洛所说的五种需要和光谱之间可以形成一种诗意的螺旋形对应关系。

在这螺旋式上升的模式中，人的各种需要通常都只能一个一个依次地满足，因而它们是时时变化着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每个人的需要都时时变化着，那就会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参见下一篇文章《人“吃”人的社会》）。

人“吃”人的社会

社会如果不是人“吃”人，恐怕早就难以为继了。这难道有问题吗？

我的妈妈从教师岗位退休之后住到了农村，她神秘地对我说：“住在这里，我一年到头都不需要倒垃圾！”

为什么呢？

想吃蔬菜就去自家田里摘，因为种得多又吃不了，常常只吃菜心，把菜叶又扔回田里。

想吃鱼，就去自己的养鱼塘里抓，每家每户养的品种可能略有不同，所以亲戚邻里之间有时候相互打个招呼，就去别人塘里抓几条鱼换换口味。

厨余垃圾倒进专门的桶里，当作肥料浇回到地里。

纸屑、开心果壳、冰棍棒之类的，扔在另一个垃圾桶，当作柴火烧，烧完的灰烬也都是好肥料……

某天，我要从苏州乡下回北京，妈妈包了我最爱吃的鲜肉汤团，然后掏出一个保存很好的塑料袋（好像是个速冻食品的包装袋），把生汤团一个一个地装进去……于是，城市超市里的塑料袋又被我带回城市。

总之，农村的生活是一个多么优秀的“能量循环”链条，那么，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否也能形成如此和谐的“能量循环”呢？

当园丁遇上富翁

伊朗儿童电影《小鞋子》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很受启发：

阿里是一个伊朗的小男孩，他们家生活非常贫穷，家里还有妹妹和弟弟，妈妈的身体也不好，爸爸在清真寺负责倒茶的工作，收入微薄。家里连买一双新鞋的钱都没有，阿里和妹妹只能共穿一双鞋。

有一次，一位朋友劝阿里的爸爸到城里做些园丁之类的临时工作，于是父子俩就骑自行车进城了。

对这父子俩来说，找工作的过程非常不容易，按了很多家门铃才终于在一幢别墅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于是喷药、松土、施肥，忙了整

整个一个下午。

阿里的爸爸干完了活，别墅主人掏出了一大叠钱要递给他，阿里的爸爸非常质朴地连声说：“您太客气了，不用这么多钱！”而别墅的主人，一位慈祥的老先生善解人意地说：“没事，你做得很好！”阿里的爸爸这才略有点不好意思地收下了钱，腼腆地笑了。

从这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人类社会运转的一个局部：位于经济金字塔顶端的富翁，和位于经济金字塔底端的穷人（在这里，姑且以“经济”来作为金字塔的划分依据）如何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富翁花钱请园丁给他打理花草树木，富翁节省了体力、获得了休闲时间，园丁付出了劳动、获得了工钱——大家各取所需，而且双方都很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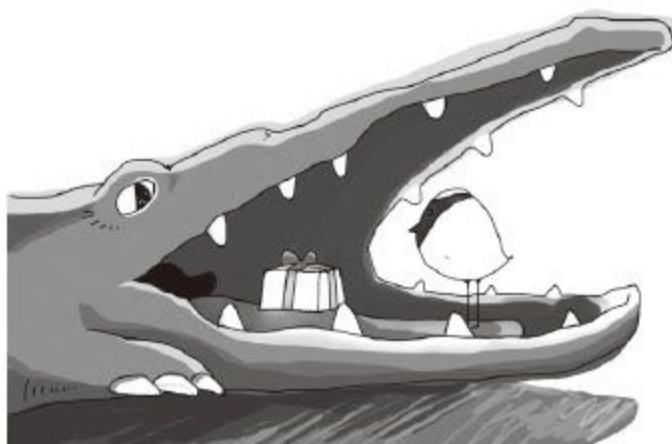
当鲁迅遇到达尔文

或许，唯有鲁迅先生的敏锐，才能那么早就看到了黑暗社会中“人吃人”的本质。在鲁迅先生那个时代，“人吃人”完全是一种负面的、黑暗的说法。今天，我们说“人吃人”，又是一种不同的视角和心态。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说，人就是互相“吃”的。换个温馨的说法，就是“互相帮助”。

不知道鲁迅是不是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得到了某种启发，不过“人吃人”的说法让人不禁联想起达尔文著名的食物链金字塔，微生物、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人类，由低到高排列着，形成“生物食物链”。事实上，即便在人类社会内部，也存在着类似的“经济能量食物链”。

达尔文的“生物食物链”最优秀的理念是：尽管人类高居金字塔的顶端，但是人死了之后被最低等、最渺小的微生物吃，从而保证了“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于是大家放心了，地球上的生物千万年来生生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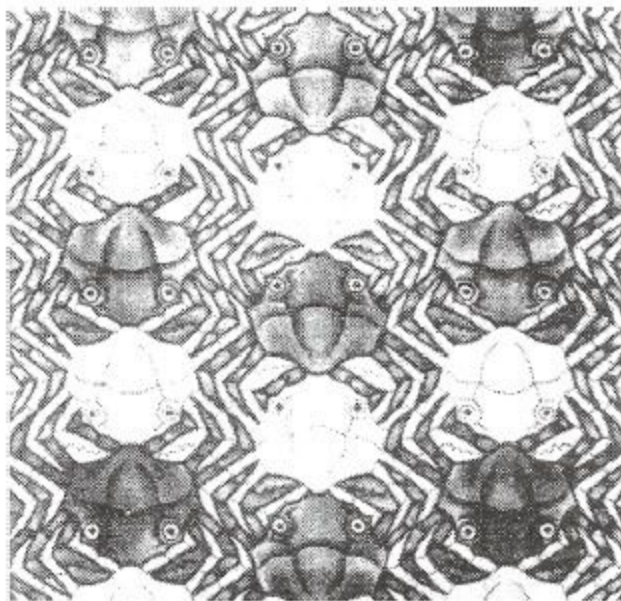
这种“能量从高到低流动”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非洲有一种鳄鱼，每次吃完食物之后，就会把嘴张开。这时，就会有一只燕千鸟飞进它的嘴里，替它细细地清理牙齿，把齿缝间的食物残渣啄食干净。鳄鱼获得舒适，燕千鸟也填饱了肚子。假如鳄鱼不留神把嘴合上了，鸟儿就用它坚硬的翅膀戳一下，鳄鱼感觉到了就会张开嘴，这样的合作非常愉快。



能量（无论是食物能量还是经济能量），除了我们熟知的“从低到高逐层聚集”之外，还存在“从高到低流动”，于是食物链才被串成了“圈圈”——关于这种被串成“圈圈”的理念，其实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例证，比如“石头、剪刀、布”“虫子、棒子、老虎、鸡”等游戏，之所以广为流传，或许和它们的“公平”及“合理”相关，这些游戏设计都生动地暗示了“一物降一物”。

螃蟹、回文诗、贝壳们

这个世界充满了各种“互补”的乐趣。著名作曲家巴赫有一段名叫《螃蟹卡农》的曲子，具有正、倒演奏起来一样的回文结构。埃舍尔为《螃蟹卡农》作了一幅画，两组螃蟹反向镶嵌，天衣无缝。



同样与螃蟹有关的还有一个巧合。我们知道，在DNA中四个碱基两两配对：A（腺嘌呤）和T（胸腺嘧啶）是一对，G（鸟嘌呤）和C（胞嘧啶）是一对。也就是说，双螺旋中的一条上某个位置是A，那么另一条上和它互补的一定是T，如果某个位置是G，那么另一条上和它互补的一定是C。很有意思的是，在螃蟹的基因中确实能看到这样一段：

.....TTTTTTTTTCGAAAAAAAAA.....

.....AAAAAAAAAGCTTTTTTTTT.....

您有没有发现这段基因的特点？

其中双螺旋的一股正好是另一股的回文反演！

这种情况，很像人类文化中的“回文诗”结构，比如下面这首诗第一行从左向后念，和第二行从右向左念，是完全一样的，但它们每一句都有自身的意义：

秋江楚燕宿沙洲，燕宿沙洲浅水流。

流水浅洲沙宿燕，洲沙宿燕楚江秋。

这是一种由互补而产生的“左右对称”，也称“镜像对称”，其相应的操作是空间反射，即镜面反射，它充满了美感（在《“上”清“下”浊》一文中曾经提到过“镜像对称”的另外一些案例）——宇宙中这种无处不在的“互补”恰恰是能够保持和谐背后的逻辑！

埃舍尔有一系列绘画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和谐互补”的理念：



这张图中，贝壳、海星、海螺彼此镶嵌，天衣无缝——上帝真是个好裁缝。

当单螺旋寻找配对

前文说到，人的各种需求是在螺旋式上升中依次满足的，这让人进一步联想起DNA双螺旋结构。

每个人就像一条单螺旋，上面有着一些各不相同的碱基——就像不同时间点上的不同需求。

然后，这些不同的需求，就像不同的碱基一样，需要找到它的另一半。比如《小鞋子》中想通过园丁工作来挣钱的爸爸，他找到了那个正好需要园丁的富翁，于是合作与交换便产生了。

世界的运转就是如此：一些人通过“被帮助”而感受到幸福，另一些人则通过“帮助别人”而体验到快乐；在一些人眼里不那么重要的东西，对于别人来说却十分有价值；“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心物二元”的食物链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循环，可以被串成“圈圈”，可以更和谐（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

人不是野蛮的动物，因为人既有物质又有精神，不然就真的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一旦被吃掉就彻底完蛋了——“人吃人”也可以是快乐的，因为人和人之间不是吃肉体、消灭生命，而是“吃”肉体外的其他东西（比如金钱等等），有些东西今天被吃掉了，明天会以其他形式再吃回来。“人吃人”并不像“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那样血腥，因为“吃与被吃”同时发生，这就是“心物二元”的好处。

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因为缺失了“马斯洛密码”（即各种需求之间的相斥性），所以它描述的是每个人的需求情况，就像一条条单螺旋的存在——但单螺旋的碱基必然要求它去寻找配对，所以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就蕴含其中了。这是马斯洛理论在更宏观层面中能够得出的逻辑推演。

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它能给人更多信心，因为社会中的各种交换，完全可以建立在“非掠夺”的原则上——由于人类是心物二元的，是互补的，所以带来了和谐秩序。如果大家足够有诚意、用心去寻找，实现“双赢”并不难！

假如道德滑坡，谁应该先变得善良？

当人们慨叹“世风日下”时，一不小心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甚至觉得自己是被逼无奈。事实果真如此吗？

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设想了这样一个情景：

文明萌发前有五个人，他们商定合作狩猎一头鹿，条件是猎到后每人各分得五分之一。

然而，当一只野兔出现在其中一个人的捕杀范围时，这个人就抓住了它——然而，他这样一搞，那头鹿就逃掉了。

于是乎，这个只注重眼前利益的“小格局”的人得了实惠，可以用这只野兔给自己炖上一餐，不用吃苦冒险对付那头鹿了，然而他的伙伴们却一无所得。

卢梭设想的这个情景，翻译得直白一点，就是“当大家都是好人的时候，当个坏人或许是有利可图的”。“坏人”在不知不觉中，或许能占点小便宜。

现在，我们要反过来问：“如果大家都变得很坏，我自己还傻乎乎地当个好人，岂不是很吃亏？”——相信这是很多人思考过的问题。

如此，还会有人愿意当个好人吗？或者说，假如道德滑坡，谁应该先变得善良？

谁应该先变得善良？

假如道德滑坡，谁应该先变得善良？

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梳理为以下四点：

第一，善良的实质是大格局。

本书之所以试图用“大格局”来替代人们经常使用的“善良”一词，因为“善良”带有主观褒义色彩，而“大格局”则是相对客观的描述，它具有更强的普适性，也更容易用来判断一个人的品德及行为方式。

第二，善良不等于冒傻气。

既要善良，又要足够聪明，这才是大格局真正的意义所在。

善良也好，邪恶也好，无非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如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使用很多不同的手段，其中有些是邪恶的，有些是善良

的，只可惜因为我们有时候不够聪明，所以看不到还存在“既能达到目的又不邪恶”的“聪明”方式。

聪明是天生的吗？大家小时候都读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如果现在这种情况再次发生，谁都知道应该怎么做。是否每个人在“先天智商”方面都和司马光一样“聪明”？恐怕不是，这只是通过“后天习得”的。不过，从“行为结果”上来看，我们可以和司马光一样“聪明”。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早已分不清哪些聪明来自先天，哪些来自后天，但其结果似乎更重要。《阿甘正传》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妈妈说，只有做傻事的人才傻（Stupid is stupid does）！”

做个聪明的人，看到更多的选择路径，这是大格局的一方面（详情参见后面的《困境？困境？困境？》一文）；看到的路径中，能否走得通，这是选择权的多少，是大格局的另一方面（参见前面的《盖世武功，从三只小麻雀练起》一文）——总之，如果格局足够大，既善良又聪明，就并不需要通过坑蒙拐骗的方式来达到目的。

第三，物以稀为贵。

很多人把历史比作巨大的钟摆，总是从一头摆向另一头，这不无道理。

如果将来某一天，身边的每个人都已经是大局的人了，一个人再怎么帮助别人，也不显得他是个好人，大家只会觉得：人本来就应该这样的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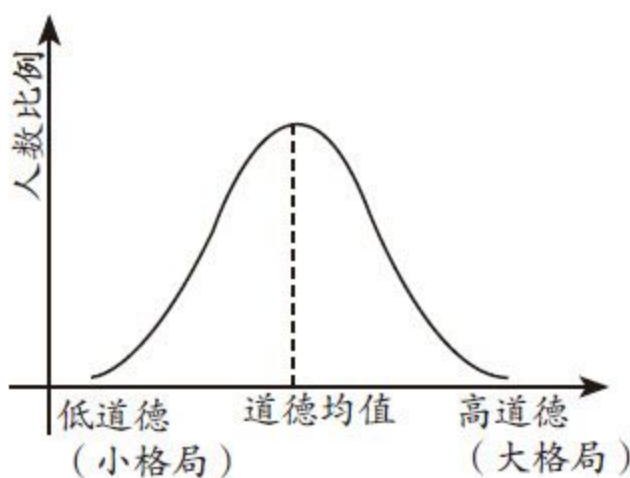
如果身边的人都是坏人，才显得大局的人尤其难能可贵，于是各种资源会更倾向于向大局的人靠拢。比如，大家都不靠谱，人们就愿意和更靠谱的人做生意，这在商界被称为“诚信”，它是商界竞争和进化的结果。这也体现了“大局”所具有的“联结”倾向。

所以，越是在大家都认为“世风日下、道德滑坡”的时候，先变得善良的人才更容易掌握“先机”，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力量和更快的增长，越能够掌握“主动权”。

第四，社会整体上的道德走向。

无论社会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道德状况也是如此，总有相对高道德（大局）和相对低道德

(小格局)的人，整体上呈现为一个扣钟形的“正态分布”(详情参见《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一文)。



这张图中，左边的“低道德”意味着相对的“小格局”，而右边的“高道德”意味着相对的“大格局”。

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原来的格局可能并不大，但他通过有意识地拓展格局，从相对小格局变成相对大格局。相比较之下，原先一些大格局的人反而显得格局不那么大了。但无论如何变化，一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在总体分布上总是类似的一个扣钟形，总有人相对高道德，有人相对低道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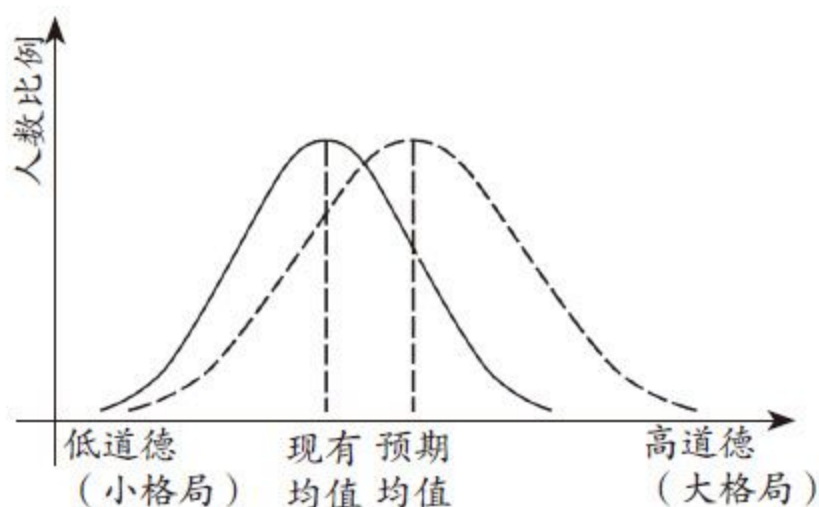
不过，从“发展趋势”而言，人类总是整体上在向着“大格局”演变。这并不难印证：古代饥荒中，人们甚至“易子而食”，这种情况在当年很普遍，就像是某种“平均值”，但放到今天无疑是低道德的——其中的原因，和物质生活水平密切相关。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廩实而知礼节。”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人类的需求是以物质为基础的。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会产生出更高层级的精神需要（也就是高道德所带来的内心愉悦等）。

所以，整个人类一直在普遍地向“大格局”发展着。平心而论，小悦悦事件中体现出的道德冷漠，放到古代饥荒年代也许算不上什么道德问题，我们在很多历史书或中世纪文学中读到过类似景象，在饥荒和疫病盛行的年代，父母甚至连亲生子女都无暇顾及。但今天它之所

以成为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恰恰是因为时代已经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

前面说过，“大格局”和“高道德”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所以，按照正常的逻辑，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人类的道德水准也有可能“整体性地”向着大格局（高道德）的方向迈进一步，也就是像一个正态分布的扣钟形（实线），其平均值整体向右挪移（虚线）：



这个结论虽然听上去很理想主义，甚至与我们的直觉相左（比如“道德滑坡”的判断），但其实它才是合乎逻辑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总觉得道德在滑坡呢？

道德在滑坡吗？

道德在滑坡吗？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社会道德总体上是在爬坡的，但目前依然滞后于时代要求。很多人的格局还不够大，至少与时代要求不相称。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用现实生活中更为熟悉的现象打个比方，就是人们常常问的一句话：“我们的工资上涨速度能跑赢CPI吗？”

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生活的成本有关，它相当于“环境的客观要求”。CPI不断上涨，就如时代要求我们的格局不断扩大来与之相适应。

工资，是我们自身的购买力，它相当于我们所具备的实际条件。从社会总体上来看，工资的确普遍上涨了，大家的格局也如此，总体

上来说都在扩展。

只不过，究竟哪个上涨的幅度更大？目前看来，格局的扩大依然滞后于时代要求。当我们说“道德滑坡”时，我们是在强调“格局相对滞后”；当我们在说“道德依然在爬坡”时，我们则是在强调“格局一直在扩大”的客观事实。

明确这种对比关系，我们的目标也就明确了：在更大程度上扩大更多人的格局。在这个目标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推动力。那么，这个“推动力”又来自哪里呢？我认为，恰恰是“大格局”所能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参见《道德的理由：直觉？功利？》）。

基于上述原因，人类的大趋势是明确的：格局总是要不断扩展的，这样不仅利人而且利己。即便身边的人格局不够大、道德水准低，也总会有一些人，愿意主动选择当个善良的、聪明的、大格局的人。

左脑和右脑，缺个心眼儿的机器

离开了高科技产品，当代人就寸步难行。

高科技产品会最终取代人脑吗？如果它们一直那么缺个心眼儿，就不会。

曾经有过一部科幻片《机器人五号》，片中在一大批用流水线生产出的机器人里，有个“机器人五号”，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似乎具有人的情感和高级智能。

研发人员一开始无法相信，于是做了一个测试：把麦片糊糊倒在一张纸上，形成了不规则的图案，然后把纸对折后重新展开，问机器人五号：“这是什么？”

“他”立刻回答：“麦片、糖、水……”唉，这不还是个机器吗？！

忽然，机器人五号扬了扬眉毛——那眉毛是两片薄薄的金属板，动起来实在是憨态可掬——“他”若有所思，然后高兴地说：“蝴蝶！”（因为那麦片渍的形状在对折之后确实像蝴蝶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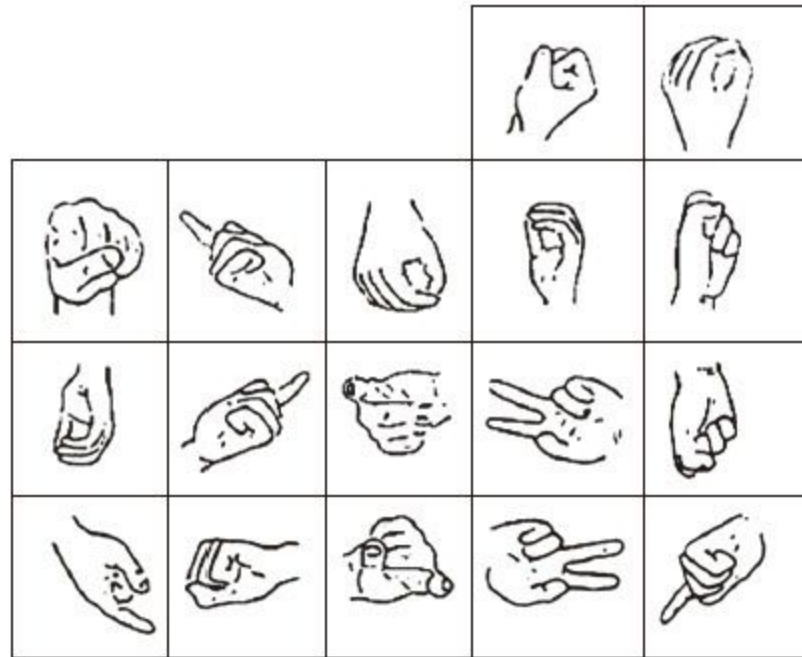
研发人员终于相信了，机器人五号确实具有人的高级智能！

可惜，这只是一部科幻片。

机器，缺了个心眼儿

一个有趣的测试：下面这些有关手的线条图，看看它们是左手还是右手？

其实，正常智力的人基本都能看出它们是左手还是右手。然而，即便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超大规模计算机，也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虽然从理论上说，计算机可以通过“学习”和“记忆”的方式来进行识别，不过，假如样本无穷多，它依然无法自主地进行判断。



如果回想一下我们在判断这些左右手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除了心像和直觉之外就再无其他了，这属于右半脑的思维方法。所以，计算机和人脑的最主要区别，在于计算机属于典型的“左脑思维”模式。

那么，左脑和右脑各自的分工是什么？

一般来说，左脑负责语言、数理、分析、逻辑、理性等领域，也就是说，左脑善于逻辑性思考，可以认知数字或符号、阅读、书写以及计算。

与之相反，右脑负责非语言、时间空间、直观、感性等领域，更适合综合掌握视觉信息，尤其是感性能力强，音乐、美术等艺术领域也都与右脑有关。

由于分工不同，左右半脑又各有缺憾。尽管右脑具有其独立的、非话语的思维序列，是我们的人格和能力极为重要的部分，但右脑没有能力来表达它自己（因为唯有左脑半球是能够用话语表达它的思维的），所以右脑经常被忽视和被误解。

至于左脑，它依据的是严谨的语言、逻辑，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解决问题，它并不具备综合性的感受能力，无法把很多信息平行地纳入考虑范围（比如在一群人之中识别出一个人的面孔，或是做拼图游戏等，统统都会难倒左脑）。而且，左脑的思考有逻辑，井然有

序，但作决定需要时间，所以情况比较紧急时就由右脑靠“直觉”在瞬间作出决定。

虽然左右脑各自分工不同，不过对于正常人来说，左脑和右脑还是作为一个整体机能单位发挥着作用——因为通过“脑梁”，左脑和右脑可以实现信息交换。

回到上面那个图形判断的任务：众所周知，计算机是依照逻辑系统（即“左脑思维”）来设计的。因此它并不能传递作为“人”的完整信息，它离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尚有距离（我个人认为，除非有一天能够把右脑功能也添加到计算机程序中，否则机器永远只是机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仅凭严谨的语言和逻辑，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架“缺个心眼儿的机器”。

如果缺了右脑思维

人具有机器所不具备的“直觉”（即“右脑思维”）——“直觉”的好处是，它的形成非常迅捷，也无须用言语加以说明——那么，缺失了“直觉”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一个著名问题是古希腊学者发现的“秃头悖论”：在日常生活中，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秃头是很容易的，我们仅凭直觉、只看一眼就能判断出来，我们假定这个“秃与不秃”的界限大约是5000根头发。可是用数理方法如何来严谨地证明它呢？即如何证明头上长有5000根头发的人不是秃子？首先，一根头发都没有，显然是秃子；只有一根头发，和一根头发都没有的差别并不大，也可以算是秃子；有两根头发，和只有一根头发，差别也不大，也是秃子……如此可以一直证明到4999根头发也是秃子。接下来，5000根头发和4999根头发的差别依然不大，也还是秃子！

运用纯逻辑推演的方法，既不能证明有5000根头发是秃子，也不能证明有5000根头发不是秃子（说得更极端一点，按照这种推演，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不是秃子，这显然是不符合常识或直觉的）。

关于“缺失直觉”的后果，除了“秃头悖论”之外，还有一个著名的定理，即“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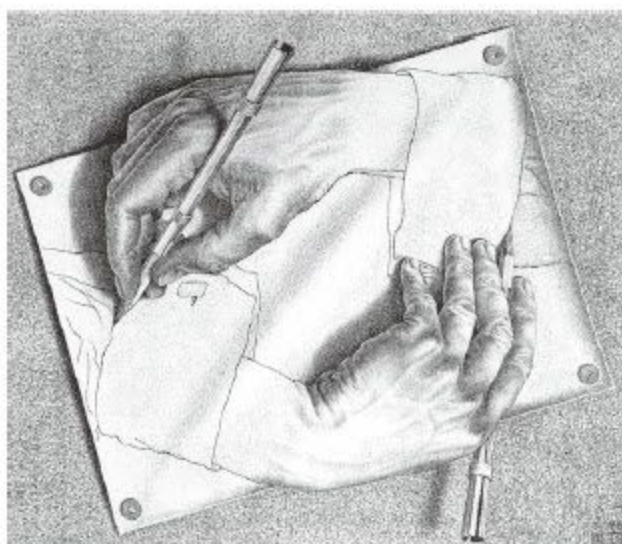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冯·诺依曼发明世界上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之前，数学学界的研究者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理想——让逻辑

本身形成一个完备体系，即各条定理之间都能相互印证、相互支撑。

众所周知，逻辑对于计算机的内部运算是至关重要的。冯·诺依曼本是数学出身，那时候又致力于计算机的发明。因此冯·诺依曼也曾花费大量时间试图建构起这种关于逻辑的完备体系，直到他看到一个名叫哥德尔的年轻人的一篇论文。哥德尔以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任何无矛盾的公理体系，只要包含初等算术的陈述，则必定存在一个不可判定命题，用这组公理不能判定其真假。也就是说，“无矛盾”和“完备”是不能同时满足的！这便是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

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试图通过“消除直觉”来确保“数学的确实性”，而哥德尔证明“数学”没有“直觉”就不能继续——这真是个令人尴尬的结论，但恐怕这就是世界应有的秩序！

下面这张图，是埃舍尔被广泛引用的作品《手画手》，它充满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左手和右手，左脑和右脑，分不清楚哪个更重要，但它们不得不紧密地相互依靠。

多多利用直觉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右半脑的直觉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科学方面的重要进展都要归功于右半脑的直觉飞跃。

历史上最著名的直觉飞跃之一，就是随着阿基米德的名字而诞生的那个原理的发现。阿基米德在洗澡时看见澡盆中的水溢出，于是想到了如何测量金王冠的含金量。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描述自己：“在我的思维机制中，作为书面语言或口头语言的那些语词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好像足以作为思维元素的心理存在，乃是一些符号和具有或多或少明晰程度的表象。而这些表象则是能够予以‘自由地’再生和组合的。”可见爱因斯坦也具有非常发达的直觉思维。

此外还有弗里德利奇·冯·凯库勒关于苯和其他有机分子实际上是闭锁的链或环的著名发现，就是他在梦中看到一条蛇正在咬着自己的尾巴的结果。该发现曾经被称作是“预示整个有机化学领域创立的最为辉煌的一页”。

总之，直觉是一种好东西——即便我们不经过复杂的理性思考，如果一件事我们感到某种“纯粹的快乐”，那就意味着这通常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像前面《当个坏人更占便宜吗？》中那只小熊一样，因为一个哨子感到心怦怦直跳，那或许意味着这件事多少有点问题。

有的时候，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我们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遵从直觉，以免自己陷入过于理性的疲惫之中。人人都有一颗“心”，如果“它”足够细腻和精准，就能引领我们在“瞬间”抵达向往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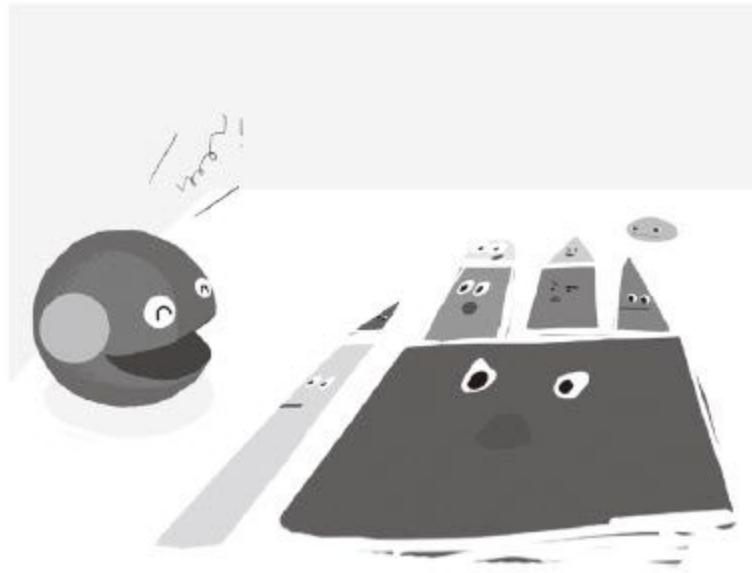
多一个维度看世界是什么样子

“价值削平”是个贬义词，那么它的反面是什么？

怎样才能更圆融饱满地捕捉到周围的世界？

有一本小说，描述了“二维平面王国”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二维平面王国，里面的居民都是些二维平面图形，比如圆圈、三角、方框……



有一天，来了一个球。球是三维立体的。二维平面王国的居民们觉得它很神奇，因为当球穿过二维平面王国时，它的“圆圈”会变大、缩小。

大家说：“哇，你好神奇！”球却说：“这没有什么呀，因为我们是三维立体的。”“哦？什么是三维立体？”大家怎么也不明白，因为谁都没有见过。

终于有一天，球说服了其中一个居民，比如方框，和它一起去看三维世界的样子，它们俩离开了二维平面王国。“哇！真的有第三维！”方框为它的新发现兴奋不已！然后，它们俩又回到二维平面王国。方框对其他居民说：“你们知道吗？这个世界是有第三维的！”“你在说什么呀？这怎么可能呢？！”其他居民仍然无法相信，因为它们没有亲眼见过。

这个故事常常用来描述一种宗教感，即当你亲身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却怎么也无法相信。我们在这里姑且不去谈论宗教感，仅就这个故事中更现实的“维度差异”作一番探讨。

多一个维度，会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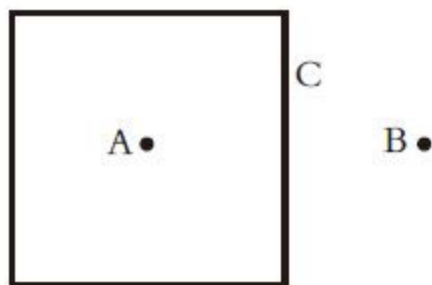
如果多一个维度看，世界将会因此不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游乐场的各种游戏，它们常把人弄得晕头转向，最晕的是哪种游戏呢？就是变化“维度”最多的游戏，即在各个不同维度、不同方向上的综合运动。

多维度会让一些人很“晕”，却让另一些人很“high”——这就是维度差异带来的惊人影响。

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维度上，有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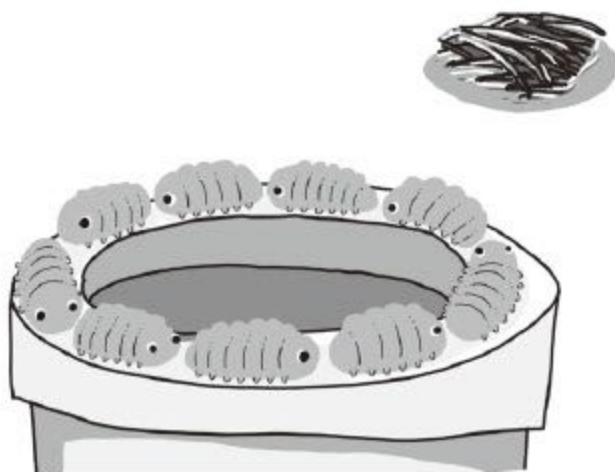
看下面这种情况：如果从一个正方形内的一点A，到达正方形外的一点B，同时又保持在这张纸所在的平面，那么就必定要穿过封闭的围线C。但是，如果我们利用三维空间，从而离开这张纸所在的平面，那么就可以不必穿过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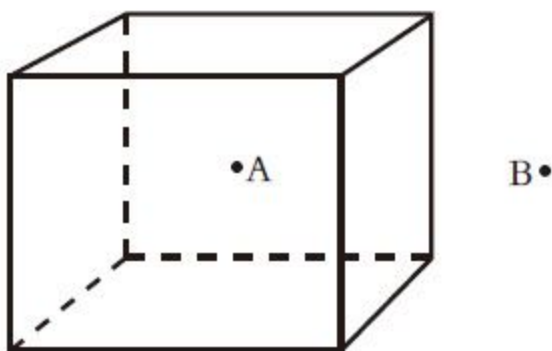
这就是从“二维”平面“跳出来”，利用“第三维”来解决问题——“跳出来”很关键。

这个抽象的法则，有一个很生动的现实版：法国科学家法伯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毛毛虫试验。他把若干毛毛虫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上，首尾相接，围成一圈，并在花盆周围不到6英寸的地方撒了一些毛毛虫最爱吃的松针。毛毛虫开始一个跟着一个，绕着花盆一圈又一圈地走，一小时过去了，一天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毛毛虫们还是不停地围绕花盆在转圈，一连走了七天七夜，它们终于因为饥饿和精

疲力竭而死去。毛毛虫是死于“线性思维”，或者说，“一根筋的思维”。



人类当然能够看到毛毛虫看不到那个维度，不过，人类也有自身的局限。比如，接下来是个类似的原理：从一个立方体内的一点A到立方体外的一点B，那么就必须穿过立方体的表面（如果我们限于三维空间中）。但是，与平面情形相类似，如果我们能利用一下第四维，那么就可以不必穿过立方体表面了。



这很抽象吗？其实它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多一个维度，现实吗？

我们知道，三维空间之外还有一维时间（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提到过这一理念）。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从更长时间来看，正义是存在的。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曾经怀疑正义是否存在，是因为我们的维度缺失了“时间维度”，只讨论“当下”。

我们还知道，人除了“物质需求”之外还有“精神需求”。做坏事的人，常常“心里有鬼”，于是常常害怕“鬼敲门”，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心”起到了替代的惩罚作用。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只看见坏人在“物质”方面过上了好日子，因此认为他们的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维度缺失了“心理”的那个维度。

在读二维平面王国故事时，我们都感觉到二维平面王国的居民是可笑的、可悲的，可是我们是否依然只站在“三维”的立场上嘲笑着“二维”，就像是“五十步笑百步”一样？又有多少人能够以“四维”（或“更多维”）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身处的世界呢？

在这个各种主义眼花缭乱的年头，白岩松曾说我们应“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可是我们能做到吗？

在我看来，常识、理性、信仰，这三者并不是一条伸向无穷远处的、不可捉摸的、越走越迷茫的直线，而是首尾衔接的一个圈：“常识”是起点，“理性”是寻找的路径，“信仰”则是最终归宿，但“信仰”重新指向了“常识”。

二维平面王国的故事告诉我们：增加一个维度，世界将因此不同！

困境？困境？困境？

困境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人的局限性，尤其是眼界的局限性。

因为一切困境都必然存在突围之道。

电影《阿凡达》中，杰克和妮特丽驾乘着各自的蓝绿色的伊卡兰（飞龙）在空中自由翱翔。这时，忽然出现一只橙黄色的托鲁克（霸王飞龙），它远比伊卡兰更为彪悍凶猛，一路把两只伊卡兰追杀得狼狈不堪……

如果您看过《阿凡达》，是否还记得杰克和妮特丽的伊卡兰是如何脱险的？两只伊卡兰钻进了茂密的树林，由于霸王飞龙体型庞大，就被挡在了外面无法继续追击。

电影《斯巴达与300勇士》中，斯巴达人依照族人传统，把男孩孤身一人放在野外。那是一个飘着大雪的夜晚，男孩光着身子，手里只拿着一把长矛，独自面对一头凶猛的、眼里闪着红光的饥饿野兽……

如果您看过《斯巴达与300勇士》，是否还记得小男孩是如何战胜野兽的？他机智地退进狭窄的岩洞，等待饥饿的野兽猛扑进来。由于洞口狭窄，野兽的身体被挡在外面，男孩趁势举起长矛扎进了它的喉咙。在电影中，那是用岩壁上的剪影来表现的。

在更多电影和电视剧中，作为主人公的帅哥美女一不小心被敌人用枪抵住脑袋，于是命悬一线……

如果您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是否还记得美女帅哥们是如何奇迹般生还的？无非是枪声响了，坏人却应声倒地，因为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个别的什么人，帮忙放了下冷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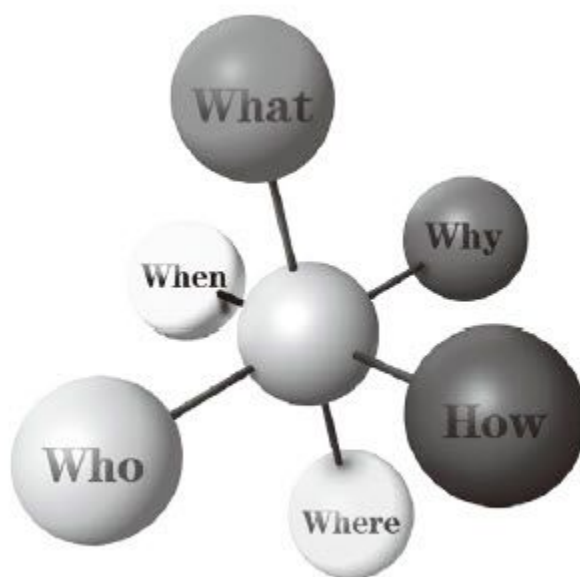
这些都是套路，俗套得不能再俗套，却也百试不爽。因为在这些套路背后，确实隐藏着“摆脱困境”的哲理。

困境的六个维度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遭遇各种困境，因而出现某种无助和苦恼：想要办成的事，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办成。怎么办？

其实非常好办，这个宇宙提供了无数方法来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前面说的几个影视剧套路中，一开始都包含了某种“困境”，而任何一个“困境”，都有某些设定。来看下面这张图：



这是在我个人头脑中对“每件事物的六个维度”的想象图。

在新闻学领域，有“五个W和一个H”的说法，即在报道一个新闻事件时常常会包含以下要素：Who（什么人）、When（什么时候）、Where（什么地点）、What（发生了什么）、Why（为什么）、How（怎么样）。用这“五个W和一个H”基本能描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件——换言之，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件，都包含着这些基本维度。

我想，我们所遭遇的各种困境无非也包含着这些设定：Who（什么人）、When（什么时候）、Where（什么地点）、What（发生了什么）、Why（为什么）、How（怎么样）。

前面那几个电影情节中的困境，都不是在既定维度中解决的，而是利用了自身之外的维度——比如，伊卡兰利用了自身之外的“树林”，小男孩利用了自身之外的“狭窄岩洞”，被枪抵住脑袋的帅哥美女们被“别人”营救。

所以，走出困境的方法在困境之外——那么，具体如何来操作呢？

走出困境的方法

遇到困境时，不妨想一想如何变换“五个W和一个H”中的一个条件或几个条件，来帮助我们突围。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您想约某个人，在某个时间，到某个餐厅一起吃饭，谈一谈关于某件事情，不幸的是，对方拒绝了。

这个时候，您不妨试着思考如下的问题：

我必须选择这个时间，还是可以换一个时间？

我必须到这家餐厅，还是可以换成其他餐厅？

我必须直接和他谈这件事，还是可以先谈其他事，彼此更了解和熟悉之后，再找机会谈这件事？

我必须和他吃饭，还是可以只喝杯咖啡或者用几分钟时间简短地先聊一聊，甚至只在电话里聊？

我必须约这个人吗？能不能换成其他人？

.....

在时间、地点、人物、做什么事、达到什么目的等等这些条件之间，只要变换一个或几个，我们想办的事就有可能向前推进一步。不要总期待完美，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完美的东西，只要能向前推进一步，就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每件事物的“五个W和一个H”，提供了至少六个不同的维度，也为我们突破困境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上面这个“约人吃饭”的例子很浅显，只要是心智稍微成熟一点的人都会这样来处理，因为“格局”已经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了，只有未成熟的少年儿童才会因为这样的小事而感到无助和苦恼。

不过，成年人依然也有无助和苦恼的时候，却是因为大致相同的原因——事情比较重大，但自己的“格局”还不够大，所以才处理不了。

这个理论并不难懂，但是，更多的现实困境真的可以如此突围吗？

条条大路通罗马

以上只是用请人吃饭这个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五个W和一个H”，接下来的部分或许更有实际意义。

一个人成为小偷，是因为什么呢？

有两种主要的原因，一是因为这个人的确想得到某件东西，于是就去偷（物质需求）；二是他很享受那个偷东西的过程，觉得很刺激、很好玩，并且体现了自身灵活的身手，得到关于自己“身手灵活”的某种“认可”和相应的“尊重”（精神需求）。

对于第一种原因，他完全可以这样来处理：花钱买；用自己的劳动或其他东西去交换；找一种类似的东西做替代品；向这件东西的主人借用后归还；稍等一段时间攒够了钱再说……具体的方法很多很多——犯罪冲动常常属于“小格局”的行为方式，只顾眼前利益、较少考虑将来，但如果能够让自己的格局稍微大一些，眼光稍微长远一些，其实对自己来说会很有好处。

对于第二种原因，如果想要获得关于自己“身手灵活”的“认可”和“尊重”，那么也可以换一种方法：去开锁公司工作；制作精巧的工艺品；做个魔术师或者当个杂技运动员等等。

同样道理，有些人就成功地把潜在的“恶”引向了“善”。

有的时候，犯罪是由于找不到更合理的出路，也是因为看不清关于“内容与形式”的有趣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内容”，无非是人的五种需要，而“形式”则可以是千变万化的。

我想，一个人之所以犯罪，并不是“人性”和别人不同，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找到合理的方法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他足够“理智”、足够“聪明”，或许能够减少走向犯罪的几率。

当然啦，一个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按照基因学的观点，“基因”也会产生某种作用。马特·里德利在他的基因学著作《先天，后天》中提到：“犯罪行为是高度可遗传的：收养的小孩后来有犯罪记录的，他们的记录情况看来更像他们的生身父母，而不是像他们的养父母。”为什么呢？书中解释说：“不是因为存在一些特定的犯罪基因，而是因为存在一些特定的个性，容易招惹法律的麻烦，而那些个性是可遗传的……比如不聪明的、没吸引力的、贪婪的、好冲动的、情感上不稳定的等等。”

不幸的是，还有一些情况也和遗传有关。除了犯罪的遗传性之外，《先天，后天》一书中还提到了“精神分裂症”的遗传性：“精神分裂症很明显是以家庭路线传播。如果你有一个表亲是精神分裂症，那么你自己也是的风险就从1%倍增到2%；如果你有半个兄弟或姑妈

姨妈是精神分裂症，这个风险升至6%；如果你有一个兄弟姐妹患这种精神紊乱症，这会让你有9%的风险；如果有一个非同卵双胞胎这样，你的风险增至16%；而如果你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同卵双胞胎兄弟或姊妹，这就达到目前所知的罹患这种疾病的最高风险：你约有50%的概率也会患精神分裂症。”

这无疑是个让人沮丧的结论，似乎人类具有某种可悲的“宿命”，但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患精神分裂症的“最高风险”也没有超过50%。这说明，至少还给这个人留有另外50%的机会，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进行选择。

或许，一个具有“好冲动、情感不稳定”等基因的人，无论他是更容易得精神分裂症，还是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都可以把这种性格导向某种良性出口。比如，选择当一个艺术家，没准儿就成了一位充满激情的、才华横溢的创作者呢！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与此同时，如果一个人身边的家人、朋友、老师、同事知道这个人具有“容易犯罪的基因”或“患精神分裂症的基因”，这些家人、朋友、老师、同事应该更多地帮助他找到满足自身需要的途径，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或精神分裂症发生的可能性——正如善于选择食物的小鸡总是长得更加健壮一样，身心健康的人们所作的选择、偏好和判断可以告诉更多的人，什么东西有益于人类的未来。

“我”是全世界的中心

不要嘲笑“地心说”，它也不全是错的，至少有合理的一面，今天看如此，将来也是。

尼采疯了。

尼采说：“我这个人为什么如此聪明？”那他意思是别人都是傻子吗？尼采真是疯了。

不过，我们每个人小时候都曾想过“我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不是别人？”“如果我到了别人身体里，我还会是‘我’吗？”之类的问题。

长大之后，大家习惯了，就不想这些“傻”问题了。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傻，尼采的话也不完全是疯话。

“我”，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就是全世界的中心——这里的“我”，指的是每一个人。

神奇的宇宙超球体

“我”是全世界的中心——这不可理解吗？

我们先来参考一下宇宙的情况。

按照爱因斯坦的描述，宇宙是一个“超球体”。

什么是“超球体”呢？大家都知道，“球体”是三维立体的，而“超球体”则是四维的。

如果用数学方程来表示，“ $x^2+y^2=25$ ”表示“圆形”（二维），“ $x^2+y^2+z^2=25$ ”表示“球体”（三维），而“ $x^2+y^2+z^2+w^2=25$ ”则表示“超球体”（四维）。

四维的“超球体”长成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它超出了地球人的空间想象范围。不过，爱因斯坦用一句话来描述它，即“有限大但是无边界”。

什么叫“有限大但是无边界”？

爱因斯坦认为：既然物质会使空间弯曲，那么所有星系的总质量有可能大到足以使空间本身弯曲起来，产生一个封闭的四维球形宇宙；位于其中任何一点的观察者往四面八方看时，都会看到许多星系散布在无止境的太空中，因此确认空间是没有边界的。

打个更通俗的比方：假如有足够的时间，一位探险家可以走遍所有星系，他并不会在某颗星球上看到其他所有星星只在他的同一侧、另一侧则完全没有星星，以至于让他感到目前所在的星球处在宇宙的边缘，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所以在宇宙中是找不到“边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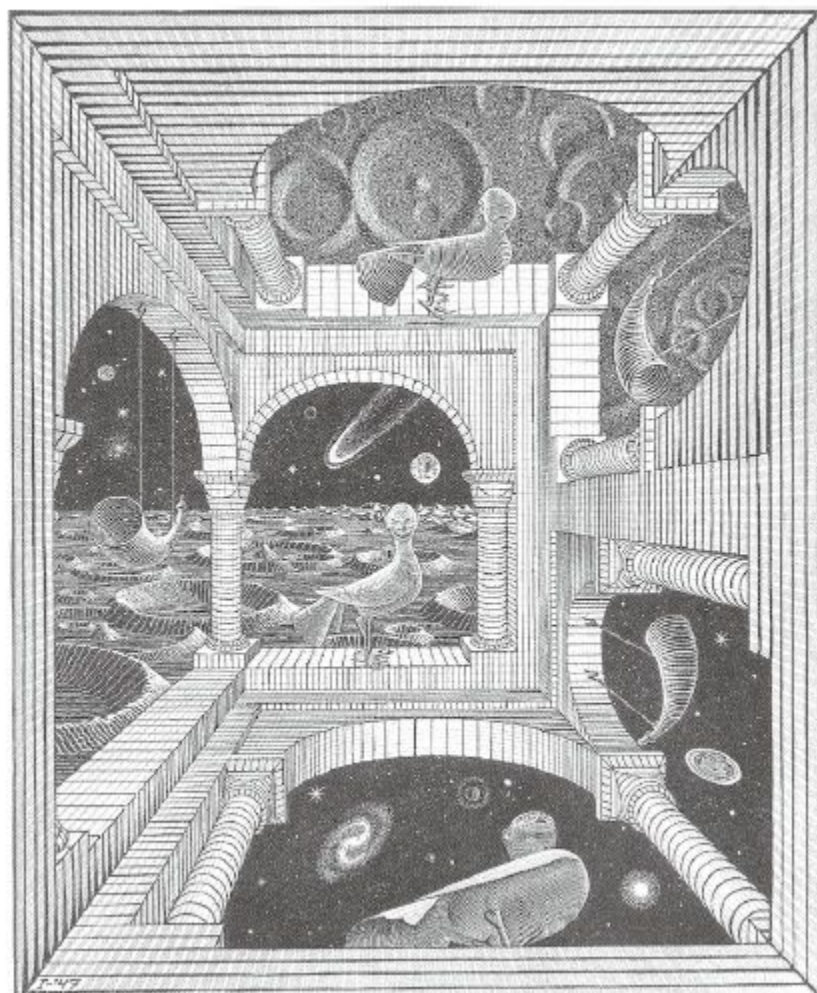
这就好像在二维的地球表面，人们可以在地球上到处流浪，而不必担心会从地球边缘掉出去——地球表面也是没有“边界”的。

但是这个没有边界的地球，它依然是“有限大”。这就是“有限大却无边界”在三维中的情况——同样，四维封闭宇宙也是类似的“有限大却无边界”，只是更多一个维度罢了。

爱因斯坦描述的超球体非常有意思，“位于其中任何一点的观察者往四面八方看时，都会看到许多星系散布在无止境的太空中”，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天体似乎都处于中心的位置上”。

如此看来，“地心说”的形成再正常不过了，换作其他星球的居民，也会产生类似的错觉。

下面这张图是埃舍尔的作品，尽管它未必是四维空间的真实景象，但埃舍尔在画作中展现出的空间维度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



宇宙是个“超球体”，那么，人类社会又是什么样子呢？

人类社会的“超球体”

很多人都知道一个著名的“六档距离理论”（也叫“六度空间理论”），说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和任意一个离他最远的人的距离最多也不超过六档。

这个结果从何而来呢？

米尔格兰姆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做了一项实验，他给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196人各送去一份邮件，请他们各自将它转寄给另一个人，米尔格兰姆将此人的姓名告知给了这些人，还说明此人是个股票经纪人，家住波士顿地区，但没有给出具体地址。这196名内布拉斯加人是随机选取的，他们被请求将此邮件转寄给自己认识的朋友、熟

人或者同事。只要他们认为，这些人有可能将此邮件转递给正确的收件人，并要求这些收件人也照此办理。

有些人在收到邮件后，会将它转寄给自己认识的朋友，觉得这个朋友或许更清楚该向什么地方寄送。没有人通过任何系统的查询方法查找此人的具体住址；这些人所做的，只是将邮件送到他们所认识的某个与目标收件人更接近——也许是地理上，也许是社会地位上，也许是职业上——的人手中。他们每送出一次，都按要求附上自己的信息，而且在程度上同目标收件人一致。如此这般进行下去，当邮件最终到达后（如果能够到达的话），整个投递路线就清楚了。

“当我问起自己一位相当聪明的朋友，让他估计一下这封信得辗转多少次才能寄到时，”米尔格兰姆回忆道，“他告诉我说可能要转100次手，也许还更多些。”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米尔格兰姆发现，平均说来，经过5次中转（也就是走上6段路）后，邮件便能到达目标收件人的手中。这就等于说，美国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同别的任何一个美国人，辗转通过平均5个人相互认识。究竟是不是5，这一点有商榷的余地。比如，每个转寄人选中的寄送目标，未必就是最合适的一个；一些人对此事情不感兴趣，因此根本没有寄出邮件，等等。不过，可以相当肯定地断言，只消通过5至7步，就足以将所有的人联系到一起。

1970年，米尔格兰姆又做了进一步的实验，这次是将邮件从美国最西端的洛杉矶寄送到东部的纽约市，仍然取得了支持前一实验的结果。

上述研究是在美国范围内进行的，而约翰·古阿尔写于1990年的话剧《六档距离》更将其推广到了全世界范围。剧中人物巫依萨这样说道：

“在这个星球上，每个人同别人都只隔开六个人。这就是说只有六档远。这就是咱们和这颗地球上所有其他人之间的距离。美国总统也好，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划旅游小船的水手也好，在雨林中生活的土人也好，火地岛的居民也好，爱斯基摩人也好……这真是个深刻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一扇新门，向着别人的世界打开。”

这真是一幅奇妙的景象：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中心。

如果依照“超球体”的理论，宇宙的景象，和人类的景象惊人地相似。或许我们应该反过来说，人类的“六度空间理论”和宇宙的景象惊人地相似。

这有什么意义呢？

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如果人类社会也是个四维的“超球体”，那将意味着：

第一，假使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这个社会是否会变得太不和谐？答案是“未必”——正如宇宙中每个星球都是“中心”，但宇宙在总体上依然非常和谐；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社会也未必不和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只不过，这个“为己”的“格局”应尽量大一些，不仅要“利身”而且要“利心”。

第二，想办成事，并没有那么难，毕竟大家彼此并不遥远，尤其是当每个人的“格局”都能大一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伸出援助之手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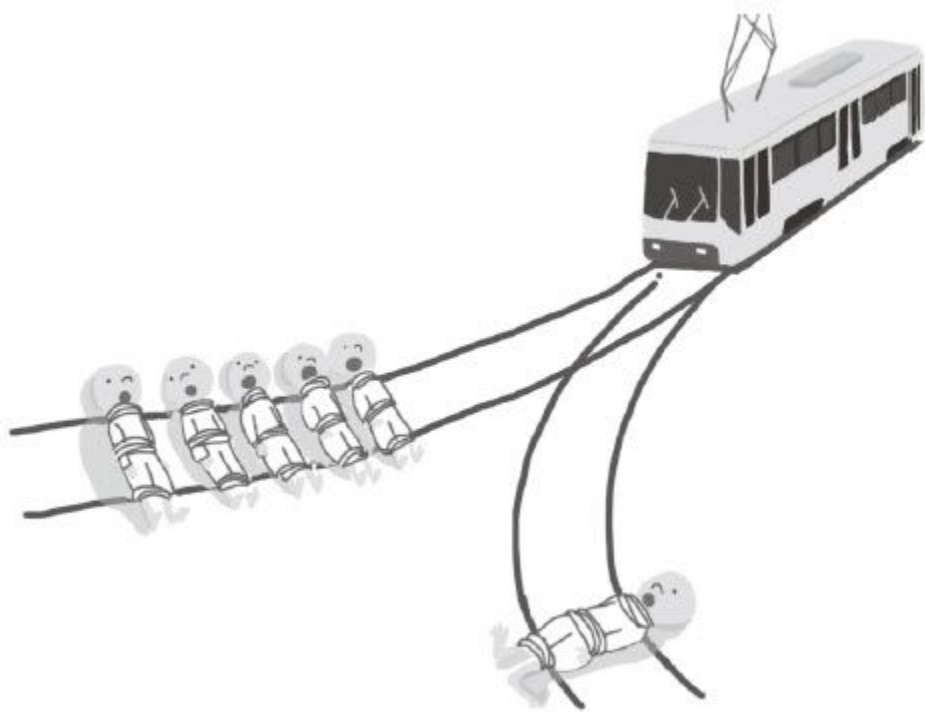
第三，“我”是全世界的中心，但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世界的中心。

世界不只你一人

“日心说”虽然更合理，但它也不全是对的，这和“地心说”被淘汰有相同的原因。这又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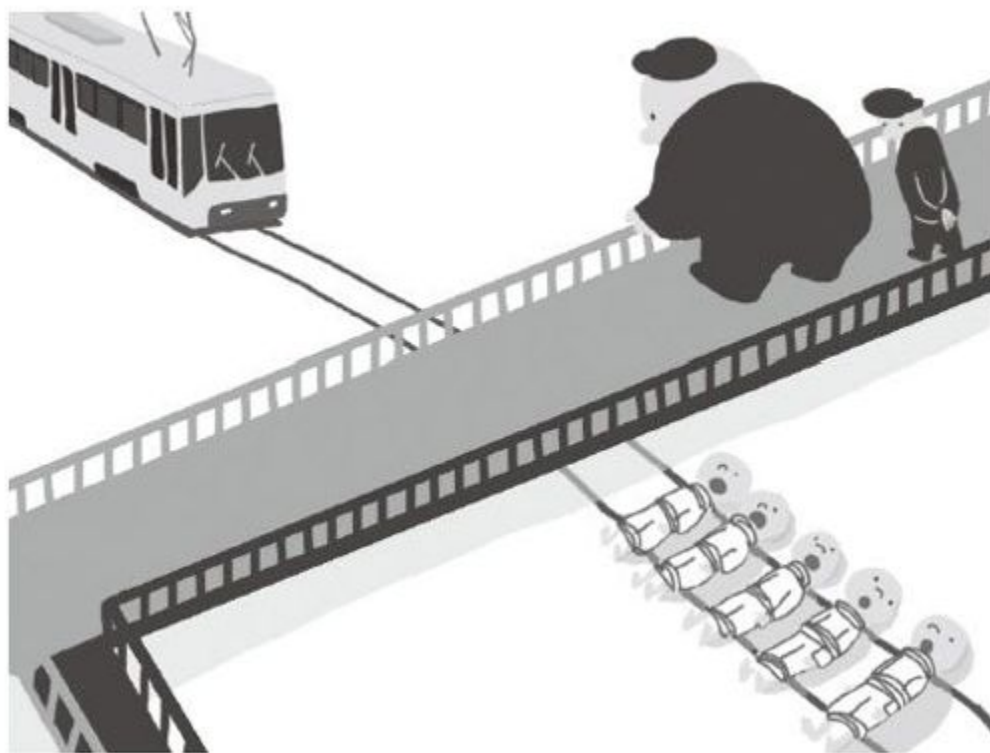
一个著名的伦理学测试：

假设有一列失控的有轨电车飞奔而来，前面有两条轨道，一条上有五个人，另一条上有一个人。



如果您是接受测试的人，您有权利选择是否扳动道岔：不扳道岔，电车将直接冲向第一条轨道压死五个人——那么是否应该扳动道岔，将电车引向另一条轨道，压死上面的那一个人？大多数人会回答“应该”，因为牺牲一个人拯救五个人是值得的。

现在，再考虑另一种情况：同样有一列失控的有轨电车飞奔而来，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处于危险之中。在电车和五个人中间，隔着一座天桥，桥上站着一位陌生的大胖子（这一次的实验要求被测试者把自己想象成胖子身后那个瘦子）：



拯救这五个人的唯一办法，是把这个大胖子推下天桥，电车将他撞死后，胖子庞大的身躯就会让电车停下来。那么是否应该把这个胖子推下桥去拯救五个人？大多数人会对这个“天桥难题”说“不应该”。

为什么同样是牺牲一个人拯救五个人，人们却会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断？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争论，使得哲学家们有活可干。一种经典的解释是，在第一个难题中，牺牲掉的那个人是不幸碰巧出现在另一条轨道上，并没有被直接用来拯救另五个人；而在第二个难题中，胖子是直接被用来拯救五个人的，因此直接利用一个人的生命来拯救他人，是不道德的。

还有人提出了别的解释，但多少都会遇到理论上相互抵触、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因此至今还未找到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解释。

多中心的复杂性系统

“电车难题”具有训练思维的作用，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道德边界所在。不过，理论探讨具有理论意义，却未必具有足够的现实意义。

的确，电车难题是一个“困境”，在该系统内不存在周全的解决办法。不过，如果按照“跳出来”的理念（参见《多一个维度看世界是什

么样子》），我们可以作如下假设：

比方说，在第二种情境中，如果那个胖子就是“我”，“我”愿意自动跳下去挡住电车，那么这个悲剧就变成了一个令人称颂的英雄故事——虽然这样的设想过于理想主义，但我们确实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地震中，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他人，将自己置于险境，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因此，上述电车悖论最大的问题是以“非复杂性系统”（一般系统）的方式，试图解决“复杂性系统”的问题！

那么，“复杂性系统”有什么特征呢？它和“非复杂性系统”的区别之一就是“多中心”和“单一中心”的区别。

“非复杂性系统”（一般系统）是单一中心的。举例来说，一辆汽车，不论它的设计原理多么复杂，它是“单一中心”的，都由同一个控制程序来调动并协同运作。

而“复杂性系统”则是“多中心”的。“宇宙”，无疑是一个“复杂性系统”；而“社会”，也应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参见前面的《“我”是全世界的中心》）。单独“一个人”不成其为“社会”，社会是所有人共同组合而成的，是无数人互动和博弈的集合体。

在电车困境的假想中包含一个前提：只有“你”（被测试者）一个人才能发挥作用（比如扳动道岔，或将胖子推下天桥），而其他人统统需要“你”来拯救。而实际上，这并不符合社会本来的面貌，所以这个“电车困境”悖论虽然具有“训练思维”的作用，也可用来进行关于“道德”的理论探讨，却要在“实用性”方面打个折扣。

在上述两种假定的电车困境中，如果考虑到“世界不只你一人”，那么这两个电车困境存在着多种解决方案：一条轨道上的那一个人自救，离开轨道；另一条轨道上的那五个人自救并互救，离开轨道；电车上的司机或其他乘客想办法让车减速；胖子自我牺牲，跳下天桥挡住电车；瘦子自我牺牲跳下天桥，虽然不能完全挡住电车，但可以使它减速从而减少其他人的伤亡；电车制造者能保证产品质量，使电车性能更安全可靠；电车运营公司定期进行车辆维修和保养，减少安全隐患；电车司机不要在没把握的情况下高速驾驶……

虽然上述方法听上去都像是“抬杠”（“电车困境”本身就只是一个“假设”而已），但我只是想说，这种“电车困境”的假设前提，

即“单一中心”的理念，它违背了这个世界的实际运行规则。

一个人，一只小蚂蚁

大家都知道，一只单个的蚂蚁无足轻重，一旦离群，除了死，别无选择；但作为一个十几万个体组成的蚁群，其表现的行为方式就颇为壮观了。

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中说：“蚂蚁其实不是独立的实体，更像是一个动物身上的一些部件。它们是活动的细胞，通过一个致密的、由千万只蚂蚁组成结缔组织，在一个由枝状网络形成的母体上循环活动。”

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像是蚂蚁族群的一个“放大版”，是一个“复杂性系统”。

事实上，当我们谈论“复杂性系统”的时候，最经典的、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之一就是“人脑”。“人脑”这个“复杂性系统”常常被视为“黑箱”，我们并不知道它的每一部分如何运作，我们只能通过观察其“输入-输出”信息来了解它。

有意思的是，人的大脑有 10^{11} 数量级的神经元，每只蚂蚁只有50万个神经元，拥有20万只蚂蚁的蚁群也共有 10^{11} 数量级的神经元，与人的大脑可比拟了。研究大脑思维的科学家也经常把单个神经元比作蚂蚁，把大脑比作蚁群。单个神经元是谈不上有什么思维能力的，巨大数量的神经元组织在一起，高智慧的思维就自发地涌现出来了。

对于“复杂性系统”来说，它具有某种“自组织性”（这是其区别于“非复杂性系统”的另一重要特征）——大脑中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思维活动都是与其中“一组”甚至“全体”神经元的“协调活动”相联系的，而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神经元。于是，在全体神经元之间极为复杂的相互协调、博弈和互动的过程中，整个系统便具有了“自组织性”，即呈现出一种有序的工作状态。

正由于这种“自组织性”是通过“相互协调、博弈和互动”而产生的，所以复杂性系统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完全”担当起某种“万能”的使命——这是不切实际的——因为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事可做。

一分子的价值

面对诸如“电车困境”这种道德难题，真正有意义的思考是：“我”个人作为“复杂性系统”中的一分子，能够为解决此类困境做些什么？“我”是否已为此倾尽全力？

如果“我”已经尽力，谁也不能责怪我。但如果“我”没有尽力，即便别人不责怪我，“我”的内心也会责怪自己。

多中心的“复杂性系统”的好处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每个人内心是否心安，也只和自己有关系。

“复杂性系统”是20世纪80年代在“自然科学”领域兴起的理论，但我们似乎对它的重视和应用程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很多争论不休的、难解的话题，似乎都和“复杂性系统”有关，但我们已太习惯于运用“非复杂性系统”的方式来处理（详见后面的《小心！珠穆朗玛峰再高一倍就会倒掉！》《应该说闲言碎语吗？》《鸟儿的飞行，雪崩式的效应》等文章）。

小心！珠穆朗玛峰再高一倍就会倒掉！

珠穆朗玛峰只有一座，但地球上的高山有千万座。

若把所有的岩石堆到一起，是否比珠穆朗玛峰更让人景仰？

哈利·波特从一出生就与众不同，他是唯一一个从伏地魔的死亡咒语下逃脱的人，仅仅留下了额头上一道闪电状的疤痕，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弱小婴儿。

后来，哈利·波特进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他的行为经历总是如此出众，可是五年级时有一件事让他很不开心：被选为年级级长的是他的好朋友罗恩和赫敏，而不是他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怎么也不明白：“他们没和我一起跟屈拉决斗，他们也没见识汤姆·里德尔和巨蛇，瑟瑞斯越狱之后不是他们赶走了那些摄魂怪，伏地魔回来的那晚，他们也没有和我一起在地窖里……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做得都多！”哈利愤怒地想着，自己如此与众不同、付出了如此多的代价，为什么不能当选为级长？！

在这一年临近暑假时，哈利·波特再一次经历了和伏地魔的生死较量，幸而再一次死里逃生，他和老校长邓布利多一起坐在校长办公室里。

“哈利，我想我还欠你一个解释，”邓布利多犹豫着说，“你，也许曾经奇怪我为什么没有选你做级长？我必须承认……我觉得……你身上的担子……已经够多了……”

哈利抬起头，看到一滴泪珠从邓布利多的脸上滚落，滴到他长长的银色胡子里。

珠穆朗玛峰再高一倍，会怎样？

邓布利多没有让哈利·波特当年级级长，因为一个人不能承担太多的重荷，毕竟人不像岩石那般坚硬。

事实上，即便坚硬如地球上的岩石，也同样不能承受太多重荷。假如珠穆朗玛峰再高一倍，会怎样？它会轰然倒塌！

需要说明的是：以珠穆朗玛峰目前的高度来看，它不会轻易倒掉，但如果再高出一倍，它就一定会。

为什么呢？

尽管岩石非常坚硬，但如果太高了也会瘫软，这是经过科学计算的结果。在赵凯华的《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中计算过地球上山体高度的极限值，约为14.5km。珠穆朗玛峰高8.84km，确小于此限，所以迄今为止它还屹立不倒。

同样的道理，一个人，不应该无限制地给自己增加压力，总是期望“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因为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极限，内心不切实际的珠穆朗玛峰会轰然倒掉。

格局大小：应该包含能够

诚然，“大格局”要求人们尽量有责任感、要求人们尽量与人为善，但是，在伦理学上有一个公认的前提是“应该蕴含能够”——这是尼曼努尔·康德的名言。

什么叫“应该蕴含能够”呢？由于人总是受到某些先天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们只能量力而行。比如，我们的生理限制使得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举起两吨重的物体或者在地球表面在5秒钟之内跑完100米一样。

“应该蕴含能够”，这句话倒过来说等价于“不能够蕴含不应该”，比如，“他们无法这么做，就像他们无法举起两吨重的物品一样！”

所以，如果你非得要求我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我不能够（完成这些任务）”，所以“我不应该（完成这些任务）”，而且你也“不应该要求我（完成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伦理学中，有一派学说被称为“利己主义者”。什么样的人才是“利己主义者”呢？

如果你对一个人说：“你应该给灾区捐一些钱物，那里的孩子正在挨饿受冻。”而这人回答说：“谁管得了那些事儿？我只关心我有没有、会不会挨饿受冻。”那么这个人多半是一个伦理学家常说的“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者”的理由恰恰也是“应该包含能够”：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去关心别人，就像他不可能搬起两吨重的石头一样。

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我们能说的是：“你应该给你的穷亲戚或者陷于困顿中的好朋友一些帮助，因为他们正在挨饿受冻，或者情绪低落。”即便对于利己主义者来说，亲戚和好朋友离他们并不遥远，这些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是用另一种方式看是不是“能够”的问题。

那么，究竟“能够”还是“不能够”，应该由谁来评判呢？由自己的内心，即“心知肚明”——因为“心知肚明”是区分“主动或被动”的依据。

举个现实的例子来说，7·23动车事故，为什么大家曾如此纠缠于“那一晚到底是否有雷击”？因为打雷是老天爷的事，我们控制不了，这个事故就属于“天灾”；而如果不存在打雷的问题，那么这个事故就属于“人祸”——对“天灾”或“人祸”，人们向来持有不同的心态，相比较之下，“人祸”更让人耿耿于怀。

绝大多数“人祸”中的当事人自己都是“心知肚明”的，知道明明“能够”做些什么而没去做，于是就会或多或少被自己的良心所谴责——即便没有别人知道，内心谴责依然存在，甚至负罪终生。这是一种公平的“心理回报”机制。

这里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压力：一是如果还有富余的潜能未被开发，因而内心惴惴不安；二是如果负荷过重，内心的珠穆朗玛峰就会倒掉——这两种力量，一种向上、追求大格局、追求成就感和高道德，另一种向下、固守于小格局、追求安逸和闲适，每个人都在内心的天平上做着权衡。

就像那句熟悉的歌词：“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



似乎这个世界总是同时存在这两种力量——人类自古有“飞天梦想”，但时时刻刻要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卓越，但也一定会有个上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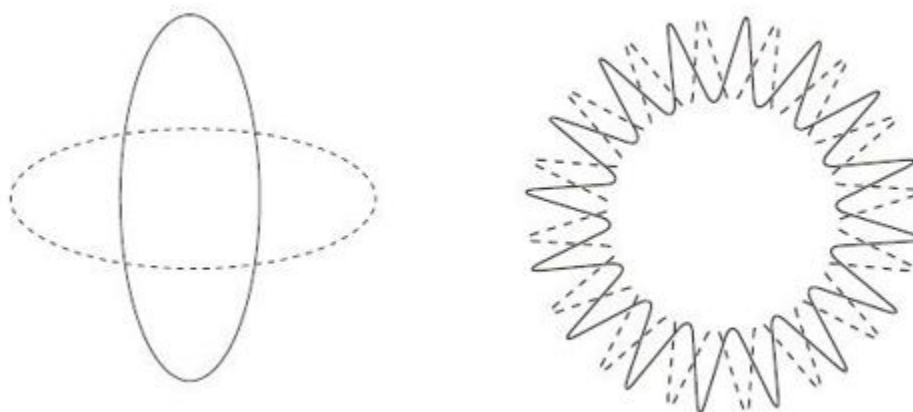
高能量：一根疯狂振动的弦

另一件有趣的事和超弦理论有关。

前面说过，超弦理论认为所有的微粒实际上都是振动着的一根闭合的弦，只是以不同频率振动的结果产生了不同的微粒（参见《权势尊位功名利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一文）。

大家知道，用力拨动琴弦时，振动会很剧烈；而轻轻拨动它时，振动会很轻柔——微粒中的“弦”也大致如此，有的弦振动得很轻柔，有的则很剧烈。

您猜猜下面左右哪种振动模式拥有的“能量”更高？



疯狂的振动模式（右边）比轻柔的振动模式（左边）有更大的能量——这多像我们的生活呀，有人生活得如火如荼，有人生活得轻松自在。

与此同时，依照超弦理论，“质量较大”的粒子所具有的弦振动较剧烈（右边），“质量较小”的粒子所具有的弦振动较轻柔（左边）。依据 $E=mc^2$ ，“能量”和“质量”是相关的，大能量意味着大质量，大质量也就是大能量。这些都是彼此相关、相互呼应的：如火如荼的生活能获得更多的东西，轻松自在的生活则必然相对简朴一些。

说得更直白些，如果想要轻松自在地生活，就不要奢望拥有得太多；反过来，如果想要追求更多的东西，就往往要更多地奔波操劳。

当然啦，千万不要把弦绷得太紧，否则容易一不小心“嘎嘣”啦！这和珠穆朗玛峰再增高一倍就会倒掉一样，很危险。

每个人都有个承重上限——如果有些目标真的超出了承重上限，怎么办？

超出承重上限，怎么办？

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一旦遇到超过承重上限的目标，又该如何来处理呢？

不必过于忧国忧民，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别人在。人类社会是个“复杂性系统”（参见《世界不只你一人》）——如此才让更多的人都具有了“存在的价值”。

珠穆朗玛峰是否会倒掉的问题，不仅适用于个人，也同样适用于政府。

仅从理论上说，政府不可能无限制地承受重荷，这是科学精神。事实上，政府的实际运行也的确如此，它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但它不可能包揽、事实上也并未包揽一切事物，这是明智之举。

社会学研究中把不同的力量分成几类：政党、三种国家机关、政治协商、人民团体、基层群众的自助组织、企业组织、广义的NGO（非政府组织）——无论是这样的分类，还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复杂性系统的多中心相互制衡。

再从抽象的哲学意义上说，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条条大路通罗马（参见前面的《困境？困境？困境？》）——只要多中心的手段确实而有效地起作用，无论具体采用何种形式都可以，唯独缺乏监督和制衡力量的单一中心是不可以的（因为任何单一中心都有承重上限，它不是这个世界的运行之道）。

残缺，以成人之美

假如果真有上帝，“他”在创造这个世界时有着怎样的理念？

“他”首先要使每件东西都造得有残缺——即便坚硬挺拔如珠穆朗玛峰，也必须有一个承重上限，这像是珠穆朗玛的先天残缺。

与之类似，每个人都生来是“残缺”的。如果生下来是一个男性，就永远无法完整而准确地知道女性的身心体验，反过来也一样。即便天生是个双性人，或是通过变性手术而改变性别的人，他们在世俗眼光中也会被认为是非正常的，这便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残缺——因此说，每个人生来都注定是“残缺”的。

令人惊叹的是，恰恰由于这种残缺，才使得人们不得不与外界联系，在互补和互助中寻求更高程度的完整性。比如，单独一个男人，或单独一个女人，都无法传宗接代，因而人类才会出现家庭这种最常见、最普遍的联结方式，进而使更多人在更广泛意义上相互联结在一起。

所以，世上没有完美的东西，这甚至是件无比美妙的事——正因为如此，才使其他人有了实现价值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世界才得以在相互联结中凝聚。

多元化，意味着分崩离析吗？

自由与民主，想说爱你不容易？不，容易。

“同学们，今天我带来了两部片子，A和B，你们更愿意看哪一部？”

您猜猜结果如何？

当然是一部分同学选择A，另一部分同学选择B。总之，从未遇到过所有人意见统一的情况，从来没有！

有时，这个测试中会做一点小改动：

“同学们，今天我带来了两部片子，A和B，我觉得A更好一些，理由是……你们更愿意看哪一部？”

您猜猜结果又会如何？

选A的人的确会多一些，但也一定会有人选B，真的一定会有哦！

把这个小测试放大了，就是“民主”遭遇的尴尬。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只要有民主，就会有不同的声音。然后会怎样呢？就会带来社会的分崩离析吗？

公民社会：不断膨胀的宇宙

近几年，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谈论很多的一个话题是“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意味着每个公民有足够的自由，充分发挥公民的权利。

不过，“自由”或许是向着不同方向的：每个人有自己的主张，所以自由很可能意味着“向着四面八方的分化”（其内在原因是所有好东西压根儿就不在同一个方位上，参见《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

那么，这种“向着四面八方的分化”是否必然会带来“四分五裂”或“分崩离析”呢？

让我们再一次参考宇宙的情况——众所周知，宇宙一直在膨胀（这也像是一种“向着四面八方的分化”）。

如果宇宙不膨胀，将会怎样？由于各个星体之间存在着“万有引力”，这种引力使得它们相互吸引，最终必将缩成一团。幸好宇宙一直在膨胀，所以抵抗住了向内塌缩的力，维持了目前的稳定状态。

所以说，稳定和平衡恐怕是一种“动态中的平衡”，说得更具体一些，是通过动态对抗才能更好地保持平衡。

与“向着四面八方的分化”相类似的概念还有“多元化”。

多元化：白蛾子，黑蛾子，灰蛾子

在地球上的自然界中，多元化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达尔文在他的生物进化研究中指出，自然选择导致新物种的出现。由于这世界一直在变，故大自然偏好多样化。

举例来说，如果一群白蛾中掺杂一些体色较暗者，则在灰蒙蒙的天气下较为有利——多样化分布较广阔的族群，不会将所有的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在某一物种中，个体之间的变异会随着时间扩大，以致出现一个跟其他族群迥异的新种，无法再跟原来的物种交配繁殖。至此，一个新物种诞生了。

不仅自然界的生物如此，人类或许也如此——古时候的人更像是“通才”（比如司马迁，亚里士多德等），而现在的人则越来越专业化——从机器化大生产时代起，人们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专业分工”对提高效率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也是提倡“大格局”的背景，言下之意是每个人都因为过于“专业化”而显得有些残缺不全）。

因此，在“多元化”这一必然趋势的情况下，“社会分化”也是必然的。只要别超过某个限度，“社会分化”（既包括专业分工、也包括不同主张、还包括贫富分化，它们从哲学的抽象意义上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其有利的一面。

一个典型的历史案例，是大锅饭时期的“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于是时间长了自然就带来了生产的萎缩——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宇宙假如没有膨胀就会缩成一团那样。正是由于存在着贫富分化，贫穷的人们才被激发起追求幸福生活的原动力。

国际上用“基尼系数”来表示贫富分化的程度，它介于0~1之间，低于0.2意味着“收入绝对平均，但社会动力不足”。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就属于这种情况。

基尼系数比较合理的数据是0.3到0.4之间，也就是存在一定分化——在我看来，这和宇宙膨胀“在相互远离中保持动态平衡”是很相似的。

因此，一定程度的贫富分化似乎是符合宇宙之道的——它不仅仅在当社会是必然的，而且甚至在将来的某种“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恐怕也是更为可取的模式。

不过，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5，这意味着“收入差距悬殊、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如何控制“分化的程度”，成为很多有识之士热心探讨的话题。

从理论上说，关于收入分配公平，有三种层次的调控方法：一是初次分配，即市场调节。在这个层次上，要充分尊重市场秩序（而不能有过多的行政手段干预）；二是二次分配，也就是政府调节，比如政府转移支付等；接下来是三次分配，即道德调节，具体体现为慈善公益等。前两种是制度解决方案，后一种则是精神层面的解决方案，它在目前相对薄弱，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前两种方案的顺利、有效实施。

正如本书开头所说的那样，“灵魂落在了后面”，我们在“精神意识”方面的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参照宇宙的秩序，我们应力争达成精神意识方面的某种“共识”。

共识：磁体原子自旋的方向一致

多元化，是一种必然存在的、合理的、良性的趋势——那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是否因此就不可能存在“共识”？

从宇宙膨胀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每一部分看似相互远离，但宇宙依然是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意义上，“共识”在更宏观的视角下是有可能存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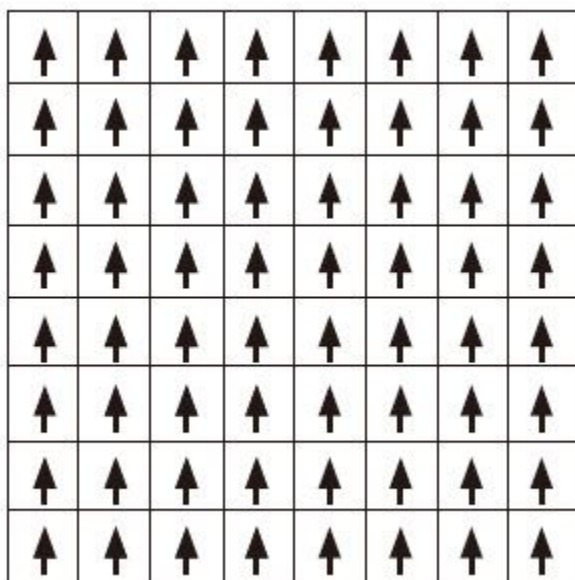
关于人类社会运作机制的“共识”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比如，存在贫富分化并不是问题，控制分化程度才是问题；比如，富人应该更多地从事慈善公益活动；比如，社会逐渐走向公平是大方向（参见后面的《公平是不是乌托邦？》），所以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劫富济贫政策，而不是给富人创造更多的牟利机会……

如果用更直观的方式来表示“共识”，那么它和“磁体的原子自旋”很相似。

大家知道，磁体是具有磁性的。其内部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在一块磁体中，它的每一个原子都表现得像一个微小的磁体——可以将

这些原子设想成小小的指南针，而这一个个指南针又倾向于顺着一条线排布起来。物理学家将这种“原子磁针”称为“自旋”。

每个原子的自旋都会影响到其四邻的自旋。一般说来，这些影响相互施加的结果，是使邻近的自旋整齐地排列起来。所以，晶格的最稳定的状态，就是所有的磁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在这种位形中，所有单个原子的小小磁场加到一起，便会形成一个很强的磁场，铁块就成了磁体。如下图所示：



可是，如果加热磁体到某个较高的温度，其磁性有可能会消失（而冷却后又会恢复）。人们认识到这一现象已有数百年了。就磁铁而言，这一变化发生在 770°C 左右。

在加热过程中，热会搅扰磁自旋的排列，弄得它们的指向无规则起来。这样，从总体上看，各个原子的微小磁场便是彼此抵消的，铁块就成了非磁体。如下图所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我的“浪漫主义”的想象中，这似乎就是目前人们“价值观”的生动写照：穷人希望“劫富济贫”，富人则想“劫贫济富”；有人认为应该“当好人”，有人则认为应该“当坏人”……有人“向上”，有人“向下”，于是整个社会就像失去了磁性的磁体，不再呈现出明确的走向，这就是“过热的经济”造成的搅扰。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有些人的轨道是“拜金主义”，是以“物质为中心”，那么，就会对其他人产生某种微妙的互相影响。即便在天体中，此类的微妙影响也是存在的：月亮也是沿椭圆轨道运行的，但这条路径有时像醉汉走过的直线路径一样，显得匆忙而又徘徊不定，弯弯曲曲地从一边走到另一边。这是为什么呢？牛顿指出，这是由于太阳和地球都对月亮有吸引作用，从而使月亮偏离了正常的椭圆轨道。

如果每个人心中的“道”都是相同的，且都是“向上”的（这是虚化的概念，和具体行为选择无关），那么，至少我们就能达成某种共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四分五裂的可能性。

应该说闲言碎语吗？

闲言碎语，听上去就不那么与人为善。不过，如果从更大格局来看，事情会变得很微妙。

多比是个小精灵。

哈利·波特第一眼看见它时，它莫名地出现在床上。多比长着大大的而且像蝙蝠那样的耳朵，两只像网球般大小的、凸出的绿眼睛，和一只长而扁的鼻子。哈利·波特注意到，这个小精灵所穿的衣服就像一只留出了手和脚位置的枕头套。

小精灵滑下了床并深深地鞠躬：“先生，多比久仰你的大名……实在是太荣幸……”

“坐吧。”哈利指了指床礼貌地说道。让哈利害怕的是，小精灵突然哭了，而且很刺耳。“对不起，”哈利·波特低声道，“我不是有意冒犯你。”

“冒犯多比！”小精灵哽咽了，“多比从来就没有被巫师请坐过——像个同辈般……”“你肯定没遇过多少好的巫师。”哈利试着鼓励它说。

多比摇了摇头。然后，毫无征兆地一跃而起同时用头猛烈地撞击着窗户！

“先生，多比得自我惩罚，”小精灵说道，“多比是为一个巫师家庭服务的，职责是永远为一个家庭效劳……多比会因为来看你而要严厉惩罚自己的！”

小精灵喘着气，用它穿着的枕头套邋遢的一角擦了擦脸，继续说道：“哈利·波特是勇敢和大胆的！他英勇地面临过许多危险！但是现在多比得来保护哈利·波特，警告他……哈利·波特不能再回霍格沃茨了。”

哈利·波特觉得很蹊跷，一路追问下去，小精灵一路犹豫地回答着……接下去，哈利还来不及制止它，多比就跳离床铺，抓住哈利的台灯就往脑袋上砸，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

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描述的虽是一个童话世界，但那些魔幻般的人和事总带着现实生活的投影。

多比的告密行为似乎“背叛”了它的主人，因此它要不断地自我惩罚——那么，作为一个人，是否应该背离自己所在的团体，说些所谓的“闲言碎语”呢？

可爱的“闲言碎语”

“我应该说闲言碎语吗？”当我们有时候特别想向别人倾诉或抱怨些什么的时候，就会问自己这个问题：“这样是否不道德、不仗义？”

在想到这个问题时，我们常常会很愧疚，正如小精灵多比的自我惩罚一样。

如果以客观和理性的分析而论，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各种“美德”，它们绝大多数是倾向于“联结”的，因此而成为“美德”（参见《香香的，臭臭的》）——“美德”是使我们自己走向强大的方式，也是使整个社会走向文明的方式。

换句话说，“美德”并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更不是随机选定的，它们是经得起推敲的、有充分理由的。

不过，在一些细微的问题上，关于美德的“常识”也存在着小小的偏差。我认为，“闲言碎语”是其中一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思绪可以变得更缜密、更细腻，有待作出一些小小的“微调”。

在通常的观念中，说闲言碎语是不道德、不仗义的。那些被议论的人，多数是我们的熟人，出于情义和伦理，我们似乎应该保护他们不太光彩的一面。

不过，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简单。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要刻意地说一些“闲言碎语”——就像《哈利·波特》中的小精灵多比，它让读者或观众感觉到的是“可爱”，而不是“背叛”。

总体而言，如果某个朋友、同事、邻居的不光彩行为只和他本人有关（比如做了件很丢脸的事，但它丝毫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的利益），那我们最好替这个人保守秘密才更为道德；但如果这个朋友、同事、邻居的行为，妨害了更大范围人群的利益，将来甚至会继续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就应该刻意地跟别人说说“闲言碎语”——后者，就属于“可爱的闲言碎语”。

“闲言碎语”的理由：囚徒困境实验

“可爱的闲言碎语”为什么“可爱”呢？

有一个相关的科学实验提供了非常坚实的理由，即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实验。

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弗拉德和德雷舍尔设计了一个被称为“囚徒困境”的游戏，假定两个被怀疑犯有罪行的囚徒，同时都被给予指证对方有罪的机会。

那么，作为“囚徒”，应该选择“合作”（不指证）还是“出手”（指证）呢？最好的结果，是自己“出手”而对方“合作”。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另一个囚徒就成了“呆鸟”而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在这个游戏中，两个玩家（也就是两个“囚徒”）是不能彼此沟通的。显然，如果双方都同意合作，那么对彼此都更有利些。不过由于无法向对方传达这一讯息，假如自己选择“合作”而对方选择了“出手”，那自己岂不就成了“呆鸟”？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最坏的结果，大家都出手，至少不能由自己来独自承担罪行。

将“囚徒困境”这个问题改头换面一下，用社会中个人生活的语言重新叙述，“合作”就可视为“遵纪守法”，“出手”就可看作“损人利己”——这里存在一个基本困难：“合作”固然不错，但“先出手”其实更好。

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个“囚徒困境”支持“人善被人欺”的说法——好在，“囚徒困境”并非如此简单。

20世纪70年代末，阿克塞尔罗德设计了一种类似的游戏，他前后测试过两轮，共搜集到了数十种战略，分别来自心理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每个方案都有详细的“出手”还是“合作”的细则。比如，有的方案是连续合作3次，第4次便出一次手，其他多数都比这个方案复杂。不过，最后的赢家却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它是芝加哥大学的瑞珀波特提出的，名字叫作“跟风”，因其英文为Tit For Tat，也称之为TFT战略。具体规则只有一条，就是玩第一把时选合作，以后永远采取对手玩上一把中的选择。

在采取这种战略游戏时，如果对手是个无条件的合作者，TFT战略的结果也将是从始至终的合作。因此两方得分相同，也都玩得不错。如果对手是个绝对出手派，TFT战略玩家第一轮会当上“呆鸟”（因为选择了合作），但以后就会一路出手，不会再让对手沾光。由于第一轮吃了些亏，TFT玩家得分会稍稍低于绝不合作的对方，但

只是稍低一点点而已……在对付不论什么情况时，TFT在所有的战略中名列第一。这是个既不咄咄逼人，又很容易掌握的对策。

从“囚徒困境”的实验得知：“跟风”是最明智的策略。这里蕴藏着一种宇宙的秩序，而且这个策略在自然界中也能找到印证。

有证据表明，吸血蝙蝠、棘鱼、猿猴，甚至病毒，都会遵循“跟风”规律行事。如果我们认为病毒也信奉“利他主义”，那似乎是说不通的，它们的行为，完全是进化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遗传因子中存在造成类似于“跟风”行为的生命体，会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优势，因此自然选择会朝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进行，从而使这样的遗传类型得到更好的传递。

这无疑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启示：“跟风”，说得直白些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如果我们的朋友、同事、邻居做了一些损害他人的事，至少应该得到某种应有的“回报”，否则人们的行为就会失去应有的约束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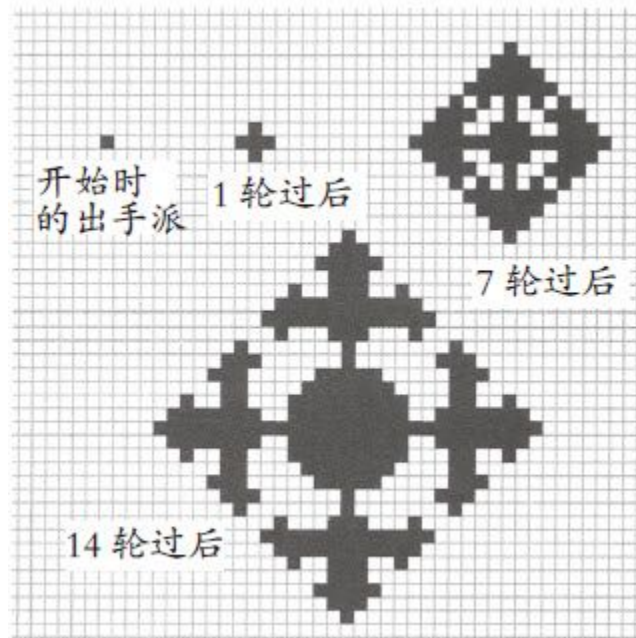
“囚徒困境”实验告诉我们：“可爱的闲言碎语”为什么“可爱”？因为是对方不仁不义地“出手”在先，所以我们也应采取“跟风”策略来“出手”，这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多比之所以可爱，因为它“背叛”的主人本来就是坏蛋呗。

黑白两道的地盘：信息沟通的影响

“囚徒困境”实验包含了前后相承的几个阶段，除了上述两个阶段之外，后来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1992年，牛津大学的马丁·诺瓦克和维也纳大学的卡尔·西格蒙德又进行了一项相关实验。他们发现，“跟风”战略的胜利只能在刚开始时维持一段时间，但这个战略的致命弱点“一报还一报、决不妥协”也随之招致恶果：只要有人出手就会不断传染，最后谁也占不着便宜。因此，经过更长时间之后，“跟风”战略会逐渐被更具宽容精神的“宽厚跟风”压倒。到头来，只有一种战略会存在下来，那就是“宽厚跟风”。

在《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一书中，用下面这张图表示不同策略的胜负情况，即“出手派”（黑色方块）和“跟风”战略的执行人（白色方块）进行对峙时，地盘扩展过程中的形状变化（随着轮数的增多，白色地盘的比例将越来越大）：



总结一下这几种策略的区别：如果只玩一次，那么选择“出手”是明智的，否则自己很容易成为“呆鸟”。这就是为什么坑蒙拐骗的多数都是“陌生人”，所以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

如果要连续玩好几轮，选择“跟风”是明智的，这种“一报还一报”大体相当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有人做了坏事，说些“闲言碎语”是给坏人以应有的报应。

如果玩的时间更长一些，选择“宽厚跟风”是最明智的，偶尔“以德报怨”，能够促使事态向良性方向发展。这其实也是“宽容”的好处，以免“冤冤相报何时了”的无休止争斗。

日常生活其实在原理上和“囚徒困境”游戏是基本相同的，但也有一个明显区别：“游戏”中，囚徒是被分别关押及询问的，他们不能沟通信息；而日常生活中则不存在这条死板戒律。

事实上，恰恰是由于“是否存在信息沟通”才导致了游戏中形成不同策略的结果。如果游戏只玩一次，两个囚徒就完全不能沟通；如果玩很多次，他们通过“上一轮的行为”来传递出讯息——信息沟通越多、越透明、越频繁，越有利于作出更明智的判断、形成更良性的互动。

“闲言碎语”即“信息沟通”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信息。比如，互相考察对方的履历、口碑、行为方式、信用卡记录，一切都在产生相应的约束作用。

可见，“信息沟通”是多么重要，它将有助于我们作出正确的、合理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判断。“信息”从哪里来？不得不说，“闲言碎语”也是很重要的一种渠道，这样的“信息”越多，我们越容易发现真相。因为“真”的东西具有“联结”性质，“谎言”则相互拆台、不能彼此印证。

前文说过，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性系统”，它呈“多点式”分布，每个人都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长尾理论”认为“互联网时代是发挥长尾效应的时代”，恰恰也是因为这种“多点式”分布使资源被分散在不同的人手中，不再需要超大仓库来储存，因而降低了成本，使得最后20%的利润得以真正实现……这些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不断地抱怨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毒胶囊……我们不妨像“随手拍照解救被拐儿童”一样，关注身边的不合理现象，适当地说一说“闲言碎语”——就像龙应台在30年前说的那样，“中国人，你为什么生气？”在“有情有义有原则”的尺度下，让那些该“解构”的都“解构”了吧！

最近常常有媒体记者以招工应聘的形式“打入敌人内部”，做了很多隐性采访报道，于是揭露出一些企业的黑幕。可是，那些企业的内部工作人员为什么很少主动爆料呢？或许，他们的格局不够大，只想着挣钱而不在乎其行为是否合理合法；也或许，他们有良知，却因为被“闲言碎语”这个词的表面意义所限制，觉得主动爆料太不道德、太不仗义。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小团体的利益，人们都将难以相互信任，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将难以维系。如果心里还有大道正义，就不要对那些丑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

电影《无间道》中，不同身份的人相互渗透，一边透露着信息，一边隐藏着信息，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所不同的是：假恶丑的东西先天不足，更容易被解构。

当然，即便我们不断地去“解构”，也依然可以对这个社会保有一定的信心。如果“多一个维度看”，大道正义一直存在着，亘古不

变。“解构”的只不过是那些“理所当然应该被解构”的“局部”而已。

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有辙吗？

眼看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会担忧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不过，或许还未到真正绝望之时，因为世界有自我修复机制。

电影《饥饿游戏》，说的是富人想出来的一种用穷人生命作娱乐并借此巩固政权的方法。

在全部十二个时区中，每个时区选派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年龄在12到18岁之间，他们会被放逐到丛林中，于两个星期之内相互残杀，直到最后留下一名胜利者。

尽管对这部影片整体评价不高，但其中有两个段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女主人公凯妮丝在家乡丛林中偷猎（她生活在矿区，这里缺衣少食，然而狩猎是被当局禁止的）。她在林中看见一头小鹿，正打算拉弓放箭，却被她突然出现的男友惊扰了，小鹿仓皇逃窜。不一会儿，凯妮丝干净利落地射下一只飞鸟。此时，头顶传来一阵轰鸣声，他俩刚刚露出的笑容顿时凝固了，惊慌失措地钻进了茂密的丛林。在他们头顶上，驶过一架庞大而高级的飞行器，在这个高科技的怪物面前（或者说，在富人的统治下），穷人就像仓皇逃窜的小鹿一样无助。

另一个段落，是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凯妮丝和同时被选上的男青年皮塔一起走进餐厅，这里摆满了各种精致而诱人的水果、美酒、蛋糕……这些，对于能吃到一块面包就会兴奋半天的他们来说，丰盛得让人心酸。

高尔顿的“回归方程”

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有辙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来看看自然界的情况。

假设，最高的植株和最高的植株相互配对，产生的第二代植株是否会比它们的父母更高呢？这是生物学的一个经典问题。

一百多年前，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兄弟弗朗西斯·高尔顿发现了一个现象，于是他在1877年就拟合了第一条回归直线。这个回归方程

是用甜豌豆的亲本种子的大小来预测其种子大小。他发现大种子的后代往往比中等或小种子的后代要大，但是其后代不会像其亲本种子那么大。

高尔顿用另一个回归方程发现，儿子和父亲的身高有类似的趋同现象。高个父亲的儿子身高一般高于平均水平，但不像他父亲那样高。这意味着用于预测儿子身高的回归方程需要在父亲的身高上乘以一个小于1的因子。实际上，高尔顿估计出父亲每高于平均值1英寸，儿子的预测身高就能高出2/3英寸。

当他计算预测父母和孩子IQ之间的关系的回归方程时，再次发现了这个现象。聪明父母的孩子比智力一般的父母的孩子聪明，但没有他们的父母那么聪明。“回归”这个词语与技术本身没有任何关系。高尔顿之所以把这个技术称为回归，是因为他正好预测的第一组对象显示了这种趋势——高尔顿称之为“走向平庸的回归”，也称为“走向平均的回归”。



从生物角度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似乎无从得知，只能算是某种天意吧？

如果我们用来测量的是更复杂的情况，比如“富裕”或“成功”之类的虚化指标（而不是种子大小、身高和智商这些纯生物指标），那么

是否也会存在同样的情况呢？答案似乎也与之类似，我们都知道那句话：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生活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社会中的确也存在这种“走向平庸的回归”或“走向平均的回归”。

“回归方程”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中为什么会存在“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之类的“回归方程”，可以从理论上作如下分析：

假设，树上有一个苹果，一个长得很高的人走过来，一踮起脚尖就能摘到，那他就不需要使劲跳起来，久而久之就难以发展出“弹跳”的本领。这样似乎很可笑。如果是一个长得不够高的人想吃这个苹果，就得使劲跳起来，或者他得想办法搬个梯子。久而久之，后天的潜能（诸如“弹跳”和“智慧”“勤奋”之类的）就被开发出来了。从某种角度来看，“后天能力”得到开发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某种“先天能力”的不足。

所以，人们常说：“上帝是公平的，给了你这个，不会给你那个。”——因为好东西本来就在不同方位上（参见前面的《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



这种“长和短”的奇妙搭配不只是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自然界也同样如此。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观察事物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特点：为什么没有一个动物同时具有长牙和角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野兽有了长牙可以保护自己，何必再长角呢！”为什么反刍动物有多重胃，但牙齿不行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正因为它们的牙齿不行，才要靠

多重胃来帮助消化。”在自然界中，似乎一贯是从这一部分拿掉后，在另一部分加以补偿。

当然，并不是说由于每个人都“各有所长”，这个世界就是完全“均等”的。如果一个人先天长得不高，又不愿意使劲跳起来，或者又懒得去搬梯子，那么他只好吃不到苹果。

幸福与贫富并无必然联系

无论是金字塔型、纺锤型还是哑铃型，任何一种社会分布，都一定存在贫富的差异。如果穷人抱怨自己穷，除了先天出身之外，至少还有一部分是与自己相关的，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参见前面的《人为什么穷？》和《困境？困境？困境？》）。

更重要的是：“贫富”与“幸福”无必然联系。

关于“幸福”，有一种既有趣又矫情的理论认为：衡量幸福的标准不是物质享受的“多少”，而是享受的“排名”——这就是“嫉妒的经济学”。

比如说，全国最富有的一个人是全体人民嫉妒的目标，也是他们痛苦的根源。如果把他拉下到富有的第二位，就可以增进一个人（原来排列第二的那个人）的幸福感。此时社会总的幸福量没有改变，一个人降低了，另一个人提高了。但如果将这个最富有的人剥夺成为最穷的人，甚至将他杀死，就可以化解广大人民群众怨恨之气，可以极大地增进社会的幸福总量。

然而，到此问题并未解决，因为最富的人被拉下了马，原来次富的人便成了最富的。为了增进社会幸福总量，还得将第二富的人也拉下马。这个过程重复下去，最后唯一能使全体人民满意的是一个清一色的绝对平均的社会。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状态下，每个人一切改进物质享受的企图都成为泡影。原来是希望自己超过别人，但结果是断绝了一切改善自己处境的可能性（除非社会中每个人都能齐步致富）。事实上，“多元化”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必然趋势，所以上述企图是不切实际的（参见前面的《多元化，意味着分崩离析吗？》）。

正由于“多元化”是一种必然趋势，我们应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引以为豪的某个领域，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化学、物理、政治、经济、人脉、音乐、美术、舞蹈、体育……社会越发

展，选择越多元，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领域，我们“一定”可以从中源源不断收获着快乐。为什么？因为长和短奇妙地组合着，有所短必然有所长，只等待自己用心去发掘。

“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问题，在宏观角度上，也许存在着“走向平均的回归”的机制，因此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虽然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更多重视，但我认为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而从微观角度来讲，每个人都应为自己的贫富负有部分责任。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在讨论“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有辄吗？”这个宏观命题的同时，在个人内心的微观层面上，我们应当知道“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幸福”程度和“富裕”程度并无必然联系。

博士后和月嫂的较量

一个博士后的收入比不上一个优秀的月嫂，“脑体倒挂”，读书还有用吗？

2011年8月，吉林大学承办了中国青年政治学论坛，该论坛的主题是“挑战与对策：社会公正视域下的分配改革”。

会上，一位青年学者的话题引起了热议：作为博士后，在高校的基本工资约为2500元，可是一位月嫂，一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这公平吗？

在座的大多数都是硕士、博士、博士后，听到这个话题后感同身受，纷纷唏嘘不已：明显的“脑体倒挂”嘛！分配正义又从何谈起？

我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从体脑分化实验看收入差异的形成机制》，论文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脑力劳动者，将会获得较高的收入回报。

尽管这和上述“脑体倒挂”的生活现象相反，但该结论来源于我在2009年所做的一项实验。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哪个更累？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哪个更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也许多数会回答“脑力劳动更累”，但也会有不同观点。因此，有必要求诸实验，用“大数法则”来回答。

2009年1月，我设计了一项“体脑分化实验”，3月正式进行测试。

该实验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进行（“学生组”和“保安组”），共有70名被试参加（学生组40人和保安组30人），男女比例约为1:1。这两个组的被试，年龄相当，最大的差别在于学历（学生组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主，保安组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

每位被测试者被要求完成两种不同的工作任务：“做题”代表脑力劳动，“负重情况下的行走”代表体力劳动，然后在两项工作中作出倾向性选择（“如果仅仅为了挣钱，更愿意从事哪一项劳动”）——按照“最少努力原则”，哪个更省力就选哪个。



从实验数据来看，上面那两个天平，左边的这个是平衡的（指针在正中间），右边的这个不平衡（指针偏左）。

因此，该实验的结论是——为了简便起见，这里省去复杂的数据，直接说结论——“脑力劳动”是更累的（说实话，这是个复杂的、很难设计的实验，如果您对该结论有异议，可参阅拙作《道亦有道——关于星空与人世法则的思考》中的相关数据和分析）。

接下来，根据该实验的结论，正由于“脑力劳动/劳心”是更累的，为了偷懒和追求安逸，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不愿意劳心，因此劳心者就成为少数。而且越难的脑力劳动，从事者越少，于是在“价格杠杆”（“物以稀为贵”）的作用下，劳心者获得相对更高的劳动报酬。

现在让我们回到“博士后和月嫂的较量”这一话题上，我认为，在收入分配中就“劳心/劳力”这个单一变量而言，其方向是简单的、明确的：“劳心”指向了社会上层，脑力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的收入。

当我在那次青年政治学论坛上介绍了这一实验，主持人问了我一个问题，大致意思是：虽然实验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但是又如何来解释博士后挣2500元、月嫂挣6000元的现实情况呢？

于是，我打了一个比方：前些年的福利分房政策，每个单位的职工都要算分数。假设一个博士，他很年轻，光棍一条，贡献不多；另

一个老职工，虽然只有本科学历，但是工作年限长，职称高，而且拖家带口……最后总分算下来，那个老职工分的房子会更大一些。

如果仅就“学历”而论，这貌似是不公平的，但问题在于算分数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学历”，还有很多其他的条件——这就是我们认为“博士后和月嫂的较量”貌似不公平的原因——每个人，只看到了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别人的优点。

月嫂虽然工资比较高，但工作强度比较大，社会地位不高，而且工作并非长期和稳定的……总体算下来，高校教师通常不会放弃教师工作而去当月嫂，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实类似的现象是无处不在的。很多时候，我们看问题的方式都有些微观，以至于迷失和困惑。如果增加一个维度，考虑到更多的因素，也许结论会产生差异。

再比如说高考，要考语文、数学、英语，以及政治、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在很多科目中，即使单一科目考最高分，也并不能保证总分会很高，但最后能否考上大学，往往是要看总分的。

分配正义的实现

收入分配正义，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个大命题，对这个命题，我个人的看法是：

第一，目前的收入分配现状在总体上具有其合理性——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毫无不合理的成分；恰恰是那些真正存在的不合理成分，才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目标。比如说房地产的暴利，官商勾结、垄断行业的巨额利润及其内部分配，大型国有企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其非市场行为等等。

第二，如果某些现象令人觉得无法解释（比如月嫂的高收入），那是因为变量太多，但是单一变量是明确的；这是“增加维度”才能“突围”的问题。

第三，学会以概率的方式来看问题，不要怀疑常识（参见《上帝掷骰子》）。的确有些时候，真的脑体倒挂；的确有些时候，即便增加维度看也仍是不合理，但这或许是“上帝掷骰子”的问题，属于“小概率事件”，它总是会存在的。

第四，如果自己对结果不满意，那么可以做些什么？世上一定存在着很多种方式，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命苦不能全都赖社

会”（参见《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有辄吗？》和《困境？困境？困境？》）。

所以，我们把所有能够影响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因素罗列如下图：



向上、增长、快乐、控制、拥有、强大、大格局、着眼未来
聪明、公平、道德、理性、宽容、勤劳、真、善、美
物质、特长、人脉、合作、感恩、信任、使命感、目标

如果想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收入，就要具有更多的优秀品质（图中第三行所示，都是很实际的方法和手段）。各种优秀品质，相当于提供了很多种选择，每一种都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途径和通道：能否实现晋升，有赖于人的聪明、智慧、勤奋、勇气和坚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相互博弈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向上”的过程是快乐的；从某个角度看，富人也有富人的不幸，因为他们更难以找到这种继续“向上”的快乐。（虽然办法也依然是存在的，只是要求更高一些，参见后面的《为富不仁？》）。

死亡体验课程

死亡不是什么好事，何必非得“体验”它？

如果您这么想，那或许因此错过了很多美好的东西。

2010年前后，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护士专业和生命礼仪师等职业教育中，开设了“死亡体验课程”。

在一间专门的教室中放置几口特制的棺材，让学生们模拟写遗嘱、穿寿衣、拍遗照，接着躺进棺材，在指导老师的引领下向肉体和自己的一生告别，然后再体验像尸体一般接受殡葬人员为自己进行入殓、封棺、掩埋等程序，经历一次完整的死亡体验过程。



虽然学生最后躺在棺木中的模拟时间只有10—30分钟，但有些人却不禁痛哭流涕。并不是因为棺材很可怕，而是因为躺进棺木那一刻，想到自己很多事情还没做完，生命怎么能就这样结束了呢？于是万分遗憾，追悔莫及……当他们体验完毕获得“重生”后，就会告诉自己要倍加珍惜分分每秒。

目前，这样的课程只针对与临终关怀有关的专业人士，其初衷是：如果相关从业人员真切感受过死亡，他们就会产生同理心，对生

命价值有更深刻的体会，也会对亡者及其家属多一点尊重和关怀。

网上有人评论说：“这样的课程很好，不仅对于学生，还应该对所有人开放，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活着体验死一把的感觉。”

想象过自己的死亡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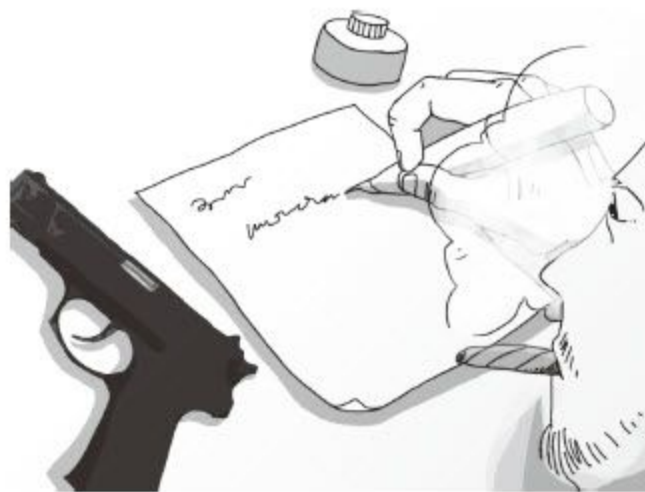
很多人对死亡总是抱着一种“回避”的心态，这可能是目前社会还不够美好的诸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

事实上，生者对死亡的体验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撞上快乐》一书中记述的两个真实历史人物居然宣称“死亡是快乐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2年，纽约，罗彻斯特，大萧条期间。有一位77岁的老人，用毕生精力建立了一个王国，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并用他的财富捐赠了众多的图书馆、交响乐团、大学和牙科诊所，这些都极大地改进了数百万人的生活。然而，因为脊髓疾病的困扰，继续用积极态度对生活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好时光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耗更多的日子只能意味着会越来越衰老。

“一个周一下午，这位老人坐到自己的书桌旁，拧开最喜爱的那支钢笔的笔帽，在一本标准的纸簿上写下了这行话：‘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还等什么呢？’然后，他点燃一支香烟，在享用了它最后一缕清香之后，掐灭了它，并小心翼翼地将那支卢格尔半自动手枪的枪管对准了自己的胸部。在准备扣动扳机的那一刻，他当然会感到紧张，但是，从某种深层意义来讲，他知道这一颗瞄得很准的子弹能够让他留下美好的过去并逃离更加苦涩的未来。”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柯达相机的发明者乔治·伊斯曼。

《撞上快乐》一书提到的另一个人是阿道夫·费希尔，他同样奇怪地宣称“死亡是快乐的”，书中描述道：

“假设你是一个年轻的德裔移民，生活在19世纪拥挤、肮脏的芝加哥。你花许多时间来为一家小报撰稿，该报的指导思想是争取社会公正，但是，你不是傻子，所以你知道这些文章什么也改变不了。当法官根据编造的证据判决你绞刑的时候，你意识到这个可耻的时刻将会被载入史册，而你将会被当作‘秣市烈士’被永远铭记，你的牺牲将会为你孜孜以求却无力成就的那些社会革命铺平道路。几十年后，将会出现一个更加美好的美国，那里的居民将会因为你作出的牺牲而授予你无上的荣耀。你并不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但是你禁不住想到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同样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施与不公正的判决，并被残忍地杀害。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确保一个伟大理想能够在未来的几个世纪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做好赴死准备之时，你当然会感到紧张。但是，从某种深层意义来讲，这个时刻其实是从天而降的好运，是梦想即将实现的高潮，也许，你甚至会说，这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我们是否从这两个人的故事中领悟到了什么呢？

换句话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死亡可以不那么悲观呢？

也许，是当我们知道自己死后依然“以某种方式存在”的时候：乔治·伊斯曼留下了众多图书馆、交响乐团、大学和牙科诊所，它们“极

大地改进了数百万人的生活”；而阿道夫·费希尔则“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确保一个伟大理想能够在未来的几个世纪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死后“以某种方式存在”，能使我们获得一些宽慰。

正如林清玄在散文《风铃》中说：“风是没有形象、没有色彩，也没有声音的，风铃使风有了形象，有了色彩，又有了声音……有了风铃，风虽然吹过了，还留下美妙的声音。有了心的风铃，生命即使走过了，也会留下动人的痕迹。”

这就是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并且，远不止如此。

虽然没有人能逃过一死，但有些人走的时候确乎能更坦然一些。看看最近的例子，史蒂夫·乔布斯被描述为“安然而逝”，他临终前留下了今后四年的苹果产品研发路线图，即便死去也依然以某种形式“活着”。

所以，“凤凰涅”的故事颇有深意：在“死亡”中得到重生——经历对“死亡”的想象，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将是“重生”的关键一环。

哲学：死亡的准备

“死亡”问题是哲学最经典的命题之一，苏格拉底甚至认为哲学的定义就是“死亡的准备”。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死亡像是一种“残酷而温馨的制约机制”：由于死亡是一个人终极的悲哀，所以会像阴影一样笼罩人的一生（尽管时隐时现）。为了稍稍摆脱这种阴影，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做两件事：

其一，争取变得强大——越强大，就会被越多人记住；

其二，争取多做好事——仅仅强大还不够，因为做一个“貌似强大的坏人”（比如希特勒），虽然记住他的人很多，但大家都唾弃他，他一定万劫不复（所以，希特勒最后自杀了，那个时刻一定非常纠结、如坠地狱）。

也许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也许，只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意识到——我们这短暂的生命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在面对死亡的那一刻获得某种宽慰，同样也让在世时的每一天获得宽慰，能更从容淡定地面对自己的死亡（包括地震、火灾、绝症等等“上帝掷骰子”的不幸事件，“我努力地生活过，并无太多遗憾”）。

所以，每个人都有必要时不时地思考一下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应当“感谢死亡”——因为只有认清“死亡的意义”，我们才能更加明确“生命的意义”！

人死之后，还有灵魂吗？

如果有灵魂存在，无论对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一种莫大的宽慰。

人死之后，还有灵魂吗？

关于“灵魂”，自古以来人们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探寻。可是，“人死之后，还有灵魂吗”这句话本身是“可疑”的，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亲眼见到过”灵魂，又怎么知道“灵魂”指的是什么呢？

“灵魂”这个词本身就很含糊——“灵魂”到底是什么？是指“神叨叨的人形幽灵”，还是指“精神”？我们经常发现“灵魂”和“精神”这两个词是混用的。

比如，我们说“一首诗的灵魂”，那么，“诗”也有我们所说的“神叨叨的人形幽灵”吗？恐怕我们只想表示，这首诗的灵魂就是诗人在写作时的情绪、情感和精神，可见“灵魂”有时候代表了“精神”。

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还存在吗？不知道。起码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有，但也同样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没有。

不过，一个人死了，他的事迹、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品格等等，都依然留存于生者的心中，那些“在世者”成为新的“物质载体”。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人的“灵魂”是存在的。

灵魂：“在”与“不在”之间

人死之后，他的“灵魂”或“精神”可借助别人的躯体而得以更长久地生存。不是“附身”，但也可以理解为“附身”。当别人回想起他的时候，他就得到了某种“重生”。

觉得这样来解释“灵魂”似乎不真实吗？有的时候，事情非常微妙。

有一次，我和朋友们到内蒙古草原旅行。夜晚的草原下了一场雷阵雨。雨停之后，我们走出蒙古包，一抬头，忽然看见了满天的星星。在我记忆中，只有小时候见过那么多的星星，它们那么明亮清晰，仿佛触手可及。

星空，让人如此沉醉。在那一晚，站在内蒙古“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的草原上，我不仅感受到了夜空因缀满了闪闪发亮的星星而所具有的“美感”，更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宏大”。

星星之所以被我们看见，是因为它所发出的光线进入了我们的眼睛。光的速度尽管很快，但也是有限的，所以，光的传播需要时间。比如太阳，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它的光线到达地球的时间大约是8分钟。除了太阳以外，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距离地球4.2光年，这意味着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在注视一颗4.2年前的星星了。

夜空中的其他星星更是如此，它们非常非常遥远，可能在一千光年、一万光年、一亿光年之外，它们发出的光线经过千年、万年、亿年的长途跋涉，才最终进入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得以“看见”——其中有很多星星，当我们“看见”它的时候，它早已“死去多时”了，早已坍塌成了白矮星、黑矮星或者变成其他形式，早已不再发光发热，但是，我们真实地“看见”了它在闪闪发光，充满活力和能量。

夜空的“迷人”，其微妙在于，它是跨越了千年万年亿年的“时—空共存体”！当我们仰望星空的那一瞬间，便是在一个“瞬间”真实地捕捉到了“千年万年亿年”的时光！多么“微妙的宏大”呀！

重生：“空间”与“时间”之间

人类的进步史，也是人类对星空的认识“维度”逐渐增加的历史。

古时候的人，认为星星就在离天空不远处。当古代的苏美尔人、中国人及高丽人的天文学家沿着阶梯爬上石砌的庙塔观察星象时，就理所当然地以为取得了有利的观测位置。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可以避开一些尘埃和湍流的影响，而是他们觉得在庙塔上面更加“靠近”众星。他们概念中的星星们是没有远近的深度差别的，星空是一个“二维”平面。

后来，人类逐渐意识到了星空中的星星远近不同，于是星空才变成了“三维”的景象。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把星空视为“四维”的，或把它感悟为“时—空共存体”。因为，星空中的“时间”维度，唯有在心灵的层面存在，它依赖于人心灵中的想象，所以，如果没有一颗敏感的“心”真实地发挥作用，我们或许就很难体会到这个“第四维”。

“时—空共存体”，这难道不也是人类社会的样子吗？当我们阅读一位古代智者的著作，便是进行一次“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当我们追忆一位古代伟人的生平，他的生命便犹如“历历在目”般鲜活。当我们观看一位已过世电影明星的传世佳作，她的音容笑貌便“恍若在

世”般重演……在我们的阅读、追忆、观看中，这些古人们由于我们的“注视”而“重生”，绽放出生命的活力。

照此看来，让一个人“重生”的物质载体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照片、日记、家庭录像、生活用品、所有精神产品都成为灵魂的载体。由于现代记录介质的不断丰富，或许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资格宣称人是有“灵魂”的，人的灵魂可以借助其他物质载体而得到“重生”。

来世：“看见”与“看不见”之间

从“灵魂”说开去，我们有“来世”吗？

尽管目前尚不能证明我们的“来世”以“神秘”的方式存在，但也尚不能证明那种“神秘”的方式不存在。不过，我们确实能够证明：它至少在别人心里“真真实实地存在着”。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在世时感悟前人的“来世”，来推测自己的“来世”。我们的“来世”，就如我们的“现世”一般“清晰可见”。总会有一些人，他们足够强大、足够善良，因此能够名垂青史，他们的“灵魂”得以在更长久的“来世”中生存。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更加“唯物”的方式来作推断：想象有一颗星球上的外星人，用非常高级的望远镜观察地球，他会看到现在的我们正在街道上行走，但是，由于那颗星球离地球十分遥远（比如，在几十万光年之外），当他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或许早已离开了人世，可是对于外星人来说，我们是“活着”的。

我们的一切行为，都会有人“看见”，不是被别人“看见”，就是被自己“看见”。

也不要以为，人死之后一切就不复存在，那才是“唯心”的。正如“睁开眼看见花，花才存在；闭上眼看不见，花就不存在”——过于“唯心”的人存在“局限性”。

我们有理由认为：人的“灵魂”，有可能“与世长存”；我们的“来世”，恰如“现世”一般“清晰可见”。

为富不仁？

如果说1%的人掌握着96%的资源，那么这1%的人如何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是否和谐。

一个富裕的白人和一个贫穷的黑人走到一起，会发生些什么？电影《遗愿清单》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老富翁爱德华·科尔在公立医院的私有化改造事业中获利颇丰。不过，他为节省成本而规定病房“一房两床”的做法颇受非议。性格强势的科尔不以为意，执意推行这项规定。不幸的是，他突然发现自己罹患癌症，他很想入住单人病房，但迫于舆论压力，自作自受地和黑人卡特被安排在同一个病房，故事就此开始。

汽车修理技师卡特生活并不富裕，不过，他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群，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和知识。他将三个子女培养成才，其代价是牺牲了年轻时要做历史教授的梦想。非常不幸的是，他也同样身患绝症。

两个不同阶层的人逐渐地建立起友谊。有一天，他们决定不再留在病房中等死，而是要用自己最后的光阴来完成此生未了的心愿，于是，他们共同写了一张“遗愿清单”。好在科尔有足够强的经济实力，能让那些纸面上的疯狂构想一一实现……

影片的结局，嘘——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看。不过，可以透露的是：珠穆朗玛峰见证了这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之间的友谊。

仁，是柔软有生命的东西

仁，除了指仁爱之外，有时也指可以食用的种子和坚果、核果及类似果实的内果皮里边的部分，比如“核桃仁”。所以，有人曾经为“仁”字作过一番美丽的比喻：“仁”就像种子，是“坚韧、柔软而有生命的东西”，是“生命力的基础”，也是“能量积蓄的地方”。

更多的时候，“仁”是指仁爱，在字形组合上意指“两个人”——这意味着不仅考虑自己，还要推己及人，意味着“大格局”。

同样，“为富不仁”这个词也有着深刻的内涵。

富人，理应具有更多仁爱之心，理应具有更大的格局。因此，如果富人不仁，那其实很不正常，只能让别人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为富不

仁”，带着深深的蔑视。

为什么？

比尔·盖茨作为知名富人，曾说过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当绝大多数人都在为追求财富而奔忙时，早已拥有足够财富的比尔·盖茨为什么说出这番大相径庭的话语呢？

当然，比尔·盖茨的言行无疑是大格局的、是善良的。可是，是否有朝一日，每一个富人都有可能达到这种境界呢？

阿甘的“人生长跑”

电影《阿甘正传》中的一个情节颇有象征意义：有一天，珍妮不辞而别，阿甘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空落落的，突然想跑步。然后他站起身，开始跑步。他跑到了小镇的边缘，心想：“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那就接着跑吧！”然后，他跑到了州的边缘，心想：“既然已经跑了这么远，那就接着跑吧！”于是，他穿过了美国一个又一个的州，来到西海岸。然后，他掉转身，又往回跑，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州，跑到东海岸！

就这样来来回回，他跑了三年两个月十四天又十六个小时，停了下来，他“累”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生长跑”的绝妙隐喻，正如阿甘所说：“我想吃饭就吃，想睡觉就睡觉，想上厕所就去上厕所……”每个人的人生，都像是一次长跑。

只不过阿甘的生命长跑似乎更精彩，电影中的他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数次得到历届美国总统的接见。之后，他又每每从头再来，演绎全新的生活，正如每次他跑到了大洋边上，便调转方向往回跑。阿甘人生经历中的任何一段都足以令人无比自豪，但他却一次又一次地创造着奇迹，只因为那种每每从头再来的勇气。

尽管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其中蕴含的哲理却给人以深深的启迪——让我们试着从一个更完整、更宏观的视角上来考察一下“人生长跑”。

“圆满”的生命轨迹

一个人，从人生起点开始，总是试图通过奋斗、挣钱，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奋斗、挣钱（成功）



人生起点

如果他再继续向前走，就需要做一件事：回馈社会——就像阿甘来到海岸边上，就要调转方向往回走——即便是在人类居住的“硕大无比”的地球上，如果真的马不停蹄地走向“极地”，也终究有不得不离开的时候。



回馈社会

奋斗、挣钱（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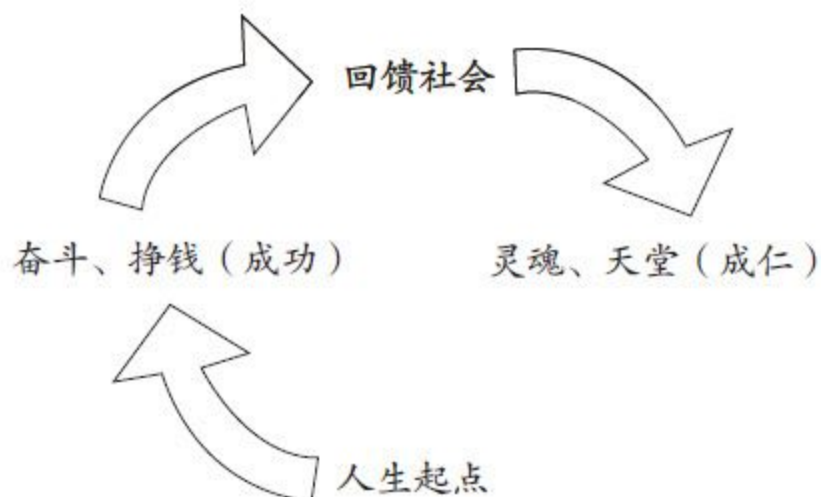
人生起点

在这个关于“人生长跑”和“极地”的类比中，还有另一种有趣的呼应关系：大家都知道，指南针到了极地就会失去方向，而使它重新具有指向性的方式就是离开极地——这像极了某些富人挣到了几辈子花不完的钱之后，莫名产生的空虚感：生活忽然失去了方向，整日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似乎整个生命都不再有意义。

所以，这个时候“往回走”或许反而是明智之选——比如“回馈社会”。

不过，也许有的富人会想：我为什么一定要回馈社会呢？我的钱都是辛辛苦苦挣来的，凭什么非得要还给社会呢？

宗教中曾经对此给过一个很好的理由——灵魂和天堂（也就是“善有善报，善良的人可以进天堂”之类的）。不过，在本文中，我们不妨用一种更“唯物”的方式来解释“灵魂和天堂”的体验。



前面说过，“灵魂”有的时候指的是“精神”，其实很多人早就学会了以这种方式来看待它。国学大师南怀瑾的《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位科学家昨天跟我提到他所领悟的，譬如佛家讲的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他认为一切都在人间，凭我们身心的感受，就可以了解六道轮回。这是非常准确的观念，也就是禅宗大师的观念，他一下就悟出来了……其实我们身体上每天的感觉也在六道中。发高烧的时候，那真是火热的地狱，发冷的时候就是冰冻地狱的日子。”

另外，作为佛教高僧，净空法师在《和谐拯救危机》这部专题片中也有两段相关的论述。主持人问他：“尊敬的老法师，您说这个世界上有鬼神，我为什么看不到啊？”净空法师说：“有鬼神啊！这个屋子里（指演播室）就有很多的鬼神！”在另外一集中，净空法师还说了这样一段话：“什么是鬼神？你贪嗔痴慢，你就是鬼神；你仁厚道德，你就是天神！”

所以，“灵魂”或“鬼神”有时候就是“精神”的近义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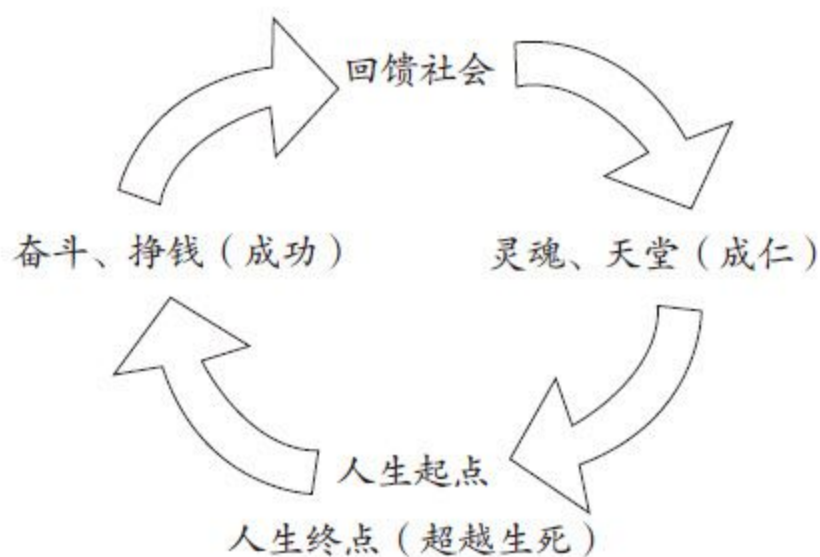
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会很高兴吗？不会。不过，我们生活中，当被人“夸奖”的时候会高兴吗？当然会！

现在假设，一个人在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想一想这辈子的劳动成果，已经变成了一份家业，由子女继承了；或者变成了一份产业，养活了很多个家庭；或者捐给了希望小学、贫困儿童、残障人士……这些承蒙你恩惠的人，会时不时地想起你来，竖起大拇指说：“这个人真好！我们很感谢他！”想一想死后还会不断地被人夸，其实也挺满足的，似乎死亡也没什么，因为你确切地知道自己死后依然以某种方式继续“存在”——这种感受，或许就是进入“天堂”般的感受吧！

因此，当一个人“回馈社会”的时候，他能够在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以某种方式“超越生死”。有什么能比“超越生死”更加重要呢？相比之下，“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有意思的是，释迦牟尼曾在菩提树下经历了生死涅槃，然后创立了佛教；据说耶稣在招收门徒、传播教义之前，也曾旷野中独处了四十天，经历了某种非同寻常的生死体验；至于如今的死亡体验课程，是否也与之有相似意义呢？

有一句话，叫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为什么呢？或许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给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只是如果临死才明白其中的道理，或许就来不及了。



一个人，如果能用一生时间走出上面那样一个完整的历程，或许才能叫真正“圆满”的人生。

这不禁让人联想起雷锋的话：“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说这番话应是真诚的，正如一滴水很容易因蒸发而消失，但当它融入大海之后，情况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生命，在仁爱中从“有限”，到“无限”。

一根筋的思维？

生命，有着更“圆满”的境界——上述论证，多数人都并不难理解——仅从理论上说，上面画的这个“圈”的确是能“自圆其说”的。

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想？为什么有的人“为富”却“不仁”呢？

有些事情非常有意思，即便是所谓的“科学”或“常识”，也要经历一个认识的过程。比如最早的时候，欧几里得几何告诉我们，地球上的基本几何形态之一是“直线”，而“直线是向两端无限延展的”。后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我们，宇宙中根本就没有直线，因为地球上的一条直线向两端无限延展，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圈（这就是“多一个维度看问题”，参见《多一个维度看世界是什么样子》）。

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人，依然生活在欧几里得的世界中，觉得人应该“挣钱，挣更多的钱，更多更多的钱……”，似乎“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这句被认可度很高的大白话，恰恰是“线性”的思维，是“一根筋”的思维。而事实上，人的行为轨迹是一个“圈”。

如果一个富人足够睿智，他自然会明白“回馈社会”的意义。让我们重读一遍比尔·盖茨的话：“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句话太合乎人性了，尽管它摆出一副异常冷峻的姿态，内心中却蕴含着一片柔软的绮丽。

“为富不仁”，是这个社会出现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因为很多富人的“格局”还不够大，“维度”还不够多，看不清生活的真相。反过来说，如果富人、官员不想挣那么多钱，或许目前的很多社会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存在了吧？

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途径，恰恰在人的“心”里面（参见本书第一篇文章《上帝偏好椭圆》）。

公平是不是乌托邦？

乌托邦是不存在的地方。

乌托邦幻想着绝对公平，但公平就一定只能是乌托邦吗？

托马斯·莫尔的代表作《乌托邦》于1516年写成出版，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乌托邦”一词的拉丁文“Utopia”由莫尔自撰而成，它得自希腊文，其原意是“无何有之乡”。

在《乌托邦》中，托马斯·莫尔指出私有制是万恶的根源，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争讼、掠夺、战争及一切社会不安的因素。莫尔认为在他所处的社会里，劳动者“年轻力壮”时遭到剥削，而后“当他们老病交加，身体出现病痛的时候，国家却是忘恩负义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落得异常悲惨的死，作为对他们的报酬”。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

财产的公有制是“乌托邦”的最大特点，也是莫尔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可贵的要素。在莫尔所设想的范本城市“乌托邦”里，一切制度都将是完美的。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一个平等公正的社会，城市里的人们生活幸福。

不过，后来人们常常用“乌托邦”一词指某种“不存在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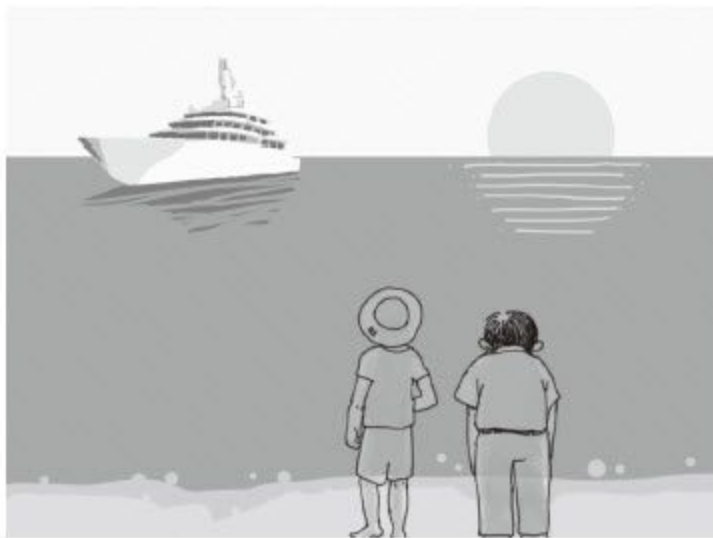
那么，社会走向公平，真的只能是乌托邦吗？

如果按照“万有引力”规律（“质量越大吸引力越大”），那么“公平”绝不意味着“平均”，那么怎样才能算“公平”呢？

这里面同时涉及了“两杆秤”，它们各自是什么呢？

社会公平的第一杆秤——“我乐意”

先来讲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富翁来到海边，看到渔翁每天只打三网鱼，不无惋惜地说：“你为什么每天不多打两网鱼呢？”渔翁不解地问：“三网就够吃了，为什么要多打两网呢？”富翁说：“你可以把多打的两网鱼换成钱，日积月累，买一艘豪华油轮，像我一样在海边静静地享受阳光啊！”渔翁笑了：“我现在不就在海边静静地享受阳光吗？”



在这个故事中，渔翁和富翁都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最正确的”，也是“最好的”。尤其是渔翁，丝毫不羡慕富翁的生活，他的心态是平和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不难找到，因为自我感觉幸福的人是有的，而他们未必是世上最富有的人）。这就是第一杆秤“我乐意”。

“我乐意”这句话听上去很感性，却能有效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比尔·盖茨把钱捐出去——这也是“我乐意”。

穷人一想到富人到头来还是要把钱捐出去，何必那么费劲呢，还不如“小富即安”，穷就穷呗，至少不操劳——这也是“我乐意”。

穷人如果不愿意受穷，努力干活挣钱，别人劝他别那么拼命，他常常说的也是这句话——“我乐意”。

古人有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有人反过来说：“鸿鹄安知燕雀之乐？”毕竟，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

判断每个人幸福与否，还是要看“自己的”内心。《庄子》中有一段精彩的“抬杠”之语：“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非子，固不知之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绕来绕去，总之一句话：快乐与否，只有自己最清楚。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尽管“向上的大格局”有着很多诱人的前景，但也潜藏着一些陷阱；而看似收获不多的“小格局”，也自有它自身的优势，我把这些常常被忽视的“隐性”的内容补充如下：



向上、增长、快乐、控制、拥有、强大、大格局、着眼未来
聪明、公平、道德、理性、宽容、勤劳、真、善、美
物质、特长、人脉、合作、感恩、信任、使命感、目标
心（脑力）、劳累、危险、积重难返

……非脑力、轻松、安全、灵活

有的时候，“向下 \approx 向上”。虽然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这个“地球”是圆的。我们头朝上、脚朝下地站着，并不意味着地心对面的人们就是头朝下、脚朝上的。每个人选择让自己幸福的方法也可以迥然不同。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向北走向南走，都可以抵达目的地，人总是在围绕着自己各种需要的满足而团团转——尽管“向下”的收获少一些，但安逸享乐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吧。

没有哪种状态是终极的完美状态，一切只在自己的选择——至少在这样的的心态下，不能赖社会、不能赖别人。这是“社会公平的第一杆秤”在发挥作用。

社会公平的第二杆秤——“熵定律”

“个人内心的平衡”是一杆微小的秤，每人心里都有一杆，除此之外还有一杆巨大的秤。

除了“个人内心平衡”之外，当然还需要“社会总体公平”，即事实上的“公平”甚至“平均”。

那么，整个社会真的会越来越走向“公平”甚至“平均”吗？我认为，这与宇宙的一种普遍规律——熵定律——有关。

什么是熵定律？简单来说，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普遍趋势：热总要从温度高的地方流向低的地方，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这就是热力学

第二定律，也就是“熵”的定律。

简言之，熵定律就是关于“平均化”的定律。

有人会质疑说，这个“熵定律”是自然界的法则，能够借用到人类社会吗？

其实原理很简单，“有能量，就一定会向外释放”。不仅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生活也是如此。

有一天，我在自制的电影查询系统中查找“快乐”这个词，于是就出现了数百个与“快乐”有关的电影片段，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那些快乐的人们，表现出的“得意扬扬”“喜不自胜”“溢于言表”“心花怒放”“喜上眉梢”“放声大笑”“手舞足蹈”“蹦蹦跳跳”……这些行为都像是“能量的释放”。于是我“忽然”意识到，“快乐”和“能量的释放”相互伴随。

反之，如果一个人很“失落”，则会“像泄了气的皮球”“蔫头耷脑”“垂头丧气”……于是便需要亲朋好友的“鼓励”和“打气”——以上这些负性情绪，也常常与“能量的匮乏”有关。

所以说，“有能量”就自然会“向外释放”，这是不可遏制的趋势，而且由于“能量过剩”而“向外释放”，这是能使人“快乐”的。人的一切活动，似乎都在追求着某种平衡（中医讲究生理上的阴阳平衡，人的身心之间似乎也在追求平衡），这就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熵定律”。

对于很多富人来说，的确一直在释放着能量，有时候通过“挥霍”和“不差钱”的方式，这或许也是“熵定律”使然，是一种难以遏制的趋势。只不过，目前的方式有点浪费，如果富人们愿意小小地调整一下，把钱用到更有价值的地方，或许能带给自己更多“快乐”，也能让其他人从中受益。

在经济学领域，有人把“富人释放经济能量”形象地称为“滴水说”，富人的钱总是会一点一滴地流回到穷人的口袋；甚至还有一句话说“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这些，或许都与“熵定律”有关。

先天经由后天

似乎“熵定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也是存在的——人类具有一种走向“社会公平”的基本趋势。我把它称为人类社会的“先天基因”。

不过，“先天基因”是否“必然”实现呢？这就要谈到另一条“基因学”原理——“先天经由后天”。

比如说，一个胖子成为胖子，究竟是“先天基因”决定的，还是吃冰激凌等“后天行为”决定的呢？基因学认为，一个人首先是具有成为胖子的基因，这使得他更倾向于去买冰激凌吃，所以最后他成为胖子，是先天基因和后天行为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这就叫“先天经由后天”。

按照人类的“先天基因”，那么“社会公平”就像是一种“先天基因”，但也需要通过我们的“后天行为”来实现（可参照《死亡体验课程》《为富不仁？》等文）。

当然，需要补充一点：关于“熵定律”本身，它本身的趋势是存在且不容置疑的，只是关于这种趋势在更遥远未来的结果，即“宇宙未来的景象”却有着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由于“熵定律”，能量从高到低流动，宇宙有可能死于一片“热寂”，即“一片温吞吞的均匀体”。——只不过，这时的宇宙将彻底失去生命的活力，所以，社会完全平均或许并不是什么好事，但那一天离我们还非常遥远，在那之前的人类社会依然是充满活力的。

另一种说法是，尽管“熵定律”存在，但由于区域之间的不均衡与每个系统的开放性，总会有一些地方能够重新聚集起能量，然后使能量流动周而复始，宇宙将始终保持着生命的活力（这种说法其实也不错，意味着不平均才能更好地保持生命活力）。

反正这两种说法都能让我们的内心找到某种温暖与慰藉，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那都离我们非常非常遥远，或许永远都达不到，但这种“走向公平的趋向”本身更重要，至少它提供了信仰。

如果我们相信，整个社会依然有可能走向公平，而不是贫富分化越来越大、难以逆转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就依然会有“凝聚力”。

如果同时考虑到“先天经由后天”的实现过程，那么究竟人类社会能否真正走向公平呢？

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妨心态“平和”地说一句“尽人力，遂天意”吧！

鸟儿的飞行，雪崩式的效应

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有可能引发一场海啸，这个概率确实存在，但非常小。不过，另一些事发生的概率非常高。

《阿甘正传》里有一场戏，童年时的珍妮有一天没去上学，阿甘就去她家探望。

珍妮那粗暴的、有恋童癖的父亲本来在家睡午觉，忽然被吵醒了，变得愤怒异常，吓得珍妮拉着阿甘的手，一路在玉米地里狂奔，以躲避她的父亲。

小珍妮让小阿甘和她一起跪下祈祷：“亲爱的上帝，请让我变成一只鸟儿，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此时，全景镜头慢慢升起来——说来也“巧”，此时一群鸽子从玉米地里扑啦啦地飞出，时机刚刚好，有如神迹。

在拍摄这场戏时，导演曾经真的在这里“放鸽子”，放了很多次，又NG了很多次——因为每次鸽子飞的方向都与他的期望不相吻合——实在没办法，只能用数码合成技术做了一群“数码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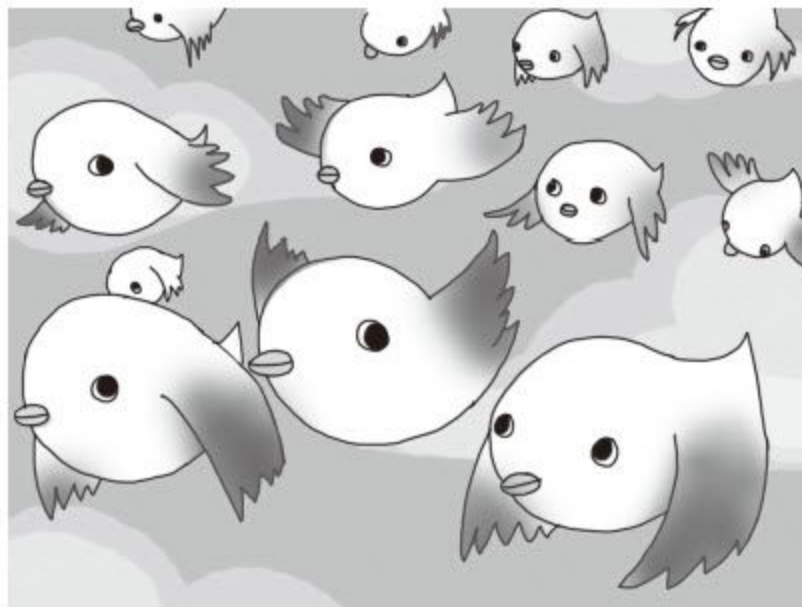
好在，《阿甘正传》不愧为那个时代电影特技的标杆，这群“数码鸽”足以以假乱真。那么，逼真感从何而来？这必须建立在准确掌握鸟儿飞行原理的基础之上。

鸟儿怎样集体飞行？

在动物世界中，大群鸟一只只紧靠在一起，于黄昏时在树梢上盘旋翻飞，这是集体行为的一个奇妙的例子：这里没有谁在发号施令，鸟群中并没有头领，然而，每只鸟似乎都在同一时间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这是为什么呢？

在《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中介绍了其原理被发现的过程：

克雷格·雷诺兹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当他闲暇中坐在公墓里观赏乌鸦时，就经常思考这些鸟儿的集体飞行是在遵循什么定律。后来，他在1987年悟出了一个关键概念：局域感知。



简单地说，每一只鸟儿只留心自己身边的那几只鸟的行为趋向，因为它不可能预知所有同伴的行为，但有能力迅速对近邻的行为作出反应。雷诺兹后来解释说：“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鸟群的运动必定是每一只鸟儿各自按照自己对世界的局部理解行事的结果的总和。”

按照“局域感知”的理念，雷诺兹编了一套粒子运动的电脑程序，他给这些“粒子”起了个名字：“笨头”，意思是“死板的小鸟”。每只“笨头”都只遵循三条简单的规则：第一，它以“局域球内”（离它一定距离范围内）所有其他同类的平均速度运动；第二，它会移向整个群体的质心；第三，它会避开其他同类不与之相撞。

电脑软件的结果转化为模拟图像后，情况与真实鸟类的运动情况高度吻合，于是反过来证明雷诺兹的“局域感知”猜想是正确的。

由于雷诺兹编的软件非常成功，就连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都把它弄来制造特技动画效果。《蝙蝠侠归来》中大群飞舞的蝙蝠，《狮子王》中狂奔的兽群，都是照这样的方式运动的。

人与人之间是否相互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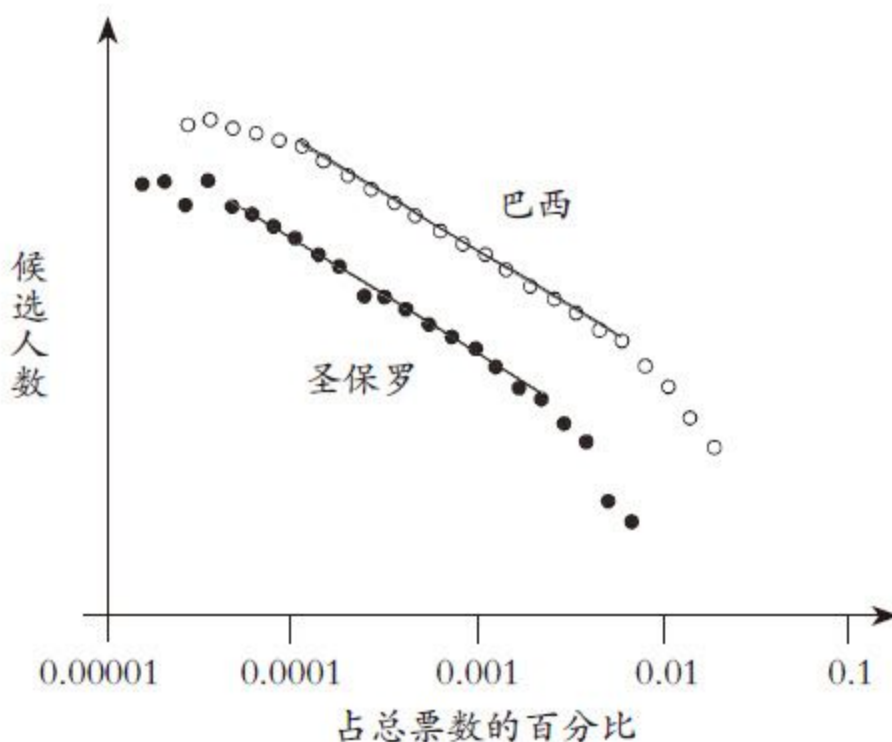
鸟儿之间相互影响，那么人与人之间呢？人类社会的群体行为也存在类似的“局域感知”原理吗？

以“选举”这样的群体性活动为例，如果选举是个纯粹随机的过程，即每个选民靠掷骰子来决定投谁一票，得到的就会是扣钟形的“正态分布”。（在《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一文中，曾经用身高分布

数据介绍过扣钟形的“正态分布”) 不过, 选举结果的统计分布往往是“乘方律”的, 它往往呈现为一条斜线状 (“乘方律”是统计学中不同于“正态分布”的另一种常见分布样态)。

下面这张图, 是1998年巴西国民选举的统计结果。各候选人所得到的选票的百分数与得到这一百分数的候选人数目, 是服从“乘方律”的。图中的实心圆圈表示来自圣保罗的结果, 空心圆圈则代表巴西全国。两条都是直线, 而且斜率 (倾斜角度) 基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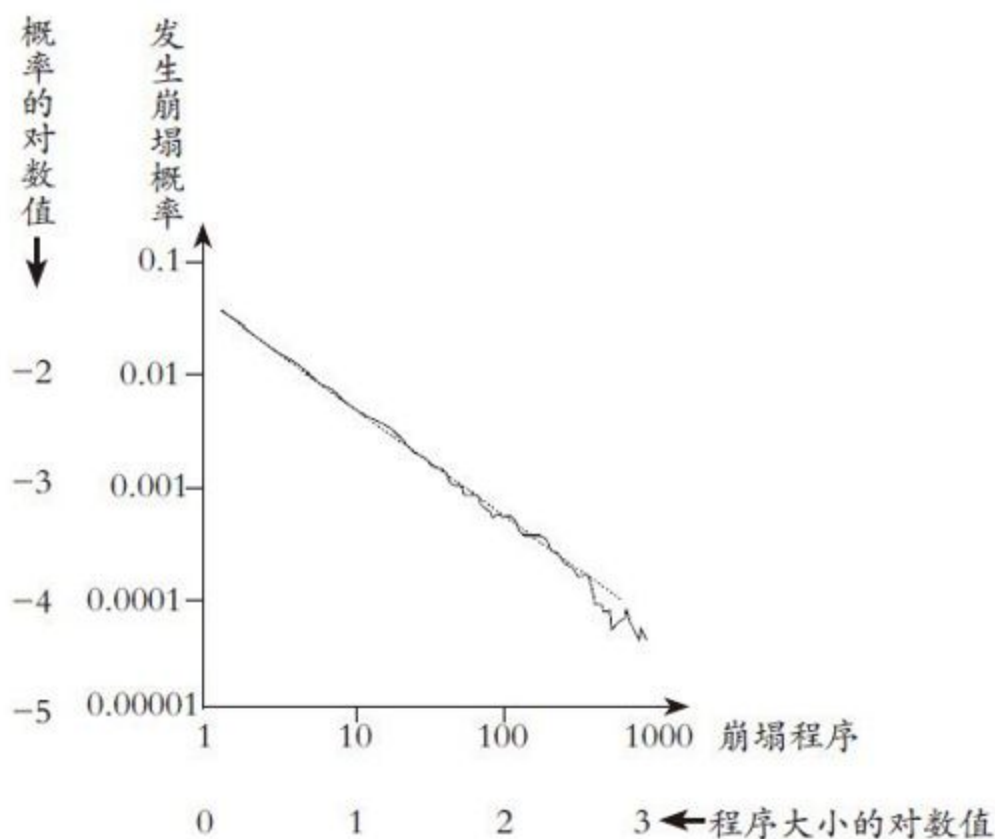
众所周知, 选举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博弈过程, 在这里我们姑且抛开其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影响因素, 仅从“纯数据”角度来看待其“统计结果”, 即“乘方律”分布本身意味着什么。



在《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一书中, 详细介绍了“乘方律”和“正态分布”的区别: “正态分布”意味着基本不存在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 (比如身高统计的分布, 除了近亲属之外, 一个人的身高并不能影响到周围其他人), 而“乘方律”则意味着个体之间是存在大量相互影响的。

关于这种“存在相互影响”的“乘方律”分布, 还有两个经典例子:

一是沙堆崩塌实验。如果以均匀而缓慢的速度让沙粒往下落，会逐渐堆成小沙堆，但是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次“崩塌”，其中，有些崩塌比较猛烈，有些崩塌则比较微小。从统计数据来看，越猛烈的崩塌次数越少，而微小的局部崩塌则经常发生。这是因为如果有了一次猛烈崩塌，那么马上再发生猛烈崩塌的概率就非常小；而经常发生局部微小崩塌，那么也不容易造成猛烈崩塌，所以前后崩塌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其统计频度如下图所示。



二是地震的统计。众所周知，地震震级越高，出现频率总体上越小，但震级较低的小地震其实经常发生，这是因为每次地震都或多或少释放了能量，因而就产生了相互影响，其原理和沙堆崩塌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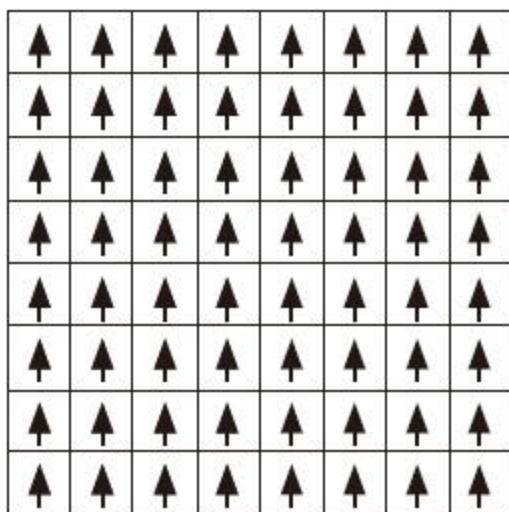
总之，“乘方律”的分布表明所统计的不同个体之间是“存在相互影响”的，由于“选举”结果的分布呈现出“乘方律”特征，那么反过来意味着在“选举”中，人和人之间的确“存在相互影响”。

这一结论，即便按照日常经验也很容易理解，只不过“乘方律”则是以更“科学”的方式给出了统计学上的证明。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哪

家餐馆、买哪个品牌的商品、看哪部电影、读哪本书……很多时候来自于朋友推荐，有时候我们甚至在并不认识的情况下感受到彼此是相互影响的。

雪崩式的效应，是否有可能出现？

“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不禁让人联想起磁体中的原子自旋：铁块内部的每一个原子都像一个微小的磁体，所有单个原子的小小磁场加到一起，便会形成一个很强的磁场，铁块就成了磁体。



如果加热磁铁到“居里点”（ 770°C 左右），其整体磁性会消失。这种变化，被称为“相变”，而“相变”是迅疾的，犹如一种“雪崩式的效应”。

有意思的是，关于前文提到过的“囚徒困境”实验（参见《应该说闲言碎语吗？》），也存在类似“雪崩式的效应”。实验数据表明，“宽厚跟风”成为最终留存下来的最优策略，而且它的出现同样具有一种“雪崩式的效应”。

“宽厚跟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雪崩式的效应”呢？从原理上说，“跟风”（一报还一报）会使得“相互出手”发展到极致，谁也得不到好处（正如三聚氰胺牛奶、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毒胶囊……使得人和人之间无法相互信任，甚至不得不互相坑蒙拐骗，这都属于“跟风”的结果）。这个时候，所有玩家的平均分数也就达到了最低点（就像很多人所谓的“社会道德沦丧”）。

从“囚徒困境”实验中可以看出，在平均得分的“最低点”上，必定会出现一些“宽厚跟风”者，即他们自发地、有诚意地“合作”一把。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由于多数人都是“跟风”型的，于是就会把“合作的意识”迅速推广到整个族群。从实验结果来看，随着转机的出现，所有玩家的平均得分也有了上升（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社会道德风气的好转，对彼此都有利）。到头来，只有一种战略会存在下来，而它就是“宽厚跟风”。

“囚徒困境”实验告诉我们，“宽厚跟风”是通过长时间进化而成的最佳策略。我认为，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某种“大格局”，它将是更加具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最佳策略。

目前的社会，亟待出现一些“宽厚跟风”的“种子”（即“大格局”的种子）。尽管一开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但长时间来看是有利可图的（参见《假如道德滑坡，谁应该先变得善良？》）。然后，这些“种子”会将“合作”的意识推广到整个族群，甚至整个人类社会。

所以，总结一下，如果我们期待这个社会向良性转变，它的内在原理和步骤是：

首先，我们要使自己变成“大格局”的人，成为“宽厚跟风的种子”。

其次，我们争取使身边更多人成为“大格局”的人，将“大格局”或“合作”意识推广到更多的朋友那里。这是可能实现的，就像鸟儿飞行中相邻鸟儿之间的相互影响那样。

最后，这种无处不在的相互影响将使得社会整体产生某种“相变”或“雪崩式的效应”。由于“六档距离”的原因，我们和地球上任何一个其他人的距离并不遥远，这从理论上也是有可能实现的。于是，所有“玩家”的平均得分将会有所上升，整个社会将逐步回到正常有序的良性轨道。

我个人的价值，是卑微的吗？

我们每个人，作为渺小而卑微的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价值？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世界？

很多人会联想到“蝴蝶效应”，也就是“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有可能引发一场海啸”。然而这个原理被滥用了。客观地说，“蝴蝶效

应”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概率非常小，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黑天鹅”事件。

不过，“鸟类的飞行”所带来的启示，是比“蝴蝶效应”更“现实版”的参照。毕竟，这个世界是一个“多点式分布”的“复杂性系统”。

不要以为我们个人是“卑微”的，由于世界是一种“复杂性系统”和“多点式的分布”，每个人的“格局”都比原来扩大一点点，就可能像“长尾效应”那样，让以往难以实现的20%效益得到真正的实现（参见本书前面《一小步 = 一大步》中对“长尾理论”及其相关结果的介绍）。个人的一小步，最终将成为人类的一大步！

天人合一，事在人为。

后记 大格局，大结局

大格局，大结局。

“结”字的左右两边，或许意味着大格局的人们相互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将带来“吉祥如意”吧？

本书从“椭圆”和“大格局”开始，也将以“椭圆”和“大格局”来结束。

有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在江本胜的水结晶研究中，“智慧”这个美好的词无论用英文、德文还是中文来写，都形成了规则的结晶图样，但它们之间会略有不同，用中文写的“智慧”似乎更像是“接近椭圆的六边形”。



“wisdom”（英文） “weisheit”（德文） “智慧”（中文）

水结晶的成因至今还是一个谜，所以我们无法用这种结晶来“证明”些什么，不过，中文的“智慧”这个词在造字法上倒是很有意思，“慧”字上面是“彗星”的“彗”。

古时候的人们常常把“彗星”视为“不速之客”，认为它可能冷不丁地就会撞向地球。后来，人们通过对天空的长期观察和精确计算，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彗星同样是天空中的遵纪守法者，它的轨道也是有规律的，比如哈雷彗星的轨道就是一个椭圆，只不过它具有巨大的偏心率而已。换句话说，它的轨道中心（两个焦点）是明显一分为二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椭圆，不像地球轨道那样“误差”小到几乎看不见。

“智慧”的“慧”，是“彗”+“心”。它或许是对“椭圆”的另一种暗示，表示“一分为二”的观点看世界；又或许，这也仅仅是个巧合。

与“智慧”和“一分为二”有关的，还有“伊甸园”。传说中，在东方有一个伊甸园，伊甸园的正中间长着两棵树，一棵生命树，一棵智慧树，夏娃偷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从此窥见了生命的秘密。上帝为了避免人类再偷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就严厉地惩罚了夏娃。于是，人类无法像上帝那样智慧和不朽。

这个传说颇耐人寻味，伊甸园的“正中间”长着“两棵树”——在什么形状的园子里，才能在“正中间”同时长着“两棵树”？从数学意义上说，圆形、正方形、三角形、梯形……都不可解释，除了椭圆（园子边缘任意一个点，到两个焦点的距离之和始终相等，这两个焦点一起构成“正中心”）。当我写下后记中的这段文字时，恰逢2012年的愚人节。

2012，是一个醒目的年份。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因为2012的预言犹如缠绕心间的幽灵一般挥之不去。

这一年究竟会发生些什么？

对于玛雅预言的2012年，《2012心灵重生》一书中提到，只有托图古鲁6号石碑有明确的记载，可惜这块石刻的最重要部分遭到损坏。著名玛雅学者戴维·史图格对这块石刻的碑文翻译如下图：



8 玛雅年加 3×400 年，
每年 360 日
第 13 玛雅纪会去到终结
2012 年 12 月 21 日
(黑暗) 会来临
九位神灵的后人会

译文中的“黑暗会来临”，由于石刻遭到破坏，“黑暗”一词只是猜测。九位神灵的后人会怎样，最后一个文字已无法阅读，所以不得而知。

一些人认为，玛雅人预言2012是世界末日，主要是根据“太阳历”只到2012年12月21日为止这一信息。但目前较主流的说法应该是：2012年12月21日是本次人类文明结束的日子，自此之后，人类将进入与本次文明毫无关系的一个全新的文明，这个终结日并不意味着什么大劫难的到来，而是在暗示全人类在精神意识上的觉醒和转变，从而进入新的文明。

2012这个年份很特殊，还因为中国古代的预言书《推背图》中也有相关的描述，其中第52象“乾下坤上泰”，具体内容如下：

讖曰

彗星乍见

不利东北

踽踽何之

瞻彼乐国

颂曰

挽枪一点现东方

吴楚依然有帝王

门外客来终不久

乾坤再造在角亢

第一段“讖曰”里提到了“彗星”，而“瞻彼乐国”显然描绘了美好的太平盛世——当然，从天文学角度来看，2012年地球附近是没有彗星出没的——那么，这个“彗星”是否意味着指向某种“智慧”呢？

第二段“颂曰”中的“挽枪”指的是挽枪星，是古代对彗星的别称。句子里的“乾坤再造在角亢”一句，“角”“亢”都是天宫二十八宿中的东方青龙七宿，两龙并提，被解读为2012年；“乾坤再造”则有“更新”之意。

此外，《推背图》的最后几象：“大乱平，四夷服，称兄弟，六七国。”“无城无府，无尔无我，天下一家，至臻大化。”这些文字都与2012年之后将是黄金时代有了呼应。

当我们去重新探究和推敲这些文字的时候，其实并无意于宣扬某种神秘主义或迷信色彩的东西。恰恰相反，如果在很多人的心目中，2012意味着“世界末日”，那才算是神秘主义和迷信色彩——我是想说，“假如”我们真的相信2012预言，相信它会带来灭顶之灾，我们

同样也可以“以其人之矛攻其人之盾”，认为2012是某种人类文明新纪元的开始，并且它一如预言所说“来自东方”。

汤恩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过：“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无论如何，中国人向来是有“大格局”意识的，而中国古老的“太极”也包含着某种高度的生活智慧。在21世纪，我们仍然能从中国的古老智慧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到新的营养。中国人，向来不倾向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更习惯采用系统式的观照，也更多地在相互关照中前行。

在这本小书构思和写作的过程中，我要感谢众多好友的帮助，他们是刘笑盈、刘大年、欧丽娜、李家焯、陈朝晖、高峰、包月阳、于奎潮、陈寿灿、何海峰、曾志斌、郭庆生、林峰、董明珠、李满菊、乾罡、张东岳、吴泽华、葛亮、韩博、齐靖文。特别感谢张鸣老师写的序，也感谢所有带给我启发和收获的人们，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时代，也无论我们是否曾经谋面，在此诚挚地表达我的谢意。

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在寻找信仰的道路上，感谢来自星空的指引。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页](#)

[目录](#)

[序 人生就是一个椭圆](#)

[导读 当我们仰望星空](#)

[上帝偏好椭圆](#)

[都是“格局”惹的祸](#)

[一小步=一大步](#)

[权势尊位功名利禄，氢氦锂铍硼碳氮氧](#)

[痛并快乐着，并非不可解释](#)

[人性“重口味”：魔幻的彩色陀螺](#)

[人性之争的终结](#)

[香香的，臭臭的](#)

[越联结越强大，越强大越联结！](#)

[没有金钱，用什么来替代？](#)

[着眼未来的孩子，多一块棉花糖](#)

[人为什么应该帮助别人？](#)

[道德的理由：直觉？功利？](#)

[盖世武功，从三只小麻雀练起](#)

[美德与格局](#)

[“上”清“下”浊](#)

[绿皱豌豆，黑天鹅](#)

[高官与高道德](#)

[当个坏人更占便宜吗？](#)

[人为什么穷？](#)

[上帝掷骰子](#)

[爱情、苹果和万有引力](#)

[马斯洛的伟大和遗憾](#)

[人“吃”人的社会](#)

假如道德滑坡，谁应该先变得善良？

左脑和右脑，缺个心眼儿的机器

多一个维度看世界是什么样子

困境？困境？困境？

“我”是全世界的中心

世界不只你一人

小心！珠穆朗玛峰再高一倍就会倒掉！

多元化，意味着分崩离析吗？

应该说闲言碎语吗？

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有辙吗？

博士后和月嫂的较量

死亡体验课程

人死之后，还有灵魂吗？

为富不仁？

公平是不是乌托邦？

鸟儿的飞行，雪崩式的效应

后记 大格局，大结局